中华文明“行”在哪里?

金唢呐

(1)

两月前，网友 7171 在我的帖子后面跟帖说：

请教老卢，金锁兄：思维的性别问题
……
中国文化代表的东方文明是在其自身的“生理结构”上诞生，成长，发育，成型的，它具有自己的性别属性，因而有其自身的生存，演进逻辑，无法用具有不同“生理结构”的西方文明的逻辑或标准来评判或衡量。

不少人有这么个感觉，西方人看不懂东方人。其实，在海外生活了多年，我们也可说，东方人看不懂西方人。两者的差异大致上跟男人不懂女人，和女人不懂男人的程度相似。

（金注：在前一段的两会期间，中国外交部杨部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外国记者时还特别警告西方，看待中国“别用油画标准欣赏水墨画”、“否则就要出错”）
……
个人感觉，东方文明是阴柔的属性，而西方文明具阳刚特征。两者各有一整套完整完备的哲学理论基础，历史积淀，“待人处事”的方式方法，无法用绝对意义来评价。用男人标准看女人，或用女人标准看男人，是弄不好的。这，或许是看许多当代的社会文化现象的一个有益尝试视角？！

以后 7171 网友和 DaLuoHan 在讨论中又谈到：中国尽管没有出过一个西方那样的“带头大哥”水平的人物，但纹丝不动存在了两千年，这也是个必须承认的事实。说明具有阴柔属性的中国文明肯定有它“行”的一面。

其实我也对这个问题一直很困惑：为什么同在一个星球、一片蓝天下，不同民族会产生不同的文明，会有不同的思维、待人处事的方式。中国文明为什么这么“行”，到底“行”在哪里？而且我也和 7171 网友一样，期待着“老卢”出手，快刀斩乱麻，把这个问题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我等好好享受一番。说实话，这也跟科研选题一样，找到一个合适的题目不容易。这个题目实际上是“文明比较学”、“思维比较学”，对我来说太大太难，搞不好就会露怯穿帮。

这类题目应该最适合“老卢”，理由 DaLuoHan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老芦对这两种文明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DaLuoHan 是这样说的：

“老芦是我知道的最大的香蕉：黄皮至黄至正，在中国文化上的渊博，文字功底的深厚，实属罕见；白心至白至纯，对西方文明的精髓，也理解的极为深透。鲁迅在前者，自无可置疑；但是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即使放在他那个年代，好象也谈不上很了不起。至于柏杨，我觉得整体差了一个档次吧!”

我认为 DaLuoHan 对老芦的这个评价说得不错，尤其是对近现代西方文明理解的透彻，确实是“白心至白至纯”，称得上是“气死头场雪，这不让二路霜，气死了头号的洋白面儿了吧”（引自相声《卖布头》），比那些同样留学或在海外居住多年的伪香蕉们强得多。黄起来“赛过苍井空，不让武藤兰”（我瞎编的，把颜色的黄与“很黄很暴力”的黄混用了，呵呵）。可看到老芦现在毫无创作欲写作欲，连出版社的约稿都懒得写，所以俺这半黄不白的“金锁”越俎代庖，试着回答一下。正好我前边那个系列《世纪眼光看世界》，也要谈到不同民族文明特点这个话题，就放在一起说吧。还是跟以前一样，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离题万里之处，还望海涵。若不慎成了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有洁癖者尽可掩鼻而去。

另外，和老芦不同，我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得申报课题拿成果，要做许多诸如填表格、报课题、跑鉴定、发文章、请客送礼拉关系等无益、无聊、无趣也无意义的事，原想混上教授，就可以再也不用干这些于人于己于社会都无益的事儿了，就像老芦现在这样，逍遥自在，在家上上网看看电影，兴致来了就上网写点什么，没得可写就出去游山玩水（如组团去看雅玛古迹），可干的事太多太多。可到真正评上了教授，还是刹不住车，还继续干这些无益、无聊、无趣的事，而且不干就难受，真到退休的时候可能还会有失落感。正如古人所说的，“不做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至今还在心甘情愿地吃 N 遍苦，受 N 茬罪。所以如果因为稻粱谋而把这个系列搞成了太监工程——下边没有了，诸位也不要责怪。

7171 网友说的这两个现象，我认为确实存在。一是东方文明确实是“具有阴柔的属性”，横竖看都够阴够柔；再就是这种文明确实有它“行”的一面。“不知历史无以言当下，更无论将来”。除中国外，世界上任何一个帝国都有兴起、鼎盛和衰落的过程, 盛极而衰然后走向灭亡。唯独中国，盛极而衰后却否极泰来。作为国家来讲，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由古代延续下来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从未发生文明史或文化上的断裂和夭折，而且至今还活着有滋有味，眼下还看不到崩溃的迹象。这在世界古代产生的大帝国中是绝无仅有的，是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上其它民族最显著特色之一，是真正的中国特色。

不信在欧洲的自治区诸位卢瑟和你周围的洋鬼子聊聊，看提起什么“罗马帝国”、“亚历山大帝国”人家会不会有什么失落，或者“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可中国同胞却不一样，提起强唐盛汉，眼睛就会放光，哪怕是元朝也会兴奋，甭管是谁来统治，杀了多少同胞，汉人是几等人，反正那时中国的版图最大，所以成吉思汗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被誉为“一代天骄”。

人们通常说当代中国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我认为有，这就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大一统”观念。中华文明的精髓，就是支撑这个大一统集权专制的儒家文化。不管什么思想思潮理论学说，绝不能和它发生抵触，否则就要“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这是中华民族的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套用一句毛主席语录就是“与这个观点相同的就叫做爱国主义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就是卖国主义”。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具有政治文化的统一性。而这个价值观是一种传统的价值观，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已经刻在了中国人的骨头上，融化在血液中。这种中国人独有的大一统情结，是如此顽固坚硬，没有什么可以融化或改变它。

我理解这“大一统”至少包括如下因素：1、版图大、人口多；2、中央集权；3、政治、思想、文化统一。

虽然最近大陆新儒家领军人物蒋庆教授对此又有新的解释：“大是动词，是推崇之义；一统也是动词，是指要用最高的价值即‘一’来统摄整个宇宙人生、历史文化与社会政治。”这听上去有

点像纪晓岚对乾隆解释“老头子”。有一天，纪晓岚和同僚们开玩笑称皇帝为“老头子”，恰好被乾隆皇帝听到。乾隆要砍纪晓岚的脑袋，纪晓岚解释道：“万寿无疆之谓老，顶天立地之谓头，父天母地之谓子，这就是老百姓称您为‘老头子’的缘故。”乾隆皇帝听后开怀大笑，赦免了纪晓岚的死罪。对于新儒家的这种解释，我看纯粹是玩文字游戏，强词夺理，用过去电影里首长训斥小鬼的话说就是：真是乱弹琴！

先看看历史上无比辉煌荣耀的“四大文明古国”的命运。国人经常说的“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老文明”，以此为荣沾沾自喜，其实并不准确，其他文明古国所创造的文明，其先哲的著作，并未随改朝换代山河易主历史变迁陨灭，而是继续存活于世并光大至今。但作为文明传播的载体国家，确实都已经消失了。四大文明古国，现在大版图独立自主存在的国家只有中国。比如巴比伦的影响（尤其宗教方面）虽流存至今，但作为国家早巳消失；古埃及早在公元前就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而结束；现在的埃及与印度那是英国人根据自己的战略需要为其保留下来的。若不是英国，在这两片土地上还不知会分出多少小国。

印度历史就是一部被异族蹂躏的历史，在历史上分多合少，数次被外来民族统治，却没有同化异族的能力，除宗教外，传统文化保留很少，所以印度现在被称为文化博物馆、人种博物馆。到了近代，几乎被英国同化，连官方语言都离不开英语。现在印度有 156 种语言，文字光是印在钞票上的就是 15 种，就像我在阿三系列提到的，没有英语，印度各民族之间就缺少了沟通的工具。实际上现在的印度，是英国殖民者给“攒”起来的一个松散联邦国家，跟中国这种“大一统帝国”是两回事儿。

再看看历史上那些曾经显赫一时“大一统帝国”，有历史学家提出，人类古代文明的发达与帝国的建立和强盛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人类历史上文明的巅峰，往往也是帝国兴盛的时代，因此把两千多年的历史分为三个帝国时代，我认为有一定道理。
在第一帝国时代，中国有秦汉帝国，欧洲有罗马帝国、马其顿亚力山大帝国、南亚有印度孔雀帝国、西亚有波斯安息帝国次第相连。
在第二帝国时代，中国有隋唐帝国、欧洲有拜占庭帝国和法兰克帝国、印度有摩伽陀帝国，西亚有兴衰更替的波斯萨珊帝国和阿拉伯帝国。
第三帝国时代中国有明清帝国、印度有莫卧尔帝国、西亚有波斯的萨菲帝国、奥斯曼帝国，西亚的奥斯曼帝国还一度主宰着欧亚大陆。
最后是分裂的欧洲，彻底的降服了一个个这些看似强大的恐龙，改变整个世界，让世界“走进新时代”。

以上帝国，“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但唯独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现在还大模大样地活在世上。

拿马其顿亚力山大帝国和秦帝国做个比较。从公元前 359 年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至公元前 221 年，“六国毕四海一”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中华大帝国秦王朝，奠定了中华民族 2200 多年大一统的基础。与秦王朝建立时间差不多的还有一个马其顿亚力山大帝国。马其顿位于希腊北部，公元前 360 年，即中国商鞅变法的前一年，雄才大略的马其顿王腓力二世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于公元前 338 年统一了整个希腊。以后先后占领波斯、埃及和印度河流域，最后由亚力山大就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马其顿亚力山大帝国。所不同的，马其顿亚力山大帝国因缺乏我说的第三条“政治、思想、文化统一”，一朝瓦解却再也无法恢复昔日的领土疆域，今日的马其顿共和国，领土面积只有 2.5 万平方千米，人口不足 50 万。其领土面积还不及亚力山大

帝国极盛时期的百分之一。

和历史上其他庞大帝国相比，中华帝国最大的特点就是打散了还能再聚起来，倒驴不倒架，总能分久必合。黑格尔曾谈到中国的国运时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末，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像中国的秦王朝虽然被刘邦项羽灭掉，又一个更大的汉王朝的建立起来了，重新恢复了大一统的局面。而且是“螺旋上升”，与秦王朝相比较，其领土疆域更广大，经济上更繁荣，军事上更强大，政治思想文化更统一。这靠的是什么，是文化，是信念。而世界上其他帝国，一朝覆亡却再也无法恢复。“我回我的高老庄，你回你的流沙河，分了行李就散伙”，而且各自都活得有滋有味，不再想着这回事儿。这有点像老芦写党史中引用的国民党某将领的一段话：国民党的军队打散了就彻底完了，连部队番号都要取消，而共产党的军队打散了还能再聚起来。

前一段本自治区进行了“中医整体思维大讨论”，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看出中西方思维的差异来。整体思维把“人”视为一个整体，儒家学问很多内容都是人与人如何相处、谁服从谁、怎么忍耐、如何互相迁就的伦理、道理和方法；而西方的分析法把“人”分割成一个个具体的人，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权益、自由和欲望，都有自己的存在价值，谁也不能干涉谁、侵犯谁。中国文化讲究“大一统”，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为“患”，凡事劝和不劝分。而西方人讲究个性独立，遇事劝分不劝和；欧洲人有矛盾，他们首先想到的办法是分开。民族与民族相处不到一起怎么办？分家另起炉灶，你过你的，我过我的，欧洲的“几十个国家几十朵花”就是这么来的。

生活中也是一样，父子两代有代沟，子女 18 岁后滚蛋便是，谁也用不着欠谁的。夫妻为个 P 大的事也可以离婚，大不了自己一个人过。朋友同学一起吃饭，谁来掏钱？中国的办法是先按照贫富、尊卑、长幼看看能不能先找出个大头来，如果大家差不多而没有显著性差异，就要蜂拥至收银台比谁手劲大脚步快，没付钱的一定要把饭店的档次、酒水菜肴的价位牢记在心里，找个机会再找补回来。欧美人则要简单得多，饭费除以人数，大家均摊，然后各自回家，轻轻松松做人。

迈克尔杰克逊有个专辑，叫《Leave Me Alone》（我没有听过，只看过封面），大概在西方人眼里，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甚至“微积分”出自欧洲是不是也有“必然性”啊？

(2)

中国这个大一统帝国的维持靠的不全是武力，主要还是文化，仅靠武力维持不到现在。其中儒家的文化价值观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依我这个外行看，儒家的学问就是做人的学问，告诉你“怎样活着，如何做人”。这里面有很多合理的地方，比如告诉大家在一起相处时要懂得容忍、谦让、守信、奉献、尊重，要加强学习，注意世界观改造，“规规矩矩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等等。像“五常”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里面说的就是这些内容。

儒家学说里面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告诉人与人之间不是平等的，有尊卑之分，要想社会安定，就必须“服从”。和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比较起来，农耕文明是被束缚在黄土地上的文明，农耕民族本身就“保守”尤其是“奴性”重。所以用儒家文化很容易深入人心，最后使得整个民族被彻底驯服。最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局面。经过文革的老家伙都知道，文革时候批判刘少奇“做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批判“黑修养”（《论

共产党员的修养》)，说刘是“贩卖封资修、孔孟之道的黑货”，其实革命群众一点没说错。毛主席和刘主席的分歧，无非就是嫌刘少奇的“做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里面的“党”不明确，怕革命群众让“书记处”、“中央政治局”之类的集体领导所迷惑，去执行刘邓司令部的黑指示。通过经过文革，让人们认识到到底谁代表党。所以，正确的表述应该是“毛主席老人家怎么说，各族人民就怎么做”（篡改自红色经典《阿瓦唱新歌》，里面的“各族”是“阿瓦”）。看看这些，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毛时代搞起“集权”和“极权”那么容易，现在搞“分权”和“民主”那么困难。

就连毛主席也不例外，就像林彪在《571 工程纪要》里所说的，毛主席是“披马列之皮，行孔孟之实，执秦王之法”。林彪的意思是说，毛主席嘴上说的是马列主义，实际上追求的是孔孟之道，而使用的手段则是秦始皇的那套东西。对林副主席的说法，本人有保留地同意。林所说“披马列之皮”本人不敢苟同，“阶级斗争学说”在“孔孟之实，秦王之法”里都没有，秦始皇的“阶级斗争”不过是砍了几个议论朝政的儒生脑袋，从来没听说过嬴政搞过什么阶级划分，这完全是马列的做法。其他的两句倒是还有点道理。

古代的开科取士对保证儒家学说的贯彻执行、维护大一统集权专制帝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科举考试是从隋代开始的人才选拔考试制度。魏晋的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这种制度合理的方面是保证了官员的素质（包括文化水平和道德修养），而且给那些出身卑微的三教九流的后代创造了机会。根据我在农村的感觉，像胡屠夫这样杀猪的职业，不管收入多高，吃得多好，实际上地位连个正经庄稼人都不如，没有谁愿意闺女嫁给这种人家。科举制度保证了即使这种人的女婿，只要努力，也照样可以提干。

而且；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保证了干部队伍的纯洁性，“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为科举学习考试内容大多是儒家学说，也就保证了政府官员都是儒家传人，满脑袋瓜子都是儒家学问，防止了大权旁落。因为古时做官不仅要有文凭，而且要有儒家的文凭。你《楞严经》、《法华经》、《华严经》、《金刚经》通读一万遍也当不了干部。上千年的实践证明，这种干部选拔政策对维护大一统集权专制帝国的稳定是有效的，保证国家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当然，代价就是阻止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现在的官员也是一样，我们学校每年都要办党校，普通干部在学校办的党校学习，处以上干部要去省级党校学习。学校的干部大多有博士硕士文凭，这种党校学习，实际上也是参考这种做法，保证你的学问不是歪理邪说。

翻开历史，尽管各国为宗教、利益、政治等原因而爆发的战争连绵不绝，各国的疆界变来变去，但是到头来，各国的版图主要还是按照民族、文化、语言、宗教信仰、社会习俗乃至人种等特定传统关系确定下来的。拿破仑、希特勒都曾经想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但因为欧洲各国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所以根本尿不到一壶去，所以最后都成不了，欧洲想抗衡美国日本只能组成“欧洲共同体”这样松散的联盟。实际上在和平时期，这种国家之间的既竞争又合作、既对抗又勾结，各国的发展要比大一统帝国那种沉闷单调一致好得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各国混战一团，战争结束后，各国的版图基本上还是回复到战前的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和日本都曾“横扫”、“席卷”千军如卷席，占领了不少地方，但是到头来，他们依然缩回到原来的疆界，德国还是那个德国，日本还是那个日本，战胜国也一样，谁也没有扩大版图。当年的日不落帝国英国，最后落脚的地方还是英伦三岛。尤其在今天，还没看到哪个国家凭借武力扩大了疆界（除了无人居住的荒岛)。哪怕超级大国美国，争得也只是“势力

范围”，从没拿走过一寸土地。谁都明白，强扭的瓜不甜啊。

历史上中国只会亡国，而不会“亡天下”，也就是不会“亡文化”。“亡国”仅是改朝换代，牵涉的只是君臣之分，是统治集团的事情。即使是异族侵略也是一样，异族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也不得不自觉融入华夏文明，征服者早晚都会变成被征服者。中国人不是属于那种“特别能战斗”的群体，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亡国”过，而被灭过多次。从大的朝代看，在元清两代完全被外族统治。中国发生过无数次内外战争和农民起义，血流成河、杀人如麻的时候一点不比国外少，也有多次屠城的记录，有时候还是自己人屠城。

根据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中记载，蒙古灭金后得户 87 万余，人口 475 万余，比金章宗太和七年（1207）年统计数户 768 万余，人口 4581 万余，少了 90%。按照这个统计，北方被屠杀汉族人民人数约 4 千万。金帝完颜一族尽数被屠，世间从此再无完颜一姓。明初，河南、河北、江苏北部、山东西部都是千里无人区。在蒙古人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 7000 多万人口。据说，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1985 年版。

但这都不能使中国文化灭亡，中华民族消失。90%听起来吓人，其实作为这么个庞大的帝国来说，剩下的 10%足够了。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很多抗癌药一次使用都可以使癌细胞减少 90%，但最后还是阻止不了癌细胞的生长（这里只是数量概念，而不是说中国人具有癌细胞的其他性质）。中国的历史始终是延续的，外族入侵的结局都是以外族被汉族同化而告终，中国还要干落点领土和文化嫁妆。

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两千年来中国的版图变化也不大。虽然古代的疆域概念不同于现在的版图概念（前者只是势力范围，后者才有明晰的界碑），但绝大多数情况下长江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原地带始终没变，变化的大都是北部和西部的那些少数民族地区。不仅仅是中国的版图没变，中国文化变化也不大。中国文化从来都没有断代过，汉族在任何朝代都是占多数，文字和两千年前变化不大，还是象形方块字。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只要谁胆敢“beat us”，其结局一定是“join us”，也就是谁打败了我们，谁就变成了我们。谁杀了我们的人、占领了我们的国家，我们就灭了谁的文化。不信看看今天满人的境况。我认识的满族高知不少（当然其中有些是为子女高考加分伪造的假满族），没听说谁还能说满语，能看得懂满文。就是专搞文化的，我看也够呛。前一段看文物鉴定的节目，乾隆年间的花瓶上有几个满文字母，那几个文物鉴定专家（其中一个还就是八旗后代）把头摇得跟不浪鼓似的，王顾左右而言他。满清的诏书倒一直是满汉两种文字书写，估计前几届皇上都是看满文，到了后面这几代，是否认识还认识那些蝌蚪文就值得怀疑了，至少还是看汉文更顺溜。

日本鬼子也就是仗着呆的时间短点，再多呆几十年，估计日语就得废掉；日本四大古典戏剧狂言、能戏、歌舞伎、傀儡戏演员们，最后全得改唱生旦净末丑。不信看看蒙古的那些“蕃曲”、“胡乐”的命运，最后变成了中华文化的瑰宝元曲。中国人虽然注重形式上的差别，分什么蛮夷等等，但是匈奴入则同化匈奴，鲜卑入则同化鲜卑。五胡乱中华的结果，就是把五胡都给胡进来了。其实汉民族原创的农耕文化艺术到底有多少很难说，还不是由于异族文化贡献，才成就了其博大精深？古代不管是多么强大的帝国或民族，一碰中国文化就“仰慕”、“折服”，说句慷慨激昂的话就是：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从清末开始，中国面临“千古未有变局”，也就是第一次发现对手与以前的“西戎北狄”不同，

不但拳头硬，性格彪悍，骁勇善战，有“好马快刀”，而且文明程度全方位超越了自己。英国商人安德鲁在致英国政府的一封信中，认为东方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弱的国家，只靠着系统的谎言、妄诞的谕旨、人民的愚昧来维持”。以前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较量，而这次是和工业文明的交锋与较量。版图与人口，再也不是衡量国力的主要因素。按马克思的说法，就是这一二百年欧洲人的发明创造，比整个人类历史上全部的玩意儿加在一起都多。这次中国不仅可能亡国，还有可能“亡文化”。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中国确确实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还是没有变。

什么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依我看就是所谓的三统，即政统、道统、学统这些东西。到底这三统准确的定义是什好像也没个统一的说法，当代新儒家们也还是老祖宗的传统，坐而论道却从不界定道的概念。我理解这三统就是政治体系，道德体系和教育体系。虽然这三者受到了西方现代文明和马教的冲击，但我认为还没有到崩溃的程度，本质上的变化不多。今天中国的政统，还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还是由少数人的意志强制大多数人的生存的形式，这种政统形式未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连今天的中纪委和监察局，和古代为了防范皇权专断，而实行过的环环制衡的台谏监察制度都很类似，但效果要差得多。

中国在秦以前是封建制，秦以后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君权专制。以后又增加了开科取仕制度。直到现在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仍然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公务员考试和开科取仕也相似。最大的区别无非是由过去的家天下的世袭制变成了党天下的“禅让制”，也就是老芦说的“非遗传的专制”（见老芦的《浅议黄仁宇和唐德刚的“大历史观”》）。转来转去还是过去那一套，连个现代选举制度都没有。而且咱们的禅让制还是“内禅”（古时将禅让是将权力转让给异姓，称为“外禅”，这会导致朝代更替；而让给自己的同姓血亲则被称为“内禅”，不导致朝代更替），不会导致共产党失去天下。

改革开放的一个变化，就像我在“二杆子”系列里说过的，就是政府给了国民相当的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以及一定的政治自由。家庭和个人活动也有了一定空间，只要你没有威胁到共产党政权，没人管你。“二杆子”也由什么都管改为“抓主要矛盾”，由过去的主动进攻变成了现在的被动防守。你不主动招惹党和政府没人整你，改变了我党在毛时代那种“老虎你刺激它要吃人，不刺激它也要吃人”的野性。毕竟现在的专制，和斯大林毛泽东的专制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中国政治体制持续两千年不变，这不能不说是个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北大著名爱国教授潘维豪迈地说：“中华政治体制，或者中华政体，根子没有变，主干也没有变。不仅仅是 30 年没变，60 年没变，而且是两千年都没有根本的改变。所以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这个政体的历史底蕴是非常深厚的。”意思是正告那些自由主义学者（现在很多人眼里基本等同于汉奸走狗卖国贼），你们想变天，没门！对于这位潘教授的言论，我还是那句话，不管这种教授政治立场如何，也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可以骂他无耻，甚至可以见一次扁一次，但人家说的是事实。中华政体的“根子”、“主干”确实两千年没有变。至于什么时候“根子”、“主干”才能变，按照唐德刚那说不清道不明的“大历史观”推导出的“历史三峡”结论，最快要 2040 年，最迟躲不过 2140 年。

唐德刚认为，中国现在还是秦始皇留下的帝制，还是“千载犹行秦制度”。而这种政治体制改变，说简单点就是实行民主宪政，他认为要经历一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犹如过三峡。不过前途是光明的，过了三峡就风平浪静，从此就可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不管风再大浪再高，历史三峡终有通过之日。而且一旦实现了转型，就是任何人力、物力，都不能

逆转了。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的必然。而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概要二三百年，从 1840 年算起，也就是说最快要 2040 年前后就可通过。

(3)

关于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说”，我想谈谈我的看法。首先我认为人们经常说的“历史的必然”在过去封闭的环境里完全是扯淡。深山老林的原始部落，任其自由发展下去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道路，恐怕没什么必然性。可在一个开放环境，看着别人吃香的喝辣的，个个膘肥体壮，而自己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还整天挨揍，恐怕长不了，都要“思变”，奔好日子，所以这种“必然性”，在不同制度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的情况下还是存在的，这是由人的本性所决定的。另外，这点我也同意，国家一旦顺利地实行了民主宪政，天长日久国民自由自在惯了，再恢复专制，大事小事都要受限制，恐怕也不大可能，至少现在还没有成功逆转的例子。

但我看唐德刚的“二、三百年”时间表未必有什么道理。他的根据是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第一次大转型是在两千多年前，从春秋战国的封建制转到公元前 221 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前后经过了二、三百年才最终完成，所以这第二次大转型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上一次开车从北京到天津用了 1 小时，所以这次也得 1 小时左右，这未免也太简单了点吧！这里面有很多偶然因素，如果没有商鞅、嬴政这类人物出现，这第一次转型还会是二三百年吗？

再就是这三峡是否非过不可，人们还没有过激流闯险滩的要求，我也拿不准。因为这和两千年前的第一次转型不同。当时如果不转型成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分散懦弱的农耕民族，对抗不了“来自北方的狼”。即使有这种合理性，这种转型也没有“必然性”。当时并不是战国七雄们达成共识，决定一起过三峡，而是雄才大略的嬴政出于个人野心统一了中国。

现在和清末的形势也不一样，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位于各大洲的各个民族孤立的生存，文化的发展与进化都是独立进行的，彼此之间不能进行比较和交流，文化之间的先进落后与文化的生存没有关系。鸦片战争以后，人们看到了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距，看到了亡国和亡天下的危险，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外有压力内有动力”。想生存就得发展和进化，想发展就得学欧美，学欧美就得搞民主宪政。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有这个要求。他们之间的区别无非是走英国人的路还是美国人的路。以后看到苏联又“崛起”了，所以共产党又提出了“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最后共产党胜出，于是就走了俄国人的路，建立了极权国家。

现在不一样了，目前中国虽然不像政府吹得那样“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也没有陷入混乱不可收拾的局面，而且三十年来中国经济还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爱国者们还想要输出价值观，用“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中国国力比西方差些，但也还过得去；老百姓所看重的“生活水平”，比有些实行了民主宪政的国家还要高。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了两千年的中国人到底现在有没有实行民主宪政的要求？

中国人对民主自由这些东西，从来都认为是扯淡的身外之物，从来就没有过“不自由毋宁死”。从这点又可以看到农耕社会的务实特点。中国历史上举旗造反不是为肚子就是为权力，从来没有为人权民主自由的先例。当初农民欢迎起义队伍是因为可以“吃他娘穿他娘，吃穿不愁有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而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是因为可以“打倒地主分田地”，跟什么民主自由人权根本不搭界，这也是提出“军政训政宪政”的老蒋干不过老毛的原因吧，两个口号一对比，人心背向就可想而知。邓小平的改革开始得到支持也是因为承诺让人们“富起来”，改革主要选择在经

济领域，只要在经济发展方面作出像样的成绩，就能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再有，现在“落后就要挨打”的现象早已经不存在，委内瑞拉的国防水平比美国落后一个世纪，查韦斯隔三差五的叫骂，至今还没见挨打。退一步说，即使“落后就要挨打”，这板子也轮不到中国来挨，中国周边除了俄罗斯个个比中国落后，吃柿子也得找软的捏才是。就我的实际感受来说，我所接触的工农兵学商，好像都没有那么强烈的转型愿望。社会底层对政府不满不假，可人家盼望的是出几个明君贤相；我周围的识字分子想着民主宪政的还真不多，即使有也是灰溜溜的，其政治影响力可以忽略不计。80 年代倒是不少，原因看着西方国家或者是搞开明专制的亚洲国家都比咱富，我记得当时家属院来个老港老台都当财神爷供着。实际上是羡慕人家的富裕，跟民主没什么关系。如果大家都没有过激流闯险滩的要求，这历史三峡眼下就非过不可吗？

当然，从长远看，我完全同意唐德刚和国内 08 宪章那些知识分子的观点，中国人早晚会有这种要求。莫非看着 13 亿人的命运就由少数人来决定就真那么舒服？看到别的国民用选票决定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自己就真无动于衷？从情理上说不过去。当年马英九获胜，不少人都感动的热泪盈眶，羡慕台湾人获得的“权利”。据说连新左派代表人物何新都发表感言，几乎不能自制（真伪？）。我只是想说明从技术层面上说，版图较小的、单一民族的国家，应当更容易实行宪政（美国是移民国家，另当别论）。而像中国这样有着传统文化积淀的大国，转型难度要大得多。

大陆人“大一统”的核心价值观观念如此顽固坚硬，似乎现在没有一种新的体系可以融化或改变它。大陆人的共同追求，一是自己富裕，再就是希望国家继续做大做强，而不是个体有人权民主自由。熟悉流行歌曲的国内网友都知道，当红歌星屠洪纲有首《精忠报国》，最后一句唱的人热血沸腾、荡气回肠：“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贺！”，这可是 21 世纪流行歌曲的歌词，这表达了全国大多数人的共同心声。

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人们心里都有两个底线：一不能乱，二不能散。也就是说不能出现六四那时候的混乱局面，更重要的是国家不能分裂，而这两条实际上在技术层面上来说难度极大。现在大学里的识字分子们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越来越少了。原因很多，有的是被 64 的坦克吓破了胆，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敢于让人流血的政党。还有就是我在“难说”系列中提到的“识字分子市侩化”，只顾埋头捞钱，不再抬头仰望星空。其实即使还在认真思考中国前途命运的那些人，也不少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观点，原因就是我前边说的那两个底线是碰不得的。

再有就是我们对民主宪政的认识又处在一个什么水平？麦克阿瑟曾经这样说过：“在科学、美术、宗教、文化上，英国、法国、美国已经是 45 岁的成年人，日本不过是 12 岁的小学生。”中国在现代文明的层面上，相对于欧美民族的成熟度而言又相当于多少岁？看看网上网下各色人士的种种观点和表现，就知道我们理想中的国家政体实际上还是大一统集权专制。就拿在本区享有崇高威望的历史学家杨奎松来说吧。最近我在《书摘》2010 年第 2 期第 17 页看到他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走近毛泽东》，他称赞“毛泽东对中国的贡献大大超过孙中山和蒋介石”，人家的标准就是对大一统的贡献。这也是在评论毛泽东的历史功过的时候，很多学者肯定毛的一个原因。杨奎松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无论是在过去袁世凯时期，孙中山时期，还是蒋介石时期，中国都始终没有解决自身的四分五裂的局面。唯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统一。有人说，蒋介石也曾创造了统一的政治格局，但实际上，蒋的统一很大程度上只是形式上的，他并没有解决地方实力派的反抗和离心离德的问题。而毛泽东领导下，却不仅成就了中国大一统的局面，而且破天荒地使工农兵学商，东西

南北中，统统臣服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高度集权之下，长达几十年未曾动摇。”

我在《芦道百害惟利一胆》里面说过，跟老芦打交道这几年（其实只是在网上，我连人家什么模样也没见过，只是推测牙口不太好），最大的收获就是“除了丰富知识、开阔视野以外，芦文的实用价值是可以给你壮胆，让你挺直腰杆，敢于蔑视一切权威，谁都不尿。”还提出过 N 个不怕。而且人人平等，对老中青、左中右和独立知识分子一视同仁，凡事就事论事，不因为他的名头响亮而无条件崇拜，也绝不因为一两篇文章就否定人家一切。这杨教授在这段话中进行历史人物比较的时候，我认为至少犯了这么几个错误：

1、袁、孙、蒋、毛所处时代不同，比如老蒋，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而毛统一中国是在二战结束后的世界和平时期。就亚洲而言，老蒋时期亚洲没有几个国家是独立统一的，我知道的好像就是一个日本（是不是还有泰国？），除日本外，中国是最独立最统一的国家。而毛时代，亚洲没有几个国家不是独立统一的，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来谈历史人物，显然是犯了评价历史人物的大忌。

我觉得中国历史学者爱犯这毛病，比如一提宋朝，就是“弱宋”，全然不顾宋朝初建就要面对的处于鼎盛时期的、有着府台三省六部的契丹帝国。契丹（也就是“震旦”，上二医前身就是震旦大学医学院）不是一个游牧部落，而是一个庞大的帝国，雄霸中国半壁江山，疆域北到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一线，东临库页岛，西跨阿尔泰山，南抵河北和山西北部，在俄语、希腊语和中古英语中把整个中国称为契丹（读音分别为 Kitay，Kita1a，Cathay），在穆斯林文献中常把北中国称为契丹（Khita，Khata），在中世纪从中亚直到西欧，“契丹”一直是对中国的一个通称，可见契丹的影响和实力。在这种环境建起来的宋朝，当然是“弱宋”。以后“弱宋”碰到又是横扫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蒙古铁骑，最后灭亡。强汉盛唐是这样的“国际大环境”吗？各自的对手又是什么人，对于这些，中国的历史学者好像都不需要考虑。

2、老蒋时期的“四分五裂”原因很多，早期有各路军阀，虽然这些军棍武夫各霸一方，对中央政府阳奉阴违，但毕竟还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四分五裂”更主要的原因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国内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自己的政府机构，宪法大纲，还召开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它在中国所要实现推翻政府的基本任务，并付诸实行了几十年。抗战后老蒋完全收拾了各路军阀，“四分五裂”的唯一原因就是老毛。不信现在放上四个野战军（至少也有上千万人吧）试试，看看是否还能“使工农兵学商，东西南北中，统统臣服于”党中央。同理，旧中国的贫困落后原因很多，其中也与此有关。放上四个野战军打上几年，再统计什么 GDP、人均寿命、住房面积、钢铁产量、粮食产量，看看会是什么结果吧。

3、文中所说的“统一”概念也不严密，谁都知道，现在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领土不完整（如藏南、东南海各岛屿问题）、国家不统一（如台湾问题）”的国度，连党中央都把“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当做头等大事。这真是应了那句诗“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红岩烈士诗句）。更重要的是，如果当时老蒋胜出，政绩如何不敢说，也肯定做不到“破天荒地使工农兵学商，东西南北中，统统臣服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高度集权之下，长达几十年未曾动摇。”但老蒋领导下的国家一定是统一的，绝不会出现台湾问题。

这些都不是我要说的。我只是想说通过杨奎松的这段话，看出全国上下无论老中青、左中右还是独立知识分子，都把“使工农兵学商，东西南北中，统统臣服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高度集权之下”，当成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甚至是唯一标准。杨奎松不是毛左，相反还被旗帜网那帮毛

左们恨得咬牙切齿，这跟政治立场没关系。大一统集权专制在中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已经成为一种潜意识，不经意间就会流露出来，我能想象出杨奎松说这些话时的那种情感。而且看得出来，这些历史学家把大一统的“统”，即“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甚至比版图的“大”看得更重。

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国民对“大一统集权专制”都有这么深厚的感情，中国还怎么实行民主宪政，还闯什么“历史三峡”！而且退一步想，即使实行了民主宪政，能有什么结果？如果一旦在实行民主宪政的过程中出现混乱的局面（这种情况很难免），会不会再出个铁血强人，“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重走大一统集权专制帝国的旧路。可别忘了，就是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了两千多年阿 Q、祥林嫂、华老栓们，靠着阴柔的中华文明，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大一统帝国两千年生存奇迹”。

(4)

从道统上看，儒家文化从来都是占主导，孔子孟子常提常新，即使外族当政，也更愿意用儒家理论再加上中国传统的文官制度治国。马列毛在中国折腾了一百年，到头来还得乖乖的滚蛋，搞和谐社会还得从儒家学说中找根据，还得搬出孔孟之道来驯服百姓，当然这在中国大陆能否奏效是另外一回事儿。需要说明的是文革的和五四虽然都是反传统，但两者有本质的区别，五四反的主要是“糟粕”，文革毁的绝对是“精华”。

被当代“国胆”摩罗指为“中国精神大崩溃旗手”的蔡元培就曾公开说过，儒家的五伦五常（据说张五常的弟弟就叫张五伦，不知是真是假，也许是调侃吧），除君臣一伦不合时代外，其余诸伦与“仁义礼智信”五常都具有普适的道德价值。蔡元培还以自由、平等、博爱，来解释儒家的义、恕、仁。因此，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对传统的人文精神和人生理念采取的多是一种认同的态度。五四代表人物胡适死后，老蒋送他的挽联就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就是对胡适的生平和思想的极好写照。

而大陆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正好相反，肯定强化的君臣一伦，全国上下狂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其他诸伦与“仁义礼智信”五常全部被“砸了个稀巴烂”、“打翻在地踏上千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文革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做到了“剔除之精华，吸收之糟粕”改革开放以后又多了个拜金主义，所以现在中国大陆仁义礼智信越来越少，但奴性却有增无减。

学统也是一样，过去学统是为道统服务，论证传承道通，按台湾新儒家代表牟宗三先生的说法：“中国过去是依道统来讲学问，所以只有道统，没有学统，即没有希腊所开出来的那个学问独立这个意义下的学统。”中国人的学统，只有道德独断论的传统，这种传统只要人记忆，不要人理解，不要逻辑分析、判断、推理，更不可能有贯通，中国人基本上已丧失了逻辑推理和理解的能力，更匮乏需要抽象综合、贯通的创新能力。现在中国的教育也是为政治服务（实际上是为政权服务），无非就是把孔孟之道变成了四项基本原则。也还是学以致用，终极目标就是培养各种工匠，“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跟西方探索未知世界是两回事，人格独立、精神自由就更谈不到。

虽然从秦汉开始“道统”、“学统”已经全部归拢到“政统”的统帅之下。“政统”压倒“道统”及“学统”、使后二者成为附庸。但相比较而言，过去的“道统”和“学统”还有相对的独立性，君权虽然至高无上，但只能管一些具体事儿，所以“道统”和“学统”多少对至高无上的君权还

能起点制约作用，至少皇帝无权发布康熙主义、雍正思想、乾隆理论，皇帝可以杀士，但不能随意修改儒家学说，那是“天道”。不像现在，道德体系和教育体系完全为政权服务。

所以，中国确实称得上当今世界的一个异数。也就是 7171 网友说的，传统文化确实有它“行”的一面。依我看，这“行”应该归功于秦皇汉帝的武功和三代儒家的文略。中国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君权专制帝国，我认为是始于秦皇，成于汉帝。让这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君权专制帝国维持两千年的，是三代大儒所创建的儒家学说理论体系。

在秦始皇之前，中国处于类似欧洲的封建社会。中国近代为世界贡献了两个最大的黑色幽默故事。一是轰轰烈烈搞了十几年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中国从来没有过资本主义，连我党教科书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何来资本主义复辟？再就是不屈不饶进行了一百多年的“反封建”。什么是封建主义？百度搜索结果是：封建主义（feudalism）：欧洲从 9 世纪到大约 15 世纪建立在以封地采邑的形式占有全部土地，及由此而建立的领主与封臣的关系基础上的政治经济体系，以佃农的效忠、服兵役以及没收财产为特征。

简单的说，封建就是“封土地、建诸侯”。就是分“封”一些王族的子弟、亲属以及开国功臣等在各地“建”立一些相对独立的王国，它们在人权、财权、军权上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又供奉中央政府（“跟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有点类似）。周朝政治制度就是封建制，周灭商后，国王把王族与功臣分封到国家各个地方，建立起众多诸侯国。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按照血统远近以区别亲疏，建立起一个以周“天子”为中心，各个诸侯国围绕的封建王朝，同时建立起一套礼乐制度，形成了一个有秩序的封建国家。

这种政治制度对人性的压制相对较弱，所以春秋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思想璀灿的时代，创造了无比辉煌的先秦文化，是中华古典文明的全盛时期，对后世历史的发展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同时社会极不安定，群雄逐鹿，民不聊生。而且这种“只有省防，没有国防”的松散联合体难以有效对付来自“西戎北狄”的袭扰。于是秦始皇统一后就不再实行封建制，而是推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权专制，全国实行大一统，一切权力收归中央，权力又集中到皇帝手中。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还焚书坑儒，砍了不少议论朝政知识分子的脑袋，又修了万里长城。秦始皇因此充满信心，认为“二世三世传至万世而为君”。中央集权的体制郡县制虽然是秦代所创立的，但因太过集权，而且秦始皇为所欲为滥施暴政、横征暴敛，仅仅十几年庞大的秦帝国就灰飞烟灭了。

汉朝接受前代的教训，开始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搞一半分封，一半中央集权，但这样中央政权缺乏力量抵御匈奴的进攻，内部的诸侯国不久还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事实证明还是行不通。以后汉武帝采纳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封国越分越小，诸侯的势力越来越弱，最后便成为由汉王朝郡县直接管理的区域了，实现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以后靠着三代大儒所创建的儒家学说理论体系，使大一统集权专制能够“可持续发展”。所以真正意义上塑造中国政治传统的郡县制，应归功于汉王朝。

中国选择大一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农耕为主的中国社会的必然。这种大一统社会的最大优点我认为有两条：一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对内可以垦农田修水利，对外可以抵御侵略；二是相对稳定，不容易出大乱子。在没有出现大规模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的情况下，星星之火，难以燎原。它使中国形成了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使中国古代经常能维持长达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长治久安。现在也是一样，像非洲某些小国，出动一个营的兵力，一连长带兵封锁机场，二

连占领电台，三连包围国会大厦，基本上政变就算是成功了。当年 64 学生运动领袖可能就是因为这些新闻看多了，以为中国事儿也可以这么轻易搞定。

当然，这大一统的集权专制的代价就是压制人性、锈蚀了人的智力和创造力，让几亿民众服从于一种理念、一个集团乃至个人，全国人民成了一个被洗脑的群体，被剥夺了思考权利与能力。这使得中国两千年来基本上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基本上“无所发明，无所创造，无所前进”（篡改自毛主席语录），掰着指头数来数去只有区区的四大发明，其中指南针和活体印刷术是不是中国最先发明的还有争议，而“一硝二磺三木炭”的黑火药除了对烟花爆竹业的贡献外，到底对以后的科学发展、生产生活还产生了什么影响，我还真说不出来。欧洲在旧帝国分崩离析的基础上形成了许多独立的小国，而正是由这种国家组成才使得科技革命有可能在欧洲实现。如果欧洲一直是“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估计情况和中国差不多。

中国的文化艺术方面要比科技表现好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博大精深，至少博大没什么疑问。这里面原因很多，首先是儒家重视文化教育，把做学问视为大事，围绕这那些圣典，写了不少心得笔记，即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要不就是没完没了地在那拾遗补缺。游牧民族的最大问题就是不重视文化教育，像契丹帝国（辽）宫廷中，一向严禁读书。他们认为读书不但浪费时间，还会把一个人的脑筋弄得太复杂。皇子贵族如果想求得知识，就得冒着“私自读书”罪名的危险。所以他们的文化发展很慢，也没有留下什么值得骄傲的典籍。那么辉煌的庞大帝国，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发现任何用契丹文编写的书籍，发现的契丹文字只是墓碑上的墓志铭。

从艺术上讲，幅员辽阔、民族和人口众多保证了中国艺术的数量和多样性。就拿歌曲来说，几亿人口与几百万人口比山歌，人多嗓门多调调多，你歌哪有我歌多，我有十万八千箩。不信你往船上看，船头船尾都是歌。这不是瞎吹，就拿地方戏来说，中国就有 300 多种，绝对可以称得上世界之最。而中国人所特有的生存智慧和巨大的种群，保证了文化香火没有断掉。所以，即使在今天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在“落后不一定挨打”的今天，大一统给自尊心和自信心带来的巨大满足感仍然不能忽视，毕竟奥运会金牌数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统计的。

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农耕文明，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华民族是典型的农耕民族。现在也是一样，甭管什么高官大儒，也别看穿什么西服革履，也不过都是刚抖落了身上的高粱花子，身上也还留着泥土稻谷的芳香，彼此之间的区别就是早几天晚几天的事儿。这里面没有什么贬义，我本人也是一样。“农民自有农民的感情，农民自有农民的抱负，农民自有农民的性格”（注：篡改自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我用“农民”替换了“战士”），我觉得农耕民族性格，和游牧民族、海洋民族比较起来有很大的差异，前者的草食动物和群居动物的特点多一些，后者则是肉食动物和独居动物的特点多些，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尤其是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这种民族性格的差别正在缩小，这些我放在后面再详细说吧。

(5)

关于儒学，有三种分期方法，我认可的是李泽厚的儒学四期分法：第一期是孔、孟、荀所代表的原始儒学，是“儒学铸造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是第二期；第三期是宋明理学，而现代新儒学的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等人为第四期。

我不同意现在动辄就提“原儒”的做法，也不认可“孔孟是好儒，坏菜的是后来汉儒和宋儒”的

说法。我认为应该维护汉儒董仲舒和宋儒朱熹的历史地位。

我认为孔孟与董仲舒的关系有点像马恩和列宁之间的关系。老芦说，正是因为列宁发明了“革命工艺学”，或曰“人民控制论”才实现了无产阶级领袖对人民的控制。正是董仲舒，用儒家思想实现了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达千年的思想控制，开启了中国思想统治的历史，保证了大一统集权专制帝国得以延续至今。我认为黑格尔对孔子的《论语》评论是正确的：“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在哪一个民族文化里都找得到”。而董仲舒把各家学说整合为一个完整精致实用的思想体系。比如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大臣受命于皇帝。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这样才能够使得儒家理论有了实用价值，为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如果没有董仲舒的当年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出“君权神授”、“三纲五常”（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恐怕儒学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

这也使我想起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历史上好像从来没有过宰相篡位的情况（请网友帮我把关，看看有无疏漏）。王莽是外戚，另当别论。一世奸雄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自己却不敢登上皇帝的宝座。以后曹丕称帝属于“禅让（外禅）”，汉献帝命人搭了一座“受禅台”，又挑选了一个良辰吉日，曹丕还要装成迫不得已状，这才完成篡党夺权。也就是说，要想“夺了鸟位”，必须杀去东京，或者是兵变，或者是农民起义。而且在起事之前，还要装神弄鬼，证明天道已变。

朱熹的贡献更是不可抹杀。西域的佛教于东汉传入中国，当时又产生道教。经过魏晋南北朝，到了隋唐，佛教中国化，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学者大都出入佛、道，有压倒中国主体意识儒家之势。如果真要是佛教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的话，大一统集权专制的寿命就指日可待了。大一统集权专制存在的前提是尊卑有序，是“服从”，顺序就是君——臣——民，以后毛主席形象地解释为“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本人才疏学浅，看不到佛教和道教里有类似的内容。相反，佛教还提倡平等，就连佛也不例外：“佛是往日的众生，众生是未来的佛”，就连犯罪分子也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让人联想起“人人可以做皇帝”）。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挺身而出，拨乱反正，排佛抑道，同时以儒学为主干，批判性地吸收了释、道的一些理论，重新树立起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儒家的正宗地位，建立起适应时代要求的、完整的新儒学思想体系。

没有汉儒和宋儒，就没有完整的儒学体系，就没有中国的持续了两千年的大一统专制帝国。若否认他们，就是否认儒学，若反对他们，就是反对儒学。没有汉儒和宋儒，中国能够长期维持大一统的集权秩序吗？中国的儒教思想包罗万象，包括政治构架、家族伦理、社会秩序，作为一种内化的立体信仰全方位对国民进行的控制，光是“原儒”做得到吗？中国人擅长阉割术可能是有传统的。据记载，中国阉割术的渊源是相当久远的。有证据表明，至迟在殷商时代就有了阉割男性生殖器的意识与行为。现在看来是不假，中国人就是好这口，而且刀快手麻利。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阶级斗争学说”，“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是任何 50 岁以上的中国公民耳熟能详的毛主席语录，而且毛主席说的还很具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应该设法和那 5%（约 8—9 千万）的阶级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老人家刚去世没几年，新老左派们就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无耻阉割，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了“为人民服务”、“两个务必”、“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中医药是个伟大宝库”这类不咸不淡

的中性玩意儿。现在搞传统文化的又要对汉儒和宋儒下手，想把人家踢出儒家圈子。没有汉儒和宋儒，我还真想不出来儒学是个什么样子。就凭着“原儒”那些语录能做到吗？光靠“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中国的大一统能走到今天？靠孟子的“民贵君轻”，能保证百姓服从皇帝？恐怕帝制早就被推翻了，等不到辛亥革命。

而且，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和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也并非一无是处。儒家学说中有尊君思想，也有民本思想。一个集权政体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都要由民众生产出来。民众安居乐业，社会才能正常运转，社稷家国才得以保全。统治者要求得社会的安定，首先必须懂得民众的重要和艰辛，体民恤民。“仁政”、“王道”学说，都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民本思想的反映。三纲确实加重了中国人服从的奴性，但另一方面，也告诫君主，即便天子也须得道，考虑民意，不可过分胡来。你当老大要有老大的样，要以身作则，还要处处想着罩着小弟；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固然导致了人性的压制和扭曲，他把人欲看成是非正常理性的欲望，是超乎社会生活水平和道德伦理要求的，而天理是国家社会之最根本的需要，要把人欲纳入天理的轨道。儒家学说本身就是为大一统集权专制服务的，所以，对维护国家稳定来说，没什么错。而且“灭人欲”对抑制君王贵族和士大夫过分的贪欲也起了一定作用。

这第四代儒家也就是当代新儒学，按他们的代表人物牟宗三的说法，他们的学术使命和文化使命就是“三统”说：“一，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二，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三，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

说到五四以来的当代新儒家，大陆与海外、港台以及过去民国新儒家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海外、港台新儒家作为一个富有传承性特色的学派，至今已有三代人薪火相传。民国 20 至 40 年代以梁漱溟、熊十力为代表的第一代，50 至 70 年代以港台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劢为代表的第二代，80 年代崛起的第三代新儒家以海外和港台的杜维明、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为代表。对这些人我还是有几分尊敬，甚至有些地方还认可。里面我稍微熟悉一点的是牟宗三。

90 年代以后大陆也跟着起哄，也弄了个“大陆新儒家群”出来，有蒋庆、陈明、盛洪、康晓光，名气最大的代表人物是深圳的教授蒋庆。这些人良莠不齐，政治主张好像也不完全相同，但给我的感觉是搞大批判、空喊点“王道”“仁政”倒还在行，一点正经像样的主张也拿不出来。另外，他们和海外新儒家的最大区别、也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坚决抵制民主，按康晓光的原话说就是：

“中国应该拒绝民主化，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选择‘儒化’，也就是说，根据儒家的精神重建中国社会。”“对于中国来说，西方式民主，作为工具是没用的，作为价值是不好的。说它‘没用’是指它不一定能解决政治腐败问题，不一定能打破官商勾结，不一定能保护大众的利益，也不一定能限制精英的掠夺，相反，还有可能带来经济衰退、政治动荡、国家分裂。说它‘不好’不是说自由民主主义的合法性理论无法自圆其说，而是说它无法在实践中兑现自己的承诺，到头来还是一套谎言。所以，我们应该抛弃它，至少不应该不假思索地接受它。”

海内外民国新儒家的共同点就是以捍卫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希望在中西方文明融合中尽可能地多保留些中国文化，最好是能在在中国传统文明的基础上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像大陆的新儒学，成了一个很特殊的政治派别，属于那种“举起左手反对民主自由派，举起右手反对毛主席”（篡改自毛主席语录，原指戴季陶）。原因是二者都引入西方祸水，区别一个是从西方引入了马教，一个是想引入民主政治。相比较而言，他们“防左，主要是防右”。原因一是左派的主张毫无可

行性，永远上不了台面，毛泽东思想死灰复燃毫无可能；再就是毛主席虽然也破坏传统文化，但就像林彪在《571 工程纪要》里所说的，毛主席是“披马列之皮，行孔孟之实，执秦王之法”。也就是说，毛主席追求的还是集权专制。

他们对江泽民提出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的提法非常兴奋，认为中共正在向传统回归。下面是大陆新儒学代表人物康晓光的一段话：

“中共也拒绝接受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譬如儒家。实际上，中共以‘五四’传人自居，以‘掘祖坟’为荣。共产党搞的一套就是全盘西化。马列主义难道是中国的东西吗？它完全是西方的东西。中共现在口口声声反对全盘西化，实际上它是用自己的全盘西化去反对别人的全盘西化。它自己西化之后就不许别人再西化了。像中国这样由政府领导，全民动员，全心全意地、有系统地摧毁自己的传统文化，你能在世界上找到第二个吗？找不到。古今中外，独此一家！”

“历时近百年的全盘西化和掘祖坟运动，在毛泽东时代走向了顶峰。物极必反，邓小平时代开始转向，但另一种全盘西化也乘虚而入。江泽民时代开始了真正的回归。我们从共产党的口号里就可以看出这种变化。毛泽东时代讲的是世界革命、共产主义。邓小平时代比较中性，讲现代化。到了江泽民时代就不一样了，明确提出要建设小康社会。‘小康社会’完全是一个中国本土的政治哲学概念了。准确地说，这是我们儒家的东西。胡锦涛似乎在把民本主义引进中共的政治哲学。所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和胡锦涛，中共是一代接一代地向传统文化回归。”

“江泽民提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请记住，邓小平时代讲的可是‘振兴中华’。‘振兴’有另起炉灶的意思，暗示过去我们不行，今天才开始争取辉煌。而‘复兴’就完全不一样了。‘复兴’本身是对历史的一种肯定。它意味着肯定过去的伟大，也承认曾经的衰落，更意味着重新崛起，再次赢得新的伟大。从‘振兴’到‘复兴’是非常重要的变化，决不是无聊的文字游戏。实际上，这种文字的变化体现了中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的革命性转变。”

(6)

新儒学派主张坚持儒学治国，这里面有感情的因素，就像台湾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说的：“身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不希望佛教作为常道；就这个立场而言，我们同样不希望以耶和华、摩西那一套，来作为中华民族的常道。”另外，全盘西化也有实际困难在里面：“一个国家民族不能没有常道，如果把常道去掉，那么这个国家就麻烦了。”牟宗三这里说的“常道”主要就是指孔子所阐发出来的仁义礼智信等人伦之道。海外新儒家想在这个基础上全方位、深层次地引进西方文化。也就是这些新儒家希望自己能够像当年新儒家朱熹那样，批判性地吸收佛教，以儒学为主干，把外来的佛学融合在一起，使儒学壮大起来，重新树立起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的权威，使中国文化沿着孔子所开创的内圣外王的轨道往前发展，最后在儒道释中维护了儒学的主导地位。

日本学者丸山真男也提出过类似的说法，这就是所谓“古层”和“执拗低音”的说法。“古层”的概念是来自地质学的术语，“执拗低音”的说法是音乐学的比喻。丸山真男认为，在日本思想世界的“古层”上面，堆积的是儒学、佛教、天主教、自由民主主义等等外来思想，但“古层”即日本固有文化却一直延续着。在近代日本，欧美近代思想虽然居于压倒性“主旋律”的位置，但它也常常被低音部的某种音律，也就是日本自身的文化思想所修饰，这种“执拗低音”有时成为背景存在，有时被主旋律掩盖，但是它始终存在，有时甚至压倒主旋律。他以为，这和他一直强调的“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是很接近的，一方面它是古老的，另一方面它是执拗的，任何

一个主流思想，无论是外来的新观念，还是上层的创造性思想，必然在进入社会生活的时候，经由深入民众的一般知识思想信仰的影响，形成某种妥协和变形，甚至是改造和扭曲。

对于儒家的学问，我完全是门外汉，只能引用梁启超对儒家学说的概括："儒家哲学，范围广博，概括起来，其功用所在，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其学问最高目的，可以《庄子》'内圣外王'一语括之。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外王。至于条理次第，以《大学》上说得最简明；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就是修己及内圣的功夫；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安人及外王的功夫。"（注：这就是所谓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牟宗三这个新儒家看来，当代新儒家的使命还是使中国文化沿着孔子所开创的内圣外王的轨道往前发展，在现代社会中由"旧内圣"开出科学民主"新外王"，也就是从"道德主体"转出"民主"与"科学"。

这实际上就是在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性的"内发性"元素，然后在本民族文化中发掘出使国家再度崛起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具体说，中国原典中没有明确论及"民主"，可以对原典进行逻辑推演，论证出"民主"来，用易中天的说法，这种方式叫"抽象继承"。依我这外行看，从逻辑上说，儒家的"旧内圣"推演不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但是可以保留"旧内圣"引入"新外王"，当然，这个引入一是要有选择，二是要循序渐进，做到我党所说的"有理有利有节"。

我不知道台湾新儒学对政府有多大影响，好像台湾教育体系还一直把儒家文化当作哲学基础。从当前台湾的政治社会实际情况来看，也能看出点这个意思。就连老蒋也是一样，真的假的不说，至少表面上尊孔，还提倡"四维八德"："礼义廉耻""忠孝仁义信爱和平"。从我在海外接触的港澳台来看，多少都能感觉到"仁义礼智信"的影响，待人处事"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但同样是这帮人，一到了大陆，就撕去了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狰狞可怖的嘴脸了，造假便造假，行贿便行贿，看不出和大陆人有什么区别。

另外，就是想方设法从传统儒家文化中找出些和西方普世价值"暗合"的东西出来。比如说，西方的民主制度就是两千年孟子说的仁政。蔡元培当年也以自由、平等、博爱，来解释儒家的义、恕、仁。这项工作确实大有可为，搞得好还可以证明我们比西方又早了几千年。再比如说，有人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可以作为中国的人权思想来输出。海内外新儒家们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成绩卓然。实际上不仅新儒家在做，很多人都在做这项工作。我认为这是一项值得做、应该做而且容易做的工作。这不是调侃，这是我的真实想法。

说值得做、应该做是因为儒家学说有很多合理的地方，有些"放之四海而皆准"道德常识，而这些有益无害的东东，用中国人自己的语言说出来，而且是现代人看着非常优美的古代语言说出来，容易接受，便于记忆，效果可能会很好。比如将来中国实行民主宪政，可以打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旗帜，追求平等，可以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策略上说这样做使国人感到亲切，甚至激发民族自豪感，至少招人反感的程度会轻一些。

另外，儒家学说本质上是保守的、封闭的。在当今社会出现的人欲横流、过度消费等问题，用儒家理论纠偏、制衡一下未尝不可。这坛子里的中医人士都知道，用中药治病本质上是用药物的"偏性"纠正人体的"偏性"。于是就有了"热者寒之"、"寒者热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目前对于种种社会问题，西方至少还有宗教，我们除了谁也不信的政治说教却拿不出任何"思想武器"来，借用一下祖宗的玩意，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项。

而且很多儒家学说的副作用现在都不用担心了，比如说孝道，过去因为被过分强调，束缚了青年人的个性发展，现在似乎没有担心的必要。“卧冰求鲤”、“割肉疗亲”绝无可能出现，我们这些老家伙不被“割肉疗子”就已经知足了。

当然，还有个“度”的问题。前几天还有人和我讨论，说现在人太自私，文革时提出的“恨斗私字一闪念”没什么错。泛泛这么说是没什么错，但如果农民养三只老母鸡就要挨整，当然是荒谬了。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这古老的儒家说教效果恐怕也很有限，古代社会也是问题一大堆，并不像书上描述的那么好。有些问题不存在是因为社会活动简单，不完全是儒家学说在发挥作用，但我想总比搬出那些政治教条好。

我说很容易做，一是因为大儒们有无数的语录，要什么有什么，里面总可以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就跟毛主席语录一样，雄文四卷不是都讲阶级斗争，总有些“为人民服务”、“两个务必”之类的有益无害的东西。二是古文含义模糊，怎么说都有理。如“格物致知”可以等同赛先生，以此说明科学精神；从庄子的“逍遥游”、“齐物论”，可以推导出现代自由、平等、宽容等理念。这里面最成功就是“天人合一”，现在连文盲都知道古人在两千年以前就有“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观念，实际上是董仲舒借人与自然的关系阐释人与人之间尊卑贵贱的位置。

我记得那句广为流传的“学而优则仕”，文革批林批孔的时候，“优”解释为“优秀”意思是“读书读得好，就去做官去推行孔孟之道”。粉碎“四人帮”后，有学者出来大骂“四人帮”说这里面的“优”还通假“悠”，是“悠闲”、“空余”的意思，“学而优则仕”的意思就成了“学而有余力者，不妨去做做官推行仁道。”到底谁对谁不对，我现在也糊涂。专家们上下一张嘴，横竖都有理。

港台和海外新儒家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的价值之源，坚持“返本开新”、“中体西用”的文化立场，但并不反对民主、科学和现代化，而且认同民主宪政。希望在实行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时候，能够尽可能地保留中华文化传统。其实当年就连陈寅恪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也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已经不可救药：“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而大陆的新儒家和港台海外新儒家的最大区别，一是水平比较“菜”，经常闹点弱智笑话；再就是认为中国绝不能搞西方民主宪政那一套。

其实这也是国民党和我党的根本区别。国民党也搞独裁专制，我党也说民主宪政，但在我看来两者都是权宜之计。我党不管在掌握政权之前说过什么，但最终目标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毛主席语录），在这一点上，“共产党人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 我党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还没有实现、资产阶级还未消灭之时，要一党专政到底，决无还政于民之心；而国民党最终目标是民主宪政，要还政于民。大陆人对老蒋这位失败的政治家最不齿的就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这“独裁无胆”固然跟老蒋的个人性格、魄力和能力以及国内外形势有关，但另外一个方面，还因为他身上背着“民主宪政”的沉重包袱，犹如《水浒》中林冲带着枷锁迎战洪教头，几个回合之后，就跳出场外乖乖认输。以后柴进贿赂公差给林冲解开枷锁，并拿出一锭大银作为彩头，比武重新开始后林冲方能亮出真本事。

以后蒋家父子到了台湾接受教训，去他妈的民主宪政，先把方方面面搞掂再说。蒋经国有所谓“斗士”之称，用他在苏联学到的那套本事，跟三种势力斗：和我党斗，和美国人斗，和自由派斗。等到各种威胁都解除了，局势也稳定了，不管个人是否情愿，还要实行民主宪政，还政于民，这是国民党的性质所决定的。

(7)

按照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蒋庆教授的说法，中国若想长治久安，绝不能搞民主宪政，而是一定要搞“王道政治”。在蒋庆看来，不要说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连讲究心性之学的民国和台湾新儒家也都走上了邪路，中国近代吃亏就是由于没搞王道政治，不然的话早已是人间天堂。“‘王道政治’就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下面都是他的原话：

“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出现了偏差，即中国所有的政治思潮都把民主作为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中国在今后的政治发展上不应再以民主政治作为发展目标（不管是西方式的真正民主还是某某主义的民主或者儒家的民主），而应回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以代表中国文化理想的王道政治作为发展目标，这样才能既符合中国历史文化的国情要求，又符合人类追求永恒秩序与天人和谐的心灵要求。”

另外，他们和本区敬爱的特首一样，非常关注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我印象里老芦好像多次提到，至少在提到“非遗传的专制”时说过）。如康晓光就认为毛时代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在这个前提下，我党是合法的：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有自己的合法性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为它提供合法性论证的。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谁认识了呢？马克思！马克思认识到了这种规律。马克思通过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证，指出社会发展要经历五个阶段，一步步地、必然地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必然要埋葬资产阶级。但是单靠无产阶级自己还不行，还要有先锋队也就是共产党来领导才行。这样一来，这种学说就把共产党的领导权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确定下来。”

而老邓只有靠政绩来赢得被统治者的认同：

“中国改革的最大压力来自经济领域。面对西方的示范压力，执政者需要在经济发展方面作出像样的成绩，才能给被统治者一个交代，才能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经过二三十年的冷战，一个“共识”被逐渐接受，这就是市场经济能够比计划经济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所以，邓小平的改革，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当然，他也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经济领域中的市场化改革，确实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增长，而持续二十多年的惊人的高速增长，也确实为共产党提供了“政绩合法性”，为中国的政治稳定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但现在，出现了贪污腐败、分配不公、高房价等问题，光靠“政绩合法性”不行了，需要“王道”“仁政”。如蒋庆教授就认为，过去为什么社会稳定，就是因为搞了“王道政治”，近代以来中国动乱，不是“丢了两把刀子”，也不是放松了“二杆子”，而是丢了“王道政治”这个镇山法宝。因为不搞“王道政治”，政权就失去了合法性：“中国近百年来政治动荡，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最

根本的问题则是政治秩序合法性的问题。此一问题不解决，中国的政治权力就不会获得合法的统治权威，中国的政治秩序就不可能长治久安，而随时都处在动乱的边缘。”“中国人的政治理想不是民主，而是王道。王道不是中国专制时代的政治形式，而是中国人的政治理想。”

“儒家的王道政治就是要全面而完整地解决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建构起一个长期稳定合谐的政治秩序”。具体说蒋庆谈到了“三重合法性”：

第一重谓“天”，即超越合法性，又叫神圣合法性。任何政治秩序，必须有一个超越神圣的价值源头，政治秩序才能合法。儒家则通过大一统的思想建立超越合法性。大一统确立的政治秩序超越合法性是防止国家社会动荡的治乱之道，所有稳定和谐长治久安的政治秩序都必须建立在大一统所确立的超越合法性之上。
第二重谓“地”，即文化合法性，又叫历史传统的合法性，是指任何政治秩序或政治权力均不能背离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若政治秩序或政治权力背离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即不具有历史文化的正当性，因而就不合法；
第三重谓“人”，即民意合法性，又叫法理合法性，指的是政治秩序必须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上，得到人心的广泛支持。一个政治权力获得人心民意的广泛支持就合法，否则就不合法。

蒋教授看来，民主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人心民意”一家独大，缺乏制约。而人民经常是自私而短视而缺乏道德的，“考虑得最多的是自己当下的切身利益，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油盐柴米酱醋茶”，“只剩下赤裸裸的欲望而不再有未来的希望与生命的激情”，所以“政治走向平庸化、人欲化，政府变成了公司，政治领袖变成了董事经理，政治统治变成了合同契约，一切都可以用金钱利益来衡量，昔日政治中的理想追求与崇高人格已不再可能。”而蒋庆认为他的“王道政治”是“三个代表”：“代表了天道、历史与民意，能够最大限度地把统治的权力变成统治的权利，把国民的服从变为应尽的义务”。

其实，新儒家想法是好的或是比较好的，可惜在当今社会没有任何可行性，这不是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就拿解决生态平衡来说，确实当今世界存在着环境污染、臭氧层破坏、人口爆炸等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古代确实也没有，但这绝不是因为古人有什么超人的智慧，而是生产力低下、科技落后，根本无法制造酸雨、破坏臭氧层，不饿死就不错了，何来人口爆炸？古代每次战争结束都会出现一个百姓安居乐业的“盛世”，原因之一就是砍掉了大量吃饭的脑袋。我前一段去农村感受也很深刻，80 年代以前人们也没什么环境保护、生态平衡意识，但老百姓手里的家伙是斧头、手锯，忙活半天砍不了几棵树，现在可不得了，化几百元买个电锯，几天就是光秃秃一座山！

用儒家学说解决政治问题也是一样，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要比古代复杂的多，而且又是一个开放体系，远不是靠着《论语》《资治通鉴》就可以知天下的。若是仅仅坐而论道、义卖点公羊家学说便也罢了，组织些少年儿童摇头晃脑地“诵经”、“读典”，可笑固然可笑，但学习“孔融让梨”总比学习刘文学的故事要强。要命的是人家大陆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蒋庆教授还偏偏不知藏拙，提出了具体的构想，“在制度层面落实吾国古圣先贤确立的‘政治权力三重合法性制衡’的理想，结合西方的三权分立，搞‘三院制’”。此构思极具无厘头搞笑功能，简直可以砸相声演员的饭碗，给人的感觉是本来就弱智的脑袋又被驴狠狠的踢了一脚，下面是他的具体政权框架和人事安排：

“王道政治在‘治道’上实行议会制，行政系统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议会实行三院制，每一院分别代表一重合法性。三院可分为‘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通儒院’代表超越神

圣的合法性，‘庶民院’代表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国体院’代表历史文化的合法性。”

“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人员产生上蒋庆教授是这样安排的：“‘通儒院’由推举与委派产生，‘庶民院’由普选与功能团体选举产生，‘国体院’由世袭与指定产生。” 具体说就是：

‘通儒院’议长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担任，终身任职制，可不到位，委派代表主持院事；议员来源有两个途径：一、社会公推之儒家民间贤儒，二、国家成立通儒学院，专门培养精通《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之儒士，经过政治实习和考核，委派到国家、省、市、县级议会任议员。其议员产生之规则制度可效仿吾国古代之‘荐举制’与‘科举制’。

金评：若去年季羡林先生还在世的时候，这议长肯定是季老无疑；“可不到位”又保证了博士生照样带，革命生产两不误。现在季老已仙逝，我看东海一枭先生倒是合适人选，大儒绝对够格，至于当前“儒教”是否“公推”就不得而知了。而且这政策若真实行，各大学中文系就要改名为“通儒学院”，报名火爆，我们学校那帮中文系教授非乐疯不可。

“‘庶民院’议长议员则按西方民主政治议会产生的规则与程序产生”。

金评：本坛大部分网友为理工医农专业，只好奔着“庶民院”去了。只是不知道“西方民主政治议会产生的规则与程序”跟“通儒院”的“公推”有什么区别没有？还是像西方那样到处拜票？这可有悖《春秋》精神。

上面两条尽管荒谬，毕竟还有可操作性，最难办的还是“国体院”，蒋大教授“余思十余年”后是这样安排的：

“‘国体院’议长由孔府衍圣公世袭，‘国体院’议员由吾国历代君主后裔产生（即依《春秋》‘存二王后’的原则）；由历代圣贤后裔与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产生（即依‘礼三本’圣贤为文化之本而报之的原则）；由社会贤达产生，（即依《春秋》‘选举’原则--选贤举能的原则）；由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产生（即依《春秋》‘通三统’的原则）”。

“通三统”落实起来倒没什么困难，“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在当今人大政协中都是现成的，直接把关系转到“国体院”就行了。可这“存二王后”、“礼三本”落实起来可不得了，“历代君主后裔”、“历代圣贤后裔与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少说得有几千万，光是号称百子千孙的文王，其后裔少说也有几百万吧，那姓孔姓孟的个个都是“圣贤后裔”。诸位网友也帮我留心一下，看看“历代君主”和“历代圣贤”中有没有姓金的，咱也弄个“国体院”议员干干。

蒋庆教授三院之间的互相制衡是通过这样的运作方式实现的：

“三院中每一院都拥有实质性的权力，法案必须三院同时通过才能颁行，最高行政长官也必须由三院共同同意才能产生。如果一个法案由‘庶民院’提出有利于民众，但违背天道，‘通儒院’不同意则不能成为法律，如关于单性家庭合法化的提案；反之，一个法案由‘通儒院’提出有利于天道，但不符合民意，‘庶民院’不同意也不能成为法律，如西方绿党许多保护生态的提案过于激进与超前。再如一个法案由‘庶民院’提出符合民意，但不符合历史文化传统，‘国体院’

不通过也不能成为法律，如关于全民公投改变国号、国语、国教的提案和分裂国家领土的提案。由于三院制中每一院都具有通过法案与决定最高行政长官的实质性权力，‘三重合法性’在‘治道’层面得到了制衡，每一重合法性都不可能独大，因而都不可能排斥其他合法性而通过具体制度安排主宰控制政治过程。也就是说，每一重合法性都可以在与其他合法性制衡的制度安排中恰当地、受约束地实现自身，同时又取得其他合法性的认可而不侵害其他合法性。”

袁伟时先生给蒋教授的“三院制”概括了一句话：“中国要回到政教合一的体制，由儒教的‘大儒’、‘贤儒’加上血统高贵的前贤后裔集体君临天下，保留对国家一切大事的否决权和决定权，需知在三院中他们笃定支配了国体院和通儒院！”

中华传统文明，说到底就是农耕文明，在今天这个时代，是一种落后文明。文明有先进与落后之分，这没什么可讨论的。农耕文明的辉煌毕竟远远不能和西方工业文明相比，人家“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如道光帝所感叹的：“两只夷船不能击退，可笑可恨! 武备废弛，一至如是，无怪外夷轻视也!”大陆那些新儒家们，“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还鼓捣出“三院制”来抗衡，这本来没什么可讨论的，我把他们的观点贴出来，无非是让诸位见识一下，什么叫“没有最蠢，只有更蠢”。其实早在“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康乾盛世顶峰，胜负的大局便已铸定。对这一点我非常乐观，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较量的结局，一定是工业文明在中国取得最后的胜利。

说中华传统文明“行”，是因为中华文明是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和湮没的文明，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一统集权专制帝国存在了两千多年，而且今天还在顽强抵抗，眼下还看不到有溃败的迹象。我想这主要和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有关。“精深”是因为中华文明积淀了几千年，是“集农耕文明之大成”，根深蒂固；再有就是中华文明的规模非常“博大”，用炒股的话来说就是“底盘大，炒不动”。以前和游牧文明碰撞、融合的结果是吸收些戎狄的细枝末叶，如胡琴、胡床（马扎）、胡服、胡乐、胡舞、胡麻、胡饼、胡桃、胡椒、胡萝卜；但主干、主根（潘教授语），也就是语言文字、儒家学说、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始终没变。工业文明当然和游牧文明不能同日而语了，是比农耕文明高出几个数量级的文明形态，但恐怕“底盘大，炒不动”现象依然存在。

所谓现代化，就是从农耕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的过程，是集体主义文明向个人主义文明的变迁。工业文明是以工业化为重要标志的一种现代社会文明形态，我想至少应该包括工业化、城市化、法制化、民主化等特征。就拿这“城市化”来说吧，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福利体制，以及国民的身份、生产方式、思维方式、人际关系、精神理念等全方位抖落掉高粱花子，而这些谈何容易。所以从这点上看我非常悲观，觉得中国再往前走困难多多，弄不好还会反复，在某些时间段里甚至还会进一步退两步。

前边“我要注册”网友提出的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子、孙子或重孙子。这道理很简单，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民本身是一个落后的阶级，这符合马克思的观点，因为农民始终与农业生产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中华传统文明是一种农耕文明，中华传统文化是农耕文化，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很多还保留着农耕社会的一些特点。一般说来，一般而言，上层建筑的变化总会滞后于经济基础的变革。而人们思维、行为方式的改变，更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那满身的高粱花子，不是一下子就能抖落干净的。

比如说，现在中国的人际关系，还有很多农耕社会的特点。农耕社会是一种乡土性的“熟人社会”。人际交往主要在家庭内部，以及亲戚邻里之间，人好坏的标准就是血缘、地缘的远近。这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农业社会有一定的合理性。农民作为生产个体，势单力薄，没有抗风险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而中国又是气候多变、灾害频繁的国家。欧洲全洲多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各地降雨量平均变率为 12.5%，较少灾害。而中国山脉纵横交错，地形复杂，季降水变率常常在 30%以上，易于形成灾害性天气。凡是在加拿大居住的网友都知道，加拿大面积比中国还大，但很少有什么旱灾水灾，居住十几年赶不上一次抗 X 救灾。在国内几乎年年都有地方闹灾，而且一整就是上千公顷庄稼绝收。所以你要是预言中国某年有大灾大难，肯定是一语成谶。

当出现自然灾害时，农民基本上就是求助无门，能帮忙的就是亲戚邻里。因此，有血缘、地缘关系的宗派亲族就成为唯一可以依赖的人，为了集合力量战胜灾难，农民除了相互相靠，任人唯亲之外，恐怕再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在农村看到过一次械斗，是一户姓张的人家开拖拉机碰到了姓李人家的孩子，老李出来打了老张两巴掌，这下张家人不干了，纠集家族几十个人，李家人也不是小户，也对付了几十号人，铁锹、扁担抡起来就打，血肉横飞，最后是公社派别的村的民兵来才镇住。这下我算见识了什么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中国人抵抗外敌侵略未见什么勇敢，掐手指算来算去就岳飞、杨家将那么几支队伍，可民间的械斗真不含糊，个个英勇威武、处处民风彪悍，根本原因就是目标明确，是为自己圈子里的人而战。

在中国，如果想活得滋润就必须得有自己的圈子。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是“差序格局”，“即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也就是说人们实际上并没有“博爱”，只对自己圈子里的人“施爱”，“施爱”剂量的大小因波纹的远近而定。中国人也不大讲是非观念，遇事只会做对自己和圈子里的人有利还是无利的判断。因为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能帮忙的只有你周围的人。所以农耕文化中特别强调血缘和地缘关系，所谓“远亲不如近邻”、“朝内有人好做官”，“肥水不流外人田”成为人们当然的价值观。为了维护好这种血缘和地缘关系，相互之间的走动，也就是请客送礼拉关系，是必不可少的润滑油。很多人出国不习惯，就是因为西方商业社会没有“人情味”，实际上就是契约社会里大家都按契约办事，再加上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根本不需要这种“人情味”。

毛主席有这样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句话特别能在国人中产生共鸣。从农耕社会的角度看，世界上只有圈子里的爱，无非毛主席把家族、村落圈子扩大到了阶级的范畴。时至今日，在国内混得好坏主要是看你圈子多少、圈子大小。我有个学生出国的动机就是他是本大学的附小、附中、大学、研究生这么一路上下来的，本身又不善交际，毕业出去以后发现别人都有自己的圈子，而他自己始终是一个点。看到别人乐此不疲的参加各种同事聚会、同乡聚会、同学聚会、战友聚会、宗族聚会他就难受，最后三十六计走为上，出国以后过得挺舒服。所以，现在中国的人际关系，还是农耕社会的特点。

其实在中国这种大环境里，你很难免俗。要么改变自己，要么当众人鄙视的卢瑟（loser），或者像我的那位学生一样，逃离苦海获得新生。说实话，在现实生活中，我自己也一个德行。我以前说过现在研究生上学，大都不空手来，都要带点“束脩”，我的研究生几乎都是来自农村，一般都是家乡的土特产，花生大枣核桃栗子之类的东西。这玩意市面上有的是，门口超市随时可买，我也不缺这一口。可这么送惯了，有次一个学生空手来报到，我就感觉特别扭，觉得他入学少了一道程序，浑身不舒服，总想找个机会给他个小鞋穿。最后用理智强压感情，告诉自己正常社会里就应该这样。

别人也是一样，有个导师的研究生要留校，各方面都不错，学校系里也都同意，可导师背后给使绊子，原因就是这个学生"不通人情"、"不懂事"。我私下了解了一下，主要就是这个学生总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人情世故一概不懂，一天到晚就知道埋头看书做实验，尽管给导师发了不少论文，导师还为此拿了特殊津贴，那也是一样，老师照样不喜欢。平时看不出来，碰到事儿上（我们那里的土话，意思是"关键时刻"），老师还是算的很清楚。就拿留人来说，宁可身边留个本事不大的马屁精，也不能留这种人。起码师娘生病住院，有个忙前跑后、给缴费挂号陪床送饭的。这就是所谓"世事不谙非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写了一本《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他用他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证明了在日常生活中，人要处于社会角色剧本的规范与约束下，如果环境不好，就会像上帝最爱的天使路西法一样，不知不觉地对他人做出难以置信之事，从而堕落成魔鬼撒旦。

他的这个"斯坦福监狱实验"非常有意思，号称是了解人性最需要看的经典著作，引发了全球心理学界重新审视以往对于人性的天真看法。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

1971 年夏天，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津巴多带领学生把斯坦福大学乔登大楼的地下室临时改造成一个简陋的监狱，并且招募了 24 名大学生作为受试者。事前进行的心理评鉴和深度面谈保证他们都正常、健康、心理各个向度都在平均值附近，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津巴多随机分组，把这些受试者分成狱卒和囚犯两组，让狱卒看守囚犯。在这个虚拟的环境里，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一套制服一个身份，就轻易让一个人性情大变，原本单纯的大学生已经变成残暴不仁的狱卒和心理崩溃的犯人，直到实验近乎失控。在实验的最后一晚，最凶狠的狱卒"约翰•韦恩"设计出新的游戏：让犯人弯腰至手碰地，别的犯人站在他们后面，这个叫做"母骆驼、公骆驼"的游戏是在模拟性交，也就是性虐待。

这一幕令津巴多不敢相信，"很难想象竟然只在五天内就发生这样的恶性"，而且他自己也进入了监狱典狱长的角色。由于众人兽性大发，原本计划进行两周的实验在五天后就被迫提前结束了。以后津巴多得出结论说，"斯坦福监狱实验传递的信息是：环境对人行为的影响力，比大多数人想象中要强大得多，可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怪罪个人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找出什么样的环境有可能激发出他们的恶行。与其说是坏苹果装进了好木桶，为什么不假设是好苹果装进了坏木桶？"津巴多在进行实验 30 多年后才动笔写出这本书。2004 年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美军监狱爆发的优秀的美国女兵对伊拉克战俘做出虐囚的性游戏使他仿佛看到那个邪恶实验重现人间。他反对把过错推到个人头上，他不相信错误完全是由个人"性格倾向"造成，他也证实了，是军事和民事命令串联成的"大染缸"，"把好好的士兵们变成了'坏苹果'"。

我有个观点，两种文明碰撞的时候，胜负不仅取决于先进落后，还与占有这种文明的种群大小有关。根据我的观察，感觉秦晖说的中国正在改变西方社会绝非妄言。中华文明、中国文化的传播不一定非要通过文字、图画、音乐、舞蹈，去几百万个大活人，比什么都厉害。起码中国的送礼文化就是这么走出国门的。从最近出国的研究生来看，拿到签证后考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如何给导师送礼。现在这礼品越送越重，只要是中国研究生招的多的老板，家里唐三彩、宜兴壶、文房四宝、名人字画的都少不了。现在国外研究室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清华大学"、"清华学院"、"清华实验室"（清华：清一色华人）到处都是，不少实验室除了老板都是中国人，这老板就不受影响？

最近国内很多媒体都报道了中国留学生在欧洲各大学行贿的光辉事迹，更可怕的是现在欧洲教授们也开始主动索取贿赂。俄国老毛子自不必说，就连一贯被认为学风严谨和制度严格的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校园贿赂也非常普遍。“红包拿来、证书拿去”成了留学生圈子里人人皆知的“潜规则”。不少中国留学生证实老师曾以通过考试、取得毕业证书为条件，或暗示或公开索取贿赂。我估计刚开始留学生还不至于直接用红包换证书，而且那些法国德国的教授们也不敢这么干。可一来二去，这礼品收多了，难免“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在给分数时高抬贵手；以后就不要白不要，有便宜不占王八蛋，最后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诸位到这两个网站看看，就知道欧洲被拿下只是时间问题。
（ http://www.chaozhoudaily.com/czrb/html/2009-04/23/content_7997.htm ）
（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0-04/772451.html ）

(9)

看了陈皮和若迷网友的贴子，我感到有必要把题目中的“行”定义一下。因为在网上写文章不比写硕士、博士论文，不是一次性拿出个大块文章来，所以网上文章虽然不乏“火花”、“亮点”、“真知灼见”，但系统性、完整性可能就要差一些，我这个毛病可能比别人更突出。通常是挤出点时间就写几句，随感而发，有时间就写，没时间就歇，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偏偏还不知道藏拙，总爱些大块文章。

这里“行”所以加了引号，就是若迷网友说的，我并不想做过多的价值判断，说明传统文化的优劣，至少这不是我的主要目的。我这个系列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想说明一下中华传统文明有哪些特点，再就是论述一下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是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传统中华文明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这里的“行”，是指中华传统文明的生命力、抗击打碰撞能力，也就是文革中所说的“拒腐蚀永不沾”的能力。至于中华传统文明“行”的原因，我想一是因为占有这种文明的种群大、人数多，对于外来文明，有千斤对四两的优势；再就是细琢磨一下，它还真有点玩意儿。

我记得以前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一篇文章（这回又检索了一下，没查着），作者说中华传统文明有三大支柱：1、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2、儒家学说；3、农耕文明所派生出来的生产方式、思维和行为方式。而且作者预言说，只要这三根支柱稳定，中国的传统社会就能够撑下去，什么时候这三根支柱倒了，中国传统社会就结束了。我同意作者的这个分析，我上面说中华传统文明“行”，并不是信口胡说，“说它行，它就行，不行也行”，而是我认为这三根柱子还没有倒塌，最多是有些摇晃。

这第一根柱子不用说，中国现在还是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和毛时代的不同就是那个时代是标准的极权专制，而现在由于国家领导人主观上不愿意或/和客观上不能够全方位对社会进行思想控制和人身控制，使中国进入后极权时代，又被称为半集权专制时代、新威权时代、无恐怖极权时代。不管怎么说，本质上还是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它与西方民主体制的最大区别是没有政治民主（如民主选举制度），与毛时代极权体制的根本区别是有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和非常有限的政治自由（如非常有限的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按照提倡“新权威主义”社会精英们的说法，就是“用政治上的专制、独裁，来保证经济上的自由”。中国现在既不是主权在君，也不是主权在民，而是主权在政治官僚集团。

中国大陆后极权政治体制，跟新加坡和蒋经国时代的威权主义体制也不一样。威权主义政治理论家林兹（Juan J. Linz）认为，威权俱乐部成员国，应该能通过三个方面的资格审查："有限的政治多元化，非意识形态化和有限的政治动员"，显然我们还不够格。虽然中国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出现了多元化，但是政治上的一元化即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仍然维持不变；指导思想也是一元化，依旧奉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思想，虽然对马列主义的真诚信念也已基本上为实用主义的精打细算所代替，各级干部也都蜕变为利禄之徒，政治主张也不尽相同。应该说，中共早就是一个人各有志、同床易梦的复合体。但广大党员干部甚至绝大部分民众还有共同的信仰，那就是"坚持共产党领导"。

这种半集权专制的变化对于毛时代来说，当然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用国内 WC 里常见的一句话说就是：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但按马克斯.韦伯的说法，这属于合法性不明的政体，不可能是长治久安的政体，顶多是一个过渡的政体。因为这权力既不是神授，也不是民授。而按照大陆新儒家和新威权主义的说法，邓小平用政权的合理性来代替合法性，这个合理性就是"发展是硬道理"。只要经济增长、民生改善，政权就获得了有效性和合法性，不管谁执政都是合法的。问题在于，一旦经济发展停止，政权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就有可能引发政治动乱。

说到这儿还得回答一下王泓网友关于集权和极权的质疑。

集权和极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集权是指权力由地方向中央集中，主要是用于描述地方和中央在权力分配问题上，和集权对应的反义词是分权。在现代社会，如果地方上的许多事务都需要由中央来统一部署和管理、地方行政长官乃是中央派驻的代表，这种行政管理体制就是集权体制。反之，如果地方事务多数由地方自治组织独力完成，地方长官多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中央只拥有部分对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这种体制就是分权体制。就官员来说，集权国家（如古今中国）的官员都是由"上级"任命，能做的不过就是适当考虑一下百姓的舆情、官员的口碑。

集权与分权是秦以后中国传统政治的常规动作，经常是一张一弛。在春秋战国时期，实行的是分封制，以地方分权为主。秦始皇以后，实行的是郡县制为主和分封制为辅的双重体制，也就是说以中央集权为主，地方分权为辅。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集权和分权一直是"一统就死，一放就乱"，集权，官僚集团就疯狂国家就僵化；分权就出现地方豪强坐大、藩镇割据。唐朝中叶，唐朝皇帝向地方节度使分权，结果造成藩镇之乱，割据之祸。我为什么说对实行民主宪政非常悲观，就是像小小衲网友说的，这中间过渡必须有个类似联邦制的东西（或者叫"地方分权"），这么大个中国，搞民主宪政远不像台湾那么简单，喊几句"一二三、保台湾""一二三四五、行宪搞民主"就可以搞定的，而这种类似联邦制的体制，绝不是目前国人可以接受的。

中央集权在中国大陆深得民心。我记得非典的时候全国上下高呼"反复比较，还是集权好"，原因就是国人认为，正是因为集权体制，中央可以收拾省长，省委可以摘市长的官帽，市里又可以控制各大医院的院长、各大中小学的校长，所以非典迅速的得到了控制。而台湾实行了民主宪政，阿扁奈何不了台北市长，因为人家是台北市人民选出来的，台北市长也就是下边搞点亲民秀，不能给院长、校长们布置任务，更无法一撸到底，导致大陆人在恐慌之余还可以笑话台湾的民主宪政，从中获得巨大的满足。甚至有人断言，当代中国不在开明集权中崛起，就在腐败分权中衰落。

而专制是一种专断独裁的统治和决策方式，所对应的反义词是民主。极权则是专制的最高形式、极端形式，就像中学政治课本中"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样，这种专制将国家对权力的垄断、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国家对个人自由的剥夺推到极致。现代极权专制和古代专制

社会的区别就是革命领袖和政党通过二杆子（暴力和谎言）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思想控制和人身控制，说简单点就是准军事化管理，全社会一元化。这是以往一般的专制社会所没有的，皇权专制根本做不到，只有到了近代有了传媒和政党后才出现的。

“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是当年墨索里尼及其党徒用来表明他们要对社会进行完全彻底的整体改造，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机统一。1951 年，美国德裔政治学家韩娜.艾伦特第一次将法西斯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并称极权主义。美国另一位同是德裔的政治学者弗德奇（C.J.Friedrich）在与後来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Z.K.Brezinski）合着的《极权主义专制与独裁》中对极权主义作了如下的界定：（1）无所不在的官方意识形态；（2）以单一的党和集团控制全国；（3）强烈干预经济；（4）垄断大众传播媒介；（5）以军警暴力恐怖手段对付异议分子和控制国民身心。林兹和史蒂番认为，极权主义政权同人类历史上其它形式的专制主义政权最本质的区别恐怕还在于，它有效地消灭了政治反对派并严密控制了个人和民间社会生存发展的空间。极权主义的反题（Antithesis）是多元主义。相比之下，现代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政权在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各方面都保留有多元化的空间。

极权专制和传统的皇权专制不同，它必须拥有一个植根于普通群众的政党，尽管法西斯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曾经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但这两种政权都是用一个群众性政党来实现对国家和人民的控制。无论是纳粹党还是共产党，和西方政党完全两回事，都有大量的基层群众党员，像毛主席在战争期间就强调“支部建在连队上”，夺取政权后又实行实行国家军事化，把支部建在农村的生产大队、工厂的车间、学校的部系等，为这种全方位控制社会提供了组织保证。然后利用现代传媒，遵循戈培尔“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的原则，对全体国民进行洗脑。

“极权”就是“一切权力归领袖”。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社会权力和文化权力，都通过层层党组织最后都集中在领袖手里。我认为极权的出现必须有三个条件，首先要有一个卡里斯玛型（charisma，意为具有超凡魅力）领袖，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无一不是卡里斯玛型领袖，都具有钢铁般的意志、高超的政治手段和超凡的个人魅力。这些卡里斯玛气质有些是天生的，有些是后天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环境中锻炼出来的。二就是要有相应的文化传统和群众基础，在此基础上如果再有“外因”，也就是社会动荡、战争等，民众就会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悲情和诉求，极权政权就会应运而生。

说到文化传统和群众基础，已经出现过的极权政权有两种，即法西斯政权和共产党政权，两者立国依据不一样，前者是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后者是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学说，实际上都有各自的文化传统和群众基础。看看德国的历史就知道普鲁士军事传统和民众种族意识对以后纳粹极权政权建立的重要性。就是现在德国人的种族优越意识也比欧洲其他国家强烈。不信看看这次参加世界杯的各国足球队，那些欧洲大国里只有德国还是“清一色”。

中俄两国能够顺利建立极权政权也不是偶然的，两国都有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信奉集体主义、无视个体的权利自由；都有大量麻木、愚昧无知的农民。按社会学奠基人韦伯的说法，中国人的锱铢必较、无法进行长远理性计算的习性，是资本主义没能在中国得到发展的重要原因。比如说，妥协就是一种“长远理性计算”的结果，国人实际上至今也不能理解，大家欣赏的还是“痛打落水狗”、“完全干净彻底消灭之”、“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这些话听着就顺耳、来劲、提气。

而且中俄两国极权特点也反映了两国文化传统、民族性的不同。俄罗斯虽然也是农耕社会，在信

奉集体主义、无视个体的权利自由这些方面和中国农耕社会是一样的，但看看地图就知道人家还有大量的游牧民族，而且横跨欧亚大陆，受海洋文明、游牧文明的影响，所以人家搞出来的极权是嗜血的、扩张的。像卡廷惨案、吞并波罗的海三国、控制东欧诸国那些事儿，毛泽东干不出来，这还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根本没那个基因，所以没那个思维，没那个意识。另外，毕竟俄罗斯还受到欧洲文明的影响，搞极权的层次还是比中国高得多，我记得斯大林经常读的书籍里还有亚当•斯密的著作，难怪人家通过极权的方式迅速建立起一个重工业体系来，光是苏式系列的武器就不得了。所以斯大林除了残暴嗜血没有人性以外，还真没什么其他毛病，至少没闹什么弱智笑话。

(10)

咱毛主席搞极权，“集中力量办大事”又干了点什么？独创的还就是大炼牛屎铁，四处赠送国土，能勾起人回忆的可能还就是三年不吃红烧肉之类的感人故事。毛主席一生嗜书如命，比斯大林学习劲头大得多、刻苦得多。不过除了诗词歌赋以外，大多是像《资治通鉴》之类的谋略大全。所以，毛主席的学问也就是控制人的学问，若让伟大领袖看什么亚当•斯密，还不得把老人家烦死。虽然毛主席也一直想接受西方的东西，可实际上他老人家根本学不进去。比如说，毛主席一生都在努力学英文，有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历来被称作是毛主席“飞机上的工作照”，实际上是毛主席在飞机上学英语的照片，但几十年来我看老人家的英文实在没什么长进。

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写的《毛泽东传》中提到，1910 年毛泽东离开韶山老家，进入湘乡县城新式学堂———东山小学堂读书，就开始跟着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老师学英语，比老芦学英语起步的时间早多了。以后在延安窑洞没断过，建国一直学，直到 1976 年临终时还在学。他老人家学习方法也与众不同，采取“对读法”。具体说就是搬本字典，再找本中文和英文译本毛主席著作，据说最多的是《矛盾论》、《实践论》，然后从单词到语法，一点一点“对读”。光是《矛盾论》就精读了三遍。

这种“对读法”效果估计不咋地，因为大陆上世纪 70 年代出版的英汉小词典和英文教科书，扉页上都印着这样一条毛泽东语录：“为什么语言要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此话逻辑不通，难道外语就是因为“不好学”所以就一定要学吗？而且按照毛主席学习中国古籍时所表现的语言文字方面的天赋，外语应该不是什么太难的东西吧。关键可能还是洋玩意儿老人家学起来不对路。

不管猫粉们怎么吹，毛主席的英文水平确实高不到哪去。1968 毛泽东主席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蒯大富），根据韩爱晶的记录，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孙子兵法》，然后出人意料地自问自答：“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米尔就是兵法，阿达米尔孙子就是《孙子兵法》嘛。还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亏，学外文要赶快，年轻时学好。”实际上，《孙子兵法》的英译文是 Art of War（战争的艺术），译音应该是“阿特奥夫沃尔”，而不是“阿特米尔”。毛主席有时候会见外宾也会秀几句（估计江泽民也受此影响），比较出名的几次就是会见基辛格和尼克松子女的时候，蹦出几句“papertiger”、“Class struggle”。

根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差役们回忆，1975 年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两个二杆子寒暄时，“毛泽东突然说了一句‘Welcome’可能因为 L、N 不分，毛泽东自我解嘲地说：‘讲外国语，我发音不好。’双方谈完，金日成起身告辞，毛泽东却要金日成‘等一下’，然后出人意外地问：‘你

们吃饭还用筷子吗？Two sticks（两根棍子）？’”我觉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差役们说的非常真实，因为只要听过日本人讲英语的都知道，日本人很多发音含混不清，毛主席的英文肯定是让东山小学堂的那个二把刀的日本留学生给耽误了。再加上南方人“辣”“那”不分，“你”“李”不分，结果把金太阳说的一头雾水。

不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极权政治的贡献无人能及，无论是斯大林还是今天的卡斯特罗和金正日，都从未达到过这种境界。在毛的极权时代，全国实际上在实行军事化管理，城市机关厂矿学校自不必说，很早就实行了“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在农村应该是在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以后，实现了对农村农民的完全控制。毛主席通过国有化和集体化控制了全民的生计，通过单位制度、户口制度、个人档案制度等机制将私人空间个人自由剥夺殆尽。

人民公社这种体制简单说就是对农民什么都管，从生产、购销、财政、医疗、教育、治安、基础设施建设、社队企业管理等等。结果当然是不可能管好，几乎是样样失败，依我看就是治安还算成功，其他的都是一塌糊涂。但从对农民控制来说，人民公社制度是空前绝后地成功，否则也不会全国一盘棋，说搞大跃进上下一起胡闹。毛主席 58 年的时候曾经想通过人民公社在农村实现“四化”，即思想革命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而且还一度获得成功。传统社会的“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这种事想都别想，明朝那些皇帝开豹房做木匠活，怎么胡闹的都有，但对普通农民没任何影响。

说起治安，毛时代确实比现在好，而且不光是农村，城市也不错；也不光是中国，斯大林苏联和纳粹德国当时的社会治安也都不错。这也是很多人怀念毛时代的重要原因。极权政权可以掌控一切，包括小偷流氓，而且可以成批的杀、秘密的杀、有计划按比例的杀、由广大人民群众热心参与的杀，和现在媒体到处渲染的刑事杀人案件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不管再怎么解密当年的档案，毛时代死亡几千万也只是个数字而已，丝毫无损于毛主席的光辉。

就对人的控制来说，伟大领袖确实是像林副说的那样，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是难以复制的天才。斯大林和咱们的领袖不是一个路数，斯大林对发动群众不太感兴趣，更多的是大众恐怖（Mass Terror）推动社会发展，靠“十月革命以来的辉煌成就”来获得人民群众的崇拜。按照毛主席的观点，群众并没有真正发动起来，阶级斗争的理论也没有深入人心，社会各阶层之间没有太多的仇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记得看过几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电影，里面充满人情味和小资情调，应该说苏联那个时候已经变修了。古巴也是一样，看看新闻里面的镜头，光是穿衣打扮就知道，社会的宽松程度绝不是经过文革的中国人可以想象的。朝鲜按说够邪乎的，可社会各阶层之间没有矛盾，权力斗争完全就是宫廷斗争，所以这些国家将来搞起民主宪政来都比中国要容易。

毛主席执政后，一直致力于剥夺中国人的个人权利与自由，毛泽东时代与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相始终，如土改、镇反、肃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直到文革，毛主席可以自豪地说“余致力剥夺权利与自由凡 27 年”，令人诧异的是，包括受迫害者在内的官员、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都主动或被动地投身于这些运动、上演数不尽的作贱自己和相互残杀的人间悲剧闹剧惨剧。而且就拿我看到的，毛主席剥夺知识分子言论自由、农民的迁徙自由，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像样的抵抗，相反，“剥夺一点，舒服一点；剥夺得多，舒服得多；彻底剥夺，彻底舒服。”人身自由和个人权利被剥夺之日，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对毛主席感激涕零之时。

所以，我感觉在这种环境里呆的时间长了人会变得很残酷，会潜移默化地产生一种“对奴才的怜悯就是对人类文明的犯罪”的想法，觉得中国人就该没事儿给收拾收拾、折腾折腾。

相比较而言，威权主义社会比起极权社会来，感召力和诱惑力要差得多。威权主义政权的特色是严重倚仗军警和传统精英，这使它容易受到广大下层民众和知识分子的疏远和憎恶。而极权主义的魅力在于它可以巧妙地运动群众投身于波澜壮阔的社会政治运动来获得人民大众的认同。中国和俄罗斯，确实有极权的土壤，广大人民群众中间，蕴藏着极大的“被剥夺”的潜质。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毛时代除了贫穷以外，一切都没有什么不适。卡里斯玛型领袖，不出则已，如果出的话，俄罗斯就该出斯大林，中国就该出毛泽东。若出个别的什么人，大家肯定看着别扭。

毛驾崩以后的中国，外国人称为后极权时代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最主要的是一个地道的极权国家要有一个有无上权威、能够操纵二杆子“二杆子王”。这种极权的独裁者可以不受任何约束，为所欲为。现在的胡温的权力和极权政府的金二根本没法比，既要看官僚集团的眼色行事，还要适当考虑民意舆情。像金二“用核武器对付内部反对势力”的豪言壮语，借给胡温十个胆也不敢说，甚至连想都不敢想。

极权是把专制推向极致。传统皇权专制制度看起来对国民的统治很完善，从六部衙门到乡保里正，朝廷的触角几乎可以伸到每一个家庭中去，但实际上具体事儿管得却不多，整个体系主要就是征粮纳税，防止民众造反。整个系统缺乏对思想的控制，缺乏人民群众的参与。传统皇权专制的一大特征就是，国家在地方行政系统中尽可能少用“朝廷命官”，因为传统小农经济根本无力支撑起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传统社会有“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的说法，也就是说朝廷命官到县一级为止，而且县太爷的工作也很简单，就是征粮纳税、拉夫抽丁、升堂断案。对老百姓的进行“教化”只是个软指标，靠县太爷一个人也根本完不成。维持古代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的组织保证是官僚制度和宗法制度。后者是控制农民的。古时社会比现在简单得多，没太多职业，平民阶层主要就是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数量不大，而且相当一部分织席贩履、引车卖浆之辈也并没有离开土地，属于“忙时务农、闲时经商”。

就连平时的征粮纳税、拉夫抽丁那些行政杂事县太爷也管不了，农村由胥吏、乡宦、生员把持，所以县衙门只能大量雇用胥吏、衙役和乡官去干。“胥吏行文书，治刑狱、钱谷”（苏轼）这些人上边不给工资，只好自己找米下锅，从搜刮的民脂民膏中拿出一部分来支付这些人的开支。明摆着当胥吏差役总比种地强，所以七大侄八大甥越来越多，胥吏差役队伍越来越庞大。而且工作性质决定了这些人必须具备地痞恶霸的素质，否则什么也收不上来。“吏胥视民为鱼肉，民畏吏胥如虎狼”。而且那时和现在不一样，政府只有农业税可收，没有其它财政来源，政府根本离不开这些地痞恶棍，否则将一事无成。现在国家取消农业税最大的意义我看不是直接减轻农民负担，而是少养一些与收税相关的胥吏、差役。因为只要收农业税，就会有这些鱼肉农民的胥吏、差役存在；城市也是一样，只要这么大规模改建拆迁，一定会有半黑社会性质的拆迁办，这是必须付出的制度成本。

因此中国传统社会就出现这样一个“必然规律”，就是历代王朝末期的非正式官员人数总是比初期大得多，通常会膨胀数倍甚至数十倍。年景好还没事，碰到自然灾害、异族入侵、叛乱兵变农民就会不堪重负，小农经济根本承受不了这么多人的压榨，就会周期性爆发农民起义，狠狠地杀掉一批，然后轻松过上几十年，循环一个周期后再接着来。有人做了个统计，说中国皇宫寺庙保存的都不错，但没一处县衙门是保留完好的，全都是破烂不堪，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县衙门的工作是征粮纳税、拉夫抽丁，是压迫剥削的象征，农民一旦造反先砸县衙门。而“中国历史上的

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毛主席语录），所以各地的县衙门都难以作为完好的文物而保留。

中国古代的皇帝在理论和观念上，无疑是享有至高无上的、正统的权威，但坐上君主位置的人能否有效的行使这种权威是另外一回事。皇权是处于帝国政体的核心地位，但是，用儒家思想训练出来的官僚队伍，很多时候对皇权也起制约作用，皇帝的最后决定权包含在政务运行的程式中。比如在宋代，原则上皇帝的指令须经“二府”以“敕牒”的方式颁行，从宫内直接发出的批示被认为是“灭裂纪纲”的源头，经常受到臣僚的批评和抵制。无论东方西方，政治结构都是上中下三层：在古代西方，国王与平民之间，夹着一层以血缘为纽带的贵族阶层。而在古代中国，皇帝与平民之间，夹着一层以文化为纽带的官僚阶层。这个官僚阶层起始于秦汉，成熟于唐宋，至今还大模大样的活着，对政治局的决策起着制约作用。

宋神宗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皇帝，他励精图治，锐意改革，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牛气冲天的皇帝，却经常被臣子们噎得半死，弄得心情郁闷，牢骚连连。元丰年间，陕西方面对西夏用兵失利，神宗非常恼火，打算抓个典型杀一儆百，内定的这个替罪羊是一名漕运官员。就这么小萝卜头，也被宰相蔡确以“祖宗以来，未尝杀过士人”顶着不办，最后神宗恼羞成怒发牢骚，“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底下大臣还不依不饶，还要接着回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也好！”。再从决策机制看，很多皇帝虽然是决策和行政的最高负责人，但其决策很多都是建立在集体讨论、决议的基础之上。只有斯大林和毛泽东，才可以完全无视这支官僚队伍的存在，想杀就杀，想抓就抓，想批就批。

所以啊，中国的极权专制只是传统的皇权专制与列宁主义结合的产物，李锐所说的“秦始皇加马克思”有道理，但“秦始皇加列宁”可能更准确些。伟大领袖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中国的专制传统，把专制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可以说是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峰，按林彪的话来说，就是任何人无法超越的“顶峰”。

(11)

再说说中国传统文明的第二大支柱：以儒教为核心的社会价值体系。

首先回答一下布朗运动网友的提问，儒教算不算中国的宗教？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论，说“是”的可以有一千条理由，说“不是”的可以有一万个根据。我知道的有三种说法：1、儒教非教；2、儒教是教；3、儒教虽然不是教，但具有宗教性，经过“挖掘整理提高”很容易成为宗教。近代中国由于没有宗教信仰，吃亏吃大发了，而当今中国的种种乱象，就是因为没有宗教的约束。所以儒教不但能够、也应该而且必须成为中国的宗教，而且应该是“国教”。

长期以来，“儒教不是教”、“儒教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的观点在国内一直占统治地位。很多洋鬼子也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英国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罗素也持有这样的观点。在《中国问题》一书中，罗素曾说：“与西方文明比较，中国文明有类似希腊文明的某些要素，但没有引起狂热信仰的宗教，缺乏现代科学，整个民族没有宗教，只有朴素、有限的伦理规范。”不过洋鬼子里也有持相反观点的，像黑格尔就说过，儒教是“一种国家的宗教，这就是皇帝的宗教，士大夫的宗教”。

儒以教称，见于《史记•游侠列传》“鲁人皆以儒教”。古文词义模糊，这里的“儒教”到底是“以

儒为教”还是“以儒为宗教”？以后又有了通常意义上的“佛教”、“道教”之类宗教，所以这里的“教”，是“教化之教”，还是“宗教之教”？可咱们就一直这么含糊着，泛泛地说“儒道释三教”。以后日本学者把“Religion”翻译成“宗教”并传入中国，而且日本学者瞎掺和，多称儒学为“儒教”，以“儒教”为惯用语，相对应的英文单词是 Confucianism，所以就产生了中国的“三教”和洋鬼子的西人传教之“教”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儒教是不是宗教”的争论。老一辈无产阶级托派领袖、当时的共党创始人陈独秀在这场争论中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儒教之‘教’为教化之教，而非宗教之教”。

其实澄清“儒教是不是宗教”的概念，最初还是人家洋鬼子开始干的。早在明末清初利玛窦就否定了“儒教是教”的理论。1582 年利玛窦来华。初抵中国，利玛窦一身和尚打扮，中国人以之为“西僧”，而基督教是“一神教”，又拜上帝、又叩菩萨显然不符合基督的教义。以后老利易僧为儒，改穿儒服，戴儒巾，并读四书五经，俨然一个虔诚的孔子信徒。这样做为的是和中国人套近乎，因为他看到了儒家思想在所占据的独尊地位，认识到这样才能更方便更广泛地在中国传播天主教思想。但问题又来了，宗教具有排他性，天主教更是教规森严，决不允许其教义中有任何的异教思想，否则即是叛教，将受严惩。所以为维护天主教的纯洁性，利玛窦只有在确认“儒教不是宗教”的前提下，才能以儒生的身份做他的传教工作。

利玛窦认定“儒教不是宗教”的理由是儒教没有教堂、没有神职人员、没有祭祀仪式、没有戒律，具体他是这么说的：

“虽然这些被称为儒家的人的确承认有一位最高的神祇，他们却并不建造崇奉他的圣殿。没有专门用来崇拜这位神的地方，因此也没有僧侣或祭司来主持祭祀。我们没有发现大家都必须遵守的任何特殊礼仪，或必须遵循的戒律，或任何最高的权威来解释或颁布教规以及惩罚破坏有关至高存在者的教规的人。也没有任何念或唱的公众或私人的祷词或颂歌用来崇拜者为最高的神。”而对于儒家祭祖祭孔的礼仪，利玛窦辨明这些是社会礼仪，而非宗教仪式。祭祖只是对尊敬的死者表示敬意的一种礼节，是为了教育后人行孝道，而祭孔是对孔子表示敬意。

最后利玛窦得出结论，儒教没有教规，没有宗教仪式，和场所，不具备一般宗教的基本属性。而且和大儒们接触后的感受是“儒家不承认自己属于一个教派，他们宣称他们这个阶层或社会集团倒更是一个学术团体，为了恰当地治理国家和国家的普遍利益而组织起来的。”“关于来生的事，他们不命令也不禁止人相信什么，许多人除了儒教外，同时也相信另外那两种宗教，所以我们可以说，儒教不是一个正式的宗教，只是一种学派，是为了齐家治国而设立的。”

另外一个原因是欧洲的宗教（Religion）一般是指一种对于神或者不可知力量的信仰，是先于经验、超自然的，宗教要探讨神灵、生与死、前世来世、天堂地狱、“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等。而孔教却对此采取回避的理性态度，有“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为证。但同时，利玛窦认为儒教是一种非正式的宗教，虽然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儒教中具有若干“宗教性”。很多洋鬼子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像“三纲五常”这类的思想，本身是带有很强烈的宗教信仰色彩。另一位洋鬼子莱布尼兹也认为儒家虽不是宗教，　却具有神学特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儒教就是宗教，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就是清末的康有为、和最近去世的“国学泰斗”任继愈先生。

在清末的中国遇到了“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整天除了挨揍受气、割地赔款没

别的事儿，有识之士们开始找原因了。他们的基本思路是哪些东西是洋鬼子有而咱们没有的，咱就赶快补上。答案有各式各样，包括我在“进化论”系列里说到的人种问题。而康有为在“闻西人之言支那无宗教，辄怫然怒形于色，以为是诬我也，是侮我也”的背景下，认为洋鬼子比咱强，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宗教。

所以康有为写了本《孔子改制考》，系统地论述了儒教的产生、发展及制度等问题，并著《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孔教会序》、《以孔教为国教配天仪》等文，掀起了一场将儒教宗教化、国教化的运动。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著《论孔教是一宗教》、《论中国当倡明孔教》等文，支持师说，并联合严复、夏曾佑等人向参众两院递交《请定孔教为国教》的请愿书。狄郁也著文《孔教评议》，倡儒教为宗教，据称该文是当时诸多以儒教为宗教的文章中最详尽、最有代表性的一篇。由此，逐渐在康有为身边形成一个以儒教为宗教、欲定儒教为国教的保教派。

至于儒教里面缺少神灵崇拜、戒律、生死、今生彼岸、天堂地狱这些内容，有的学者拿孔子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等话来说明孔子对鬼神并“未完全否定”，以证明他和彼岸世界的“神”并没有完全断绝关系。后来又有人提到了儒家传统中带有信仰色彩的内容，如天道观（相当于宗教中的神义论，解决正义之源泉的问题）、天命论（解释生命之终极性的问题）等，也有像“四维”、“八德”、“三纲五常”，这样一些用于维系特定社会环境下日常生活的基本操作和运行规程的“道德律令”，类似佛教的“五戒”、“十善”、“三皈依”之类的信仰和戒律。还举出孔子的“祭神，如神在”（《八修》）等， 进而推断孔子是为了维护“天命”、“鬼神”的地位， 是“唯心论”者。孔子提出“天”的概念和耶稣说的“上帝”，佛陀说的“佛”有许多的相似之处。

康有为回答的更很巧妙，他把宗教分为两大类，阳教和阴教，即入世之教与出世之教。孔教顺人情天理之自然，乃阳教，而基督教和佛教则是阴教。无论入世之阳教，还是出世之阴教，在本质上都是宗教，由此而将儒教纳入宗教的范围。（阳教：“其立国家、治人民，皆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伦，士、农、工、商之业，鬼、神、巫、祝之俗，诗、书、礼、乐之教，蔬、果、鱼、肉之食，皆孔氏之教也”；阴教：“其戒肉不食，戒妻不娶，朝夕膜拜其教主，绝四民之业，拒四术之学，去鬼神之治，出乎人情者，皆佛氏之教也。耶稣、马哈麻（金注：穆罕默德的古代音译，此处指伊斯兰教），一切杂教皆从此出也”《康子内外篇》）。

这场保教的结局当然是以失败而收场，康有为保教派的观点湮入故纸，孔教会也如过眼云烟，尘封于历史之河。最后的连他的弟子梁启超都与其师唱出反调。认为以儒教为宗教是不知宗教为何物。梁启超认为宗教“专指迷信信仰而言”，“非使人进步之具也”；而儒教之“教”，“专在世界国家之事，伦理道德之道”，“特异于群教”。

(12)

以后到了 70 年代末，中国再次打开国门，人们又一次看到了咱们跟西方社会和正常社会的差距，要什么什么不行。而且这次更惨，不光不如洋鬼子，连二鬼子港客也不如。于是“痛定思痛”，任继愈先生再次提出了“理学宗教化”、“儒教是教说。”的观点。

这个任继愈我的印象是学问不小，人品也不错，但名气不如季羡林、张中行大。跟冯友兰一样，他也跟政治掺和了一腿子，动辄用马列主义研究哲学和佛学。他的文章曾经被毛主席钦定为研究佛学的“凤毛麟角”：“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

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这 TMD 纯粹是 P 话，您老人家在那戳着谁敢研究，没看见只要您老人家一蹬腿，文章跟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不过文革后人家并没有因为这个说老毛半句好话，不管是谁采访，只要是提有关与毛泽东之间的交往的问题，任继愈回答都十分干脆：“我不想谈这个问题。”

他还忘恩负义，对毛泽东这样评价：“把毛泽东当成神，一个是他自身有把自己当成神那种欲望，可是广大群众也有这个心理……20 多年后，即使毛泽东复活，他再想当神，也当不成了。”而且他为“文革”发生的原因找到了宗教的脉络，这就是存在了几千年的孔教。我第一次看到关于对国际歌的“救世主”和东方红“大救星”的质疑就是任继愈提出来的。他以两首歌曲暗示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某种缺失。《国际歌》中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东方红》却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他为人民谋幸福。任继愈指出：“我们直接从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差了一个阶段。”

任继愈和前人讨论“儒教是不是教”不同，康有为提出“儒教是教”为的是保国保教保皇；而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之间的“儒学是不是教”之争旨在匡救中华文明，使之足以以西方文明抗衡。而任继愈则是“清理封建文化，让儒教早日消亡”。任继愈认为，儒教不但是宗教，而且还是政教合一的宗教，“在政教合一的框架下对政治发生作用的，是一种服务于封建宗法制度的宗教。”“中国宗教势力太大，又和政治结合在一起。从朱熹以后，教皇和皇帝就是一个人，政权可以转移，但宗教没法消灭，可随着皇权的颠覆，儒教也就垮掉了。但它的影响还在，我们的困难也就在这里。”

在他看来，“文革”的祸根有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几千年来植根于中国的儒家学说。任继愈进而提出了自己的“儒教是教”的理论——儒在中国，不只是学说，更是宗教。从事哲学与宗教研究的任继愈曾多次提及自己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其“儒教是教”说乃是着眼于“儒教”的危害性，他曾把“民主在中国推广不开来、家长制”等问题与儒教的这种危害性联系在一起。

任继愈先生和“布朗运动”网友的观点一样，认为“十年动乱期间的造神运动之所以得逞，千百万群众如痴如醉的心态，它的宗教根源不是佛教、不是道教，而是中国儒教的幽灵在游荡。”他认为儒教和中世纪欧洲宗教的不同之处在于，欧洲中世纪神权高于王权，宗教和教会具有垄断一切的势力，基督教神学成了支配一切的意识形态。但在中国，统治阶级始终把神权限制在王权之下。他还认为洋教斗不过儒教是因为“历史上天主教来中国好几回都没站住脚，它被儒教排斥了，因为它唯一主张‘敬天’，而儒教主张‘敬天法祖’。”

任继愈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儒教本身即是宗教，它给中国历史带来了具有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特点宗教神权统治的灾难”“儒教虽然缺少一般宗教的外在特征，却具有宗教的一切本质属性”。宗教之所以是宗教，有它的本质部分和外壳部分，本质是信仰与追求，外壳是信奉对象、诵读经典的组织形式。儒家作为中国的传统宗教，其本质部分就是提倡禁欲、重“忠孝”，尊“三纲”，这既是宗教思想，也是政治思想，它比较适应大一统国家的生存要求。而其外壳部分则是，它信奉“天地君亲师”，这符合宗教外壳的组织形式。而对于一个宗教的认定，重要的是信仰的本质，而不在于形式。

任继愈先后发表了《儒家和儒教》、《论儒教的形成》、《朱熹与宗教》等一系列论文，具体阐明了儒教的性质、教义、神灵、组织结构以及发展阶段。并以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儒教宗

教化过程的开端，以宋明理学的形成为儒教宗教化过程的完成，详细论述了儒教的形成、变化、宗教特征以及儒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以后他的弟子们又进一步把他的观点系统化、完整化。我总结如下，不对的地方请砖家拍砖。

儒教的形成：
1、儒学（儒学）在先秦还不是宗教，只是"直接继承了殷周奴隶制时期的天命神学和祖宗崇拜的宗教思想"，"本身具备再进一步发展成为宗教的可能"，但其时它还不是宗教，儒家的领袖孔子还只是一个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以后随着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和巩固，儒学才逐渐儒教化。
2、在其后的发展中，儒家（儒学）经历了由汉武帝支持、董仲舒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改造，儒家（儒学）开始宗教化；
3、宋代宋明理学的形成，至南宋朱熹为止，儒家（儒学）的宗教化正式完成，儒教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宗教。

更具体说就是：1、前儒教时期———秦汉以前；2、准儒教时期———两汉；3、三教并立时期———魏晋、隋唐；4、儒教形成时期———北宋(张、程；5、儒教完成时期———南宋（朱熹）；6、儒教凝固时期———明清。

任继愈和他的弟子们还认为，儒教在鬼神观、上帝观、彼岸世界、组织和祭仪等方面无不具备宗教的本质特征，指出儒教是"殷周以来绵延三千年的中国原生宗教，即以天帝信仰为核心，包括'上帝'观念、'天命'体验、祭祀活动和相应制度，以儒生为社会中坚，以儒学中相关内容为理论表现的一种宗教体系"。至于组织和祭仪，我概括了一下，持"儒教是教"观点的学者是这么认为的：

教主：孔子；
经典：四书、五经、十三经；
教派及传法世系：儒家的道统论，有所谓十六字真传；
教义和崇奉对象：天地君亲师；其中君亲是中国封建宗法制的核心，天是君权神授的神学依据，地是作为天的陪衬，师是代天地君亲立言的神职人员，拥有最高的解释权；
戒律：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宗教组织：是中央的国学及地方的州学、府学、县学；
专职神职人员：各级学官，如府学的教授，州学的学正，县学的教谕等；
修行方法：主敬、禁欲、注重内心反省；
信徒：散布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
教堂：遍布各地的孔庙（也称文庙孔庙、大成殿、夫子庙、孔子庙、宣圣庙，是中国古代祭祀孔子的场所)；
教皇：中国历代皇帝。

关于皇帝是教皇，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中国儒教，皇帝跟教皇是一个人；西方的宗教，皇帝需要教皇给他加冕，要教皇认可他，他的地位才算得到上帝认可，才算合法。历代皇帝诏书一开始就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就是教皇的口气。中国儒教的特点是，教皇是皇帝，皇帝是教皇。造神是造皇帝，也造教皇，所以'文革'时买领袖像都说是'请'一个像，这就是教徒的话。""外国的政教合一，是教皇给国王加冕，拿破仑还被加冕呢。中国的皇帝就是教皇。你看天坛不就是宗庙嘛，那是祭天的地方，别人没有资格。"

而且，任继愈认为，儒教和其他宗教一样，都限制理性思辨，不允许人运用理性能力怀疑宗教的信仰。对西方的基督教徒，你不能问他上帝为什么存在。在儒教里，你也不能问为什么要孝敬父母，为什么要忠君，天、君、圣人为什么尊贵，因为这些都不允许怀疑。儒家所谓"经"，就是"圣贤垂训的典籍，封建社会的一切成员，只能宣传它，解释它，信奉它，不能怀疑它，议论它，更不能批判它。"而且儒教信仰通过教化，依靠思想灌输、道德教育、礼教约束等，形成了习惯性的文化传统和稳定的社会心理，对全体社会成员造成很大影响。

所以，任继愈和他的弟子们认为儒教是我国古代政教一体、始终居主导地位的宗教。当然，他的态度和五四和新文化运动那帮人还不一样，不是"打倒"、"砸烂"，而是执行我党"给出路政策"。他认为"儒教要批判，但历史上的儒教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根基，不能简单否定了事。"

(13)

前边说了半天国学大腕们对于对"儒教是不是宗教"的看法，各位大侠也发表了高见，下面也谈谈我的观点。我认为儒教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但具有某些宗教的特点，也就是具有"宗教性"。

先掉一下书袋："宗教的主要特点为，相信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而又控制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这种神秘的力量能统摄万物、主宰世界、决定人世命运，从而使人对神秘力量或实体产生敬畏及崇拜，并从而引申出信仰认知及仪式活动。"我认为，宗教应该有这种"神秘力量"，这也是在科学高度发达、信息通畅的现代社会，建立起一种新兴宗教（包括 FLG）的难度所在。

由此看出，儒教缺乏宗教的这个特征。孔圣人并没有超自然的力量，他也不是先知，而只是先圣先师，所以儒教里面只有"人"而没有具有超自然力量的、至高无上的"神"。西方文化中的宗教（religion），是指"神宗教"，即是崇拜超自然的神的宗教，包括常说的世界三大宗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虽然不用"神"这个词，但真主和佛祖是先知，是万能的。

那些认为"儒教是教"的学者，实际上是借用了中国广义的宗教概念。这种观点认为，宗教除了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犹太教等"神宗教"以外，还有"人宗教"，而儒教就是中国广义宗教概念上的"人宗教"。

由于儒教里面没有"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所以它不能像其他宗教一样解释世界、自然、前生来世。比如，人生问题中最终极的"死亡"问题，就是非宗教解决不了的问题。费尔巴哈说过，最容易被人感觉到并且最使人痛苦的一种有限感，就是人类意识到他总有一天是要死去的，如果人是不死的，如果人永远活着，世上根本没有死这回事，那么就不会有宗教。在费尔巴哈看来，死会产生恐惧，会产生对神的信仰，所以宗教思想实际上就是关于死的思想。

这三大宗教都认为，死只是肉体躯壳的消失，但这并不意味这是生命的结束，而是生命的转移，是一种新的开始。人在世上的生命并不是真实的生命，是一个不断地被世俗的欲望诱惑，又不断试图挣脱的磨难过程。基督徒的生命从"信而得救"开始，在"信而得救"以后，生命可以享受一种脱离了罪的喜乐平安。而佛国净土便是肉体死后进入的极乐"天堂"，可永生不死地享受一切幸福快乐。伊斯兰教认为今世短暂、后世永存，死只是连接今世与后世的桥梁。

不少宗教认为，人死后生命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比如灵魂，并没有随着肉体而灰飞烟灭。基督教认为生命还要接受上帝的审判，凡遵循戒律、灵魂干净的可以升天堂，而有罪恶、灵魂污浊的就得下地狱。天主教和东正教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还设了“炼狱”，不能马上上天堂的，也不必下地狱的，放在炼狱接受暂时的磨难。

由于儒教缺少万能的“神”，所以根本无法像其他宗教那样来论述解释这些问题，而且对这些终极问题毫不关心，儒学没有客观唯心主义的色彩，是一种入世哲学。中国民众也不关心死后去向，只是在乎现世的得失。像《祝福》中祥林嫂捐门槛让千人踩，万人踢，不管鲁迅小说原意是什么，我认为在现实里如果有人这么干，是希望藉此来赎清自己的罪过，后半生还能够嫁个好人家。

在中国，用“死后下地狱”来吓唬人起不到什么作用，远不如老百姓常说的“天打五雷轰”、“出门被车撞”、“生个孩子没屁眼”力度大，中国人只认现世报。人们到寺庙烧香拜佛、磕头捐钱，也不是为了死后如何，都是祈祷现世职场官运亨通、商场财源滚滚、考场金榜题名，要不就是生活中“娶个漂亮媳妇”、“抱个大胖小子”，跟西方基督教徒到教堂赎罪祷告完全是两回事。

另外，就是儒教没有“超脱性”，这一点也不像欧洲的宗教。基督教与王权之关系，可以是彼此相互独立的关系，一种分庭抗礼的关系，宗教律法和世俗律法之间有着一条明确的界限。在人类早期社会中，宗教还用来作为反抗推翻统治阶层的工具。由于宗教和世俗社会之间可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所以，牛顿研究神学、信仰上帝，丝毫不影响他建立经典物理学理论体系。

在基督教丧失其政治权力之前，西方社会的权力模式都是二元制的，即源于基督教的权力与源于世俗的权力王权。文艺复兴后，基督教经过几百年“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这种政教相分的社会政治变革，逐渐完全与政治权力相分离，纯粹成为一种没有世俗权利的宗教，一种仅涉及人类信仰、道德的宗教，一种西方人心灵归宿。通过教堂以传教的方式，对社会大众进行道德教化，对社会一些道德行为进行约束和批判。我觉得以后不管社会如何变革，基督教都可以作为精神和道德的力量存在下去，只不过功能可能会逐渐弱化，“老兵永不死，只会渐凋零”。

但是儒教不同，儒教与王权的关系，多是一种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帝制推翻之前，儒教始终没有与王权相分离，在政治意识形态中发挥着作用。儒教的仁义礼智信要通过与政治权力的结合来实现。北京的国子监与英国剑桥大学成立时间大致相当，而剑桥大学刚建校时是一所神学院，但在以后的办学过程中，人家允许神学院的师生对一些科学现象进行研究，像伟大领袖说的那样，既不但要学圣经，也要学哲学、数学、法律、医学，也要学习文学音乐。

如果把儒教当成宗教的话，北京国子监大致相当于欧洲的神学院，学习的内容是儒教经典四书五经，与欧洲神学院的区别是，只学四书五经这一门“社会稳定学”（或称“人际关系学”），一门“学以致用”的世俗学问。所以一旦出现社会变革，儒教存在的社会条件（如自然经济、宗法制度、皇权专制等）发生了变化，儒教就会消失。

不过我觉得儒教确实有一定的“宗教性”。《宗教百科全书》中，对宗教的定义是这样的：“总的来说，每个已知的文化中都包含了或多或少的宗教信仰，它们或明了或令人疑惑得试图完美解释这个世界。当某些行为典范在特定的一个文化中得到确立时，它就将在这个文化中打下深深的历史烙印。即便宗教在形式、完整度、可信度等等都应不同文化而不同，但人在社会中还是不可避免要受到宗教影响。”我认为，这里所说的是广义的宗教。

说儒教具有“宗教性”，一是它在中国发挥着宗教的一些作用，和其他宗教一样，儒教承担了对自然的解释、司法审判、道德培养和心理安慰等功能，“儒教”也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教合一”体制；二是它和马教一样，曾是中国民众的一种信仰，而且不是一种可以讨论、可以否定的学问。从这两个方面看，儒教又有宗教的特点。

罗嗦了半天“儒教是教”、“儒教非教”，其实是回答“布朗运动”网友的质疑。现在还回到传统文明的第二根支柱，也就是以儒教为核心的社会价值体系上来：儒家学说到底在大陆中国是个什么位置？当然，作为制度性化儒教，随着皇权统治的结束，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儒教”对当今中国社会也没有基督教对当今西方社会的那种作用。余英时有个观点：制度化儒学已死亡，它已成为一个“游魂”。我同意余英时的这种说法，中国经过 160 多年的社会动荡，旧的有效的教化民众儒教制度确实已经被打破。但这个“游魂”仍然徘徊在中国大地，对当今中国社会产生着影响。

而且我还坚持我说过的那个观点，儒教有合理的和不合理的成分，经过各种思潮的冲击（特别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拜金主义）和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中国大陆已经实现了“剔除其精华，保留其糟粕”。其结果就是我们目前社会的现状：“剔除其精华”导致了礼崩乐坏、道德沦丧，我们已经成了一个没有任何社会道德规范的民族；“保留其糟粕”使得国人仍然是奴性十足，而且比以前奴性更足。

前边网友在跟帖中提到，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被丢得差不多了，谈不到对当今社会有什么影响。其实网友跟我说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这里说的是文化传统，不是唐诗宋词、戏曲书法这些传统文化。按李慎之的说法，“传统文化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之总和…..。文化传统则不然。它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它应该是中国人几千年传承至今的最主要的心理习惯、思维定势。”

长期的“大一统皇权专制统治”使中国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与此相关的文化传统，不管政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仍然变相延续下来。而儒教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它对今天社会还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先简单说一下我对儒家思想的肤浅理解，总起来说，我认为它有合理的地方，也有吃人的一面。儒家的学问就是一门“修己”和“治人”的学问，也就是通常说的“内圣”和“外王”。在古人看来，“修己”是为“治人”打基础，“治人”就是建立外在功业，是修己的最终目标。对于儒家的“修己”，我认为只要一不过分、二不越界，就是一个对现代社会有益无害的东西。

所谓不过分，就是有些如孝道、师道，即使放在现代社会，也有它存在的价值，但是不能过分强调、走极端，否则会限制个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这走极端的例子就是宋明理学，将儒学中君、父、夫三纲的权力绝对化，“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强调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的绝对服从。尤其是对女性权利的压抑，使“三纲五常”中反人性的一面恶性膨胀，从而将作为社会普遍伦理的纲常名教变成赤裸裸的专制统治工具，说它“吃人”一点也不过分。

更重要的是要对“修己”严格地限制在个人，而不是用于他人；限定于“私人领域”，而不是“公共领域”；限定于“修己”或“内圣”的范围，而不是扩展至 “治人”或“外王”的领域，即不从“修身”、“齐家”贯通至“治国”、“平天下”。“修己”说白了就是“人格完善”，但如果外推至“治人”的领域，就成了道德说教、侵犯人的基本权利。严格限制“修己”的界限，使其不能越过雷池一步，为的是让不同个体有进行道德价值自由选择的空间，防止圣人实行道德专制（即

“以理杀人”或简称为“吃人”)。

比如说，媳妇是否听老公的，是媳妇个人的事儿，他人无缘置喙，社会更无权做出要求。对寡妇守节的问题也是一样，守节与否，应坚持自觉自愿的原则，听由寡妇自己决定，只要没违反法律、没影响他人，别人无权说三道四。前一段这个坛子里讨论犬儒的时候，老芦大打出手对海外“伪民运”进行批判，我认为也是同一性质的问题。作为个人，完全可以坚持“饿死不吃嗟来之食”、“义不食周粟”，但那是人家个人的选择，他人无权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大陆识字分子。

同样的原则也可用于前一段所争论的美伊战争上。美国是当今世界的国际巡警，只有在其他国家出现战争、屠杀的时候你才有权力出兵制止。在伊拉克战争之前，美国二战后历次征战如韩战、越战、科索沃维和、打阿富汗、第一次海湾战争都属于这种情况，所以说美军是正义之师毫不过分。而这次打伊拉克就是赤裸裸的侵略，因为选择民主自由还是独裁专制，是伊拉克人民自己的事情，美国人无权用武力用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伊拉克，越是民主国家，越无权“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这其中道理就跟“修己”不能扩展至“治人”的道理一样。

说到这儿我顺便多说几句。美国的日子确实很不好过，即使不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也有难以为继的迹象。美国当国际巡警，重要前提是手里的家伙必须好使，因为美国人信奉“唯武器论”，不可能按照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去搞什么“人海战术”，不敢“死一半剩下的还可以搞建设”。所以就要大量投钱，使自己在武器的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要领先其他国家，尤其是“邪恶”“流氓”国家。

可问题是，这军火也是商品，必须要消费才行。“没有没有消费的生产，也没有没有生产的消费”，必须有地方消费、有人消费（买单）。过去是美国政府和欧洲日本一起买单，现在欧洲日本经济衰退，谁来买单？总是由美国自己垫支美国也耗不起。更重要的是，如果世界上总没有战争和屠杀怎么办？现在世界两大主题，和平和发展，没事打架动粗的国家越来越少了，美国凭什么出兵，这军火又到哪去消费？没有军事工业，美国实体经济还剩点什么，一个大国总靠虚拟经济能支撑多久？

(14)

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是“仁”、“礼”、“中庸”。我想分别谈一点我的看法。当然，当代大儒们一定不会赞同这么干，在他们看来，三者之间是一个整体，互相联系，互相规定，互相制约，互相补充，按照中医的说法就是互为表里，还有不少大儒终生致力于三者间的“相济”。不过我觉得不这么分开讲，拆开了揉碎了，不足以说明儒家学说到底哪些是糟粕。

“仁”居于儒家学说的核心的地位，可以说孔子以“仁”为中心建立了儒家伦理学。孔子主张“仁者爱人”，意即仁者应把人当作人来爱护。他还把为“仁之方”（即实行仁爱的方法）总结为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完整组成了儒家的一条重要的道德准则，“忠恕之道”的合体体现的就是仁爱。“忠道”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就是“己之所欲，亦施于人”。“恕道”就是宽恕待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唯有如此才是仁的表现。用今天的话说，儒家实行仁爱的方法讲就是换位思维，将心比心，从“欲”和“不欲”两个方面来根据自己内心的体验来推测别人的感受，这是儒家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原则。

我认为，儒学的“仁”没什么错，今天用来教化民众、培养官吏，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可惜，经过阶级斗争和拜金主义洗礼的中国人民，早就不吃这一套了。即使是在传统社会，这一套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也值得怀疑。按专家学者分析，儒家学说对于个人行为道德的约束作用，也是个金字塔结构，越往下约束越多，越往上约束越少，到了塔尖，就是像毛主席说的，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而且过去社会问题少，主要还是生活简单、诱惑少，就跟过去山青水绿蓝天白云绝不是民众有什么环保意识或理念，而是因为工业不发达；老年痴呆少见也不是有什么灵丹妙药，而是人均寿命低；肥胖症三高少也不是有什么高超的养生方法，而是因为生活贫困，没肉吃。所以，搞儒家社会主义，大概没什么戏。

“中庸”作为儒家思想为人处世、个人修养的重要思想方式和个人要求，广泛而长期的影响着中国伦理学思想。关于儒家中庸之道，其基本含义，一言以蔽之，就是“适中”。“中庸”是一种修养方法，主张“不偏不倚”、“执两用中”、“适量守度”，运用中庸之道调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的关系。中庸之道也是儒家解决一切问题的最高智慧，其基本精神是通过“折中调和”、“无过无不及”、“不轻不重”、“不温不火”、“不多不少”“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手段，用缓和、和谐、适度的方法消融矛盾、避免冲击、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在中国古代，中庸之道可以说是一种调节社会矛盾的高级哲理，也是一种生存智慧，它把“无过无不及”的庸常之道作为天下的定理、正道，它要求人们凡事要适中、适度，保持均衡。中庸之道用于治国是一种守成之道，并且是没有危险紧急情况下的智慧之举。

当然，关于“中庸”的准确定义也很模糊，也可以理解为“和稀泥”、“墙头草随风倒”、“好好先生”、“混日子不求上进”、“折中主义”、“耍滑头”等。鲁迅对“中庸”就很不以为然，屡有批判：“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鲁迅还引用徐炳昶给鲁迅的信“惰性的形式表现不一，最普通的，第一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听天任命和中庸的空气不打破，我国人的思想，永远没有进步的希望。”作为一个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的激进文人，这些话没什么错。

作为一国之君的伟大领袖，改造中国也从批判中庸入手，毛主席最担心的就是群众运动“不温不火”，唯恐“不过头”、“不过火”。老人家信奉的是“矫枉必须过正”，割疮必须带好肉，以此来指导农民运动，领导延安整风以及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不愿、不能、不敢这么做的干部就是运动的绊脚石。伟人溘然长逝，但“泼脏水一定要把孩子一起泼出去”的精神我看是亘古永存。

毛主席逝世以后，老人家所痛恨的“中庸之道”又有抬头，像老邓的“韬光养晦”、“不扛大旗”、“不出头”、“谁也不得罪”就被军队鹰派批为“中庸之道”。据说联合国每当举行会议，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有一套自己的表决规则：遇到关于自己利益的事情投自己的票，和自己没有关系的则一律投弃权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少说为佳”，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事实，军队鹰派也认为这样的做事法则暗合儒家的“中庸之道”精神。

不管对儒家的“中庸”的理解如何不同，我觉得只要确定一下适用范围，“中庸”好像也没有错。

儒家学说能在中国流行开来，并成为人们的道德行为准则，我想有很多因素，其中跟我们农耕生产方式有关。同理，近代中国吸收现代文明观念出现的消化不良、上吐下泻，也与此有关。我前边说过，我们国家本质上还是个农业国，国人处事方式也都还是农民的做派。“中庸”之道最可能以农业文化为生发土壤，其他文化类型都不可能导出这种人群整体心理倾向。

据冯天瑜先生的分析，“华夏——汉人崇尚中庸，少走极端，是安居一处，企求稳定平和的农业经济造成的人群心态趋势。”我觉的他这个说法有道理。在农村干过农活的网友都知道，在没有塑料大棚以前，只要不造梯田挖河泥修水库，农村的生活每年都差不多，简单重复的、闲适、稳定。农民最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我在农村还听说过四大舒服：坐牛车，走沙地，穿大鞋，放响屁。农活来不得冒进和懈怠，急不得也等不得，只能按照“农时”，不紧不慢、持之以恒、不温不火，对一切采取“适中”的态度。另外，农民大都保守迟钝，容易满足，这也跟农耕生产方式有关。

而对中国国家的发展、国民性影响，起负面作用最大的我认为是“礼”，就是亲亲、尊尊。亲亲就是亲缘关系，尊尊就是等级观念。

易中天说过这么一句话，“中国古代的政治，既不是法治，也不是德治，是‘礼治’，即等级制度。”我完全同意这种说法。类似的说法，我在王亚南（厦大校长，《资本论》译者）的《中国官僚制度研究》中也见过，王亚南认为，在古代中国，“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来维持，而是靠宗法、靠纲常、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来维持；于是，‘人治’与‘礼治’便代替的‘法治’。”所谓礼治，就是用礼仪制度和宗法等级秩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而这些制度和秩序，不管说的怎样天花乱坠，在本质上是维护统治者的利益的前提下，保持社会稳定。

到底儒家用什么来说服民众接受这一套的，我认为它的理论依据一是天人合一，再就是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王亚南在和李约瑟探讨中国官僚政治问题时候说过，儒家学说对于维护古代集权专制统治可利用的理论有 1、天道观念；2、大一统观念；3、纲常教义。这三者对于专制官僚统治的维护，是缺一不可的。这里的“纲常教义”就是礼教的核心内容，儒家通过天人合一、家国同构的理论推导，成功地把天道观念、大一统主张、纲常教义结合成为“三位一体”。

农耕文明基本上是靠天吃饭，所以对自然心存畏惧和崇拜。董仲舒利用这个特点，提出个天人合一的理论。天人合一的具体内容包括“天人同构”、“天人感应”、“天人相通”。意思是天上和人间是一致的，人类社会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自然界有什么，人间也得理所当然的有什么。天有五行，人身体内有五脏，为人处世上就得有五德（仁、义、礼、智、信），五德结合五行，就变成了：仁与东方的木合，义与西方的金合，礼与南方的火合、智与北方的水合、信与中央的土合。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春夏秋冬，人有喜怒哀乐；天有阴阳刚柔，人有君臣男女。

这种“天人同构”做法的结果就是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从自然界法则引伸出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证明人间的一切现存的规矩秩序，包括朝代建立，创建制度，分清等级等等都是由上天来决定的。从而把社会的“上下贵贱之别”也说成是天意、合理的、天经地义的、永恒的。自然界是天在上、地在下，人类社会就应该君在上、臣在下；就应该君尊臣卑，官贵民贱。自然界阳刚阴柔，人类社会就该男刚女柔。所以，做臣民儿子媳妇的，要柔顺，要服从；当皇帝父亲丈夫的，则要刚硬，可以为所欲为。中国有句话，叫做“大丈夫能屈能伸”，在现实生活工作中意味着对上要善于低眉顺眼，对下要敢于横眉怒目。

而且不顺从天意还不行，因为上天还是有感情的，能够和人类的活动产生互动，这就叫做“天人感应”。人要是按照上天的要求做，上天就会高兴，结果就是某地出现了凤凰麒麟，或者老树开花枯枝发芽，这叫做“祥瑞”。不按照上天的要求做，上天就会生气，弄出些旱灾、水灾、雷电、冰雹、扫帚星、地震、日食月食等来惩罚人类，这种反应就叫做“灾异”。

在天人合一中，这“天”是个什么东东，谁也说不清楚，只知道是个至高无上、决定一切的力量。普通人同天并不能攀亲，唯一可以代表“天”的就是“天子”，也就是皇帝，由于这种特殊的关系，天把最高权力赋与了天子，天子可以代表“天”来行使权力。这样一来，天道观念在逻辑上看上去就是合理的、无懈可击的了。哪怕是中国历代王朝末期的犯上作乱者，往往也假托天命，讹言端异，弄出些“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替天行道”的名堂来，以加强其政治号召力。每一个王朝的开国君臣，都是会把“天予不取，反受其殃”，“予弗顺天，厥罪惟钧”的经典文句，背诵得烂熟的。

(15)

再说说“家国同构”。“家国同构”是传统宗法社会的显著特征，即家庭、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由于古代中国的经济基础一直处于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状况，这种生产的典型特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养成了中国人强烈的家族本位意识。家庭或由家庭扩大化的家族是社会的本体，社会是无数个家庭或家族的集合，国就是放大版的家，家就是微缩版的国。作为个人的社会角色首先是家庭成员，然后才是公民。

在古代社会，由于人们生活圈子的狭窄，血缘、亲缘关系便成为人们重要的人际关系。通过血缘和亲缘，人们结成政治上、经济上相互依赖。因此，在传统社会中，中国人往往把家庭看得比个人更重要，特别重视家庭的伦理关系和个人在家庭中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家族本位意识。这种意识在传统社会中抑制了人的个性，但却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和谐和秩序，造成了传统中国“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

中国和西方确实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中国以家庭、家族为本位，西方以个人为本位。中国人的观念，是以“家”为中心的，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原始概念就不是“个人”，由这“家”往外推而形成的宗法，是中国社会基础。“家”的特征明显，且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统治者被设定为一个“大家长”，这个家长要在道德上为全国臣民做出表率；家长要爱臣民，臣民要尊重和服从家长统治。这与以“国”为特征和单位的西方政治学说也形成明显对照。在那里，存在着角色和利益不同的人；不同的利益所在，要求权力的互相制约；在这种利益和权力结构中，君主并不被看成是自然的家长，而是行政管理者。

在纲常面前，“我”是种离心的力量，如何与“我”作斗争，一直是儒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为了抑制“我”，提出“克己”、“无我”、“无意”、“无私”、“无心”、“忘己”等等。只有达到“无我”的境界，才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利于大一统集权专制统治的人。这不是我瞎说的，程颢有言在上头：“无我，则圣人也”。如何达到无我呢？就要与天理为一。在天面前，不存在人人平等，因此中国传统社会中人只有角色人格，而没有独立人格，也谈不到平等和个人尊严。

所以，很多人到死也搞不明白，为什么在中国经常会出现囚徒赞美监狱、牛羊歌颂屠夫的现象。比如说，在伟大领袖的治下，九亿农民被剥夺了迁徙的自由，数千万农民在大饥荒中失去了生命（张戎说是七千万，袁隆平说是四千万，半官方的说法是两千万）。可如果你实际接触一下农民就会发现，他们对此并不在意，至少不像想象中那样义愤填膺。他们认为党中央毛主席就是家长，家长有打孩子的权力，也有错打孩子而且不认错的权力。有个混蛋家长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没有家长。袁腾飞说中国人不下跪、不喊万岁心里空虚，绝非戏言，就是这么回事儿。

古往今来，中国人都习惯了跪着的，在公跪长官，在家跪家长，在庙跪菩萨，在外跪洋人，顺民是统治阶级最想塑造的大众形象。我记得文革中听到一个故事，说是某专家（作家、高干？记不得了）每天撅着屁股挨斗受不了了，想轻生，老家的农村亲戚来看他，说如果我挣你这么高的工资愿意天天坐喷气式。现在也是一样，人们一着急还是下跪。我们附近有个家属区搞拆迁，条件还说得过去，按住房面积 1：3 给新房，百分之九十的住户都同意，就是有几户老头老太太死活不搬。开发商开始动粗，断水断电，这些老人到市政府告状，副市长一出来，一帮人齐刷刷的下跪，甚是壮观。还有我们学校一对教授，孩子找不到工作，想到实验室当个技术员，校长不同意，说是必须本科毕业。这对教授趁着开校长办公会闯进屋去，双双跪下，不答应就不起来，就这样最后还是把孩子给安排了。

农耕文明还养成了中国人崇老尚古的历史观。定居农业是以家庭和家族为单位进行的，长期的家庭和家族生活，对等级制度和权威崇拜的产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农耕文明不奢谈更新，简单的农事劳动对于经验的依赖性非常强，几千年来农民种地靠的是经验，跟科学技术没什么关系，只要六七十年代下过乡的都有体会。农业生产周期长，对时令的摸索、耕作技术的总结等均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传递过程。所以，中国人非常崇尚由祖先或者长者传授给他们的经验，整个民族以尚古为美，尊祖敬宗，经验至上，求稳喜静，厌恶变革。学术界也不例外，始终弄不清典籍的文物价值和科学价值之间的区别。

另外，农业生产的播种、收割、兴修水利等都需要一种绝对权威把所有劳动人口集中起来使用，长者自然处于优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尊从长者、听顺权威便是顺理成章之事。在他们的生活中，老者长者，既是家长，又是师长，是经验、智慧、权威的化身。所以，在家族内部很自然地按依靠血缘辈分的序列形成秩序，每个“家”内的家长对成员的专制统治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把家族结构扩大至国家结构，国家的组织与权力配置实行家长制也就是合理的，所以“家天下”的皇权集权统治也是合理的。

“家庭－家族－国家”，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模式是儒家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反映了“家”与“国”之间这种同质联系。这也是为什么古人可以从“修身、齐家”导出“治国、平天下”。孔子答复一个不肯从政的人说：在家里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就有政治作用，就等于从政，何必一定要立在政治舞台上？（“推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论语》为政）

儒家把家族制度看作整个社会的基础和柱石，并使之完善化、理论化，逐渐形成了国家同构的社会结构。从兄弟关系引出长幼关系，从父子关系引出君臣关系，从宗族关系引出整个社会的上下、尊卑、贵贱、远近的人伦关系和伦常秩序。因为皇权集权统治可以在每个家庭内找到它的对应物，父子君臣是一种同构关系，孟子“父子有亲”后面紧跟着就是“君臣有义”。

就拿“三纲”来说，“三纲”指三种绝对服从的关系：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这三种关系中，臣、子、妻分别处于要服从君、父、夫。这其中的道理很明白，因为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家国一体，家族中有父权、夫权，而国家最高的家长是皇帝，皇帝自然就要有君权。因为儿子要服从父亲，妻子要服从丈夫，所以臣民要服从君主，这就是所谓的“忠孝一体”。礼教是培养顺民的文化，顺民最大的特点是安分、守规矩，缺乏独立自主的意识。以“三纲”为纲，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也扼杀顺民们的自主意识、残害人格、扼制人权、束缚个性、限制自由，阻碍社会进步。“礼治”社会毫无公平公正可言，经过两千年的教化和实践，造就了愚昧、轻信、妄从、封闭、保守等国民特性，铸成了亦主亦奴的社会人格。

这推理过程按照伟大领袖的话说，也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因为在家要对家长尽孝，所以在国要对君主要尽忠，通过这样对忠孝观念的整合，使得忠孝一体在家国同构的伦理层面居然有了内在逻辑的合理性。长期这样教化的结果就是百姓对统治者产生了认同、归属感，臣民对皇帝不但口服而且心服。它将出于自然之情的孝与忠互相结合，要求臣民对君主不仅要作理性上的绝对服从，而且还要作感性上的父权认同，使其政权的“合法性”变得更加牢靠。

即使到了今天你仍然可以从现实中感受这种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存在，这种“家国同构”还是“余音不绝”。现在台湾、日本、东南亚国家所建立的“东方工业模式”、“儒家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家族式管理”。我看到不少公司招人的时候都强调，聘用的条件之一就是在家孝敬父母，实际上也是想让员工把企业当成家，只有在家里尽孝者，才可能在厂里尽忠。很多老年人对民主自由那一套嗤之以鼻，最常听到的说法就是，“一个家庭也还得有个主事儿的家长吧”。

历代王朝都极力推广孝道，在政治、经济上对孝子贤孙们给予了种种的优待，所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孝道被竭力宣扬而成为“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经•三才章》），目的就是“由孝劝忠”，劝导人们对皇帝尽忠。李密在《陈情表》中开宗明义地说：“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中国古代有“丁忧守孝”，就是官员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也是是否遵礼制、是不是孝子的标准。具体说来，就是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死去，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丁忧期间，丁忧的人不准为官，若官员匿丧不报要受到严厉的惩处。如遇到紧急情况，国家也不可以强招丁忧的人为官，因特殊原因国家强招丁忧的人为官，叫做“夺情”，意思是剥夺了孝子服丧之常情。如果武官镇守边关的时候突然父亲死了，按照惯例，应当上折子请求丁忧，然后朝廷不许，下旨“夺情”。

最早连君王也要丁忧的，称作“谅阴”。但到后来发现太不现实了。所以也有以日代月的搞法，只服丧二十七天作为形式。到了乾隆，创制了一个“心丧”的办法，意思大概是“身不能至，心服丧之”，连二十七天的形式也不必走了。这世界上最后一个“谅阴”的是朝鲜的金正日，自“慈父领袖”金日成死掉后，朝鲜足足有三年没有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停止一切对外活动，不见客人，不发表谈话等，躲在角落里守孝。我想金二这样做目的无非有两个，一是引蛇出洞、静观其变；再就是“由孝劝忠”，劝导人们像金二对慈父尽孝那样对新领袖尽忠。所以，说东亚诸国甭管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多少还是能看出儒家文化的影响。

古代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社会特点是有很大区别的，西方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契约制，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的社会制度都打有契约制的烙印，这也是海洋文明的特点。是否海洋文明跟一个国家的海岸线长短关系不大，中国海岸线不算短，而日本就是个地道的岛国，但照样是农耕文明。关键是这个民族是否有航海技术，是否有开阔的视野，是否有冒险精神。海洋文明的生产方式一是航海，二是贸易，出去以后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靠七大姑八大姨不行，只能靠契约，所以欧洲的文化传统就是重契约和法律，轻人情。即使搞专制也与中国不同，中国是专制与集权高度统一，西方是专制与分权相统一。

而且海洋民族还可以用世界不同的参照物客观地认识、改造、提高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荣辱不惊。不像中国、日本这些农耕民族，历史上长期处在一个封闭的环境，每个人都被束缚在耕作的土地上，天只有看到的那么大，总是那么少见多怪、一惊一乍的，总是在自卑和自大两极中震荡。相比较而言，日本表现更甚。

东方文明的一大特点就是等级制度。印度社会表现为种姓制，从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形成种姓制后，种姓制一直都深刻的阻滞着印度的发展。和中国的等级制度不同，中国是流动性的等级制，而西方是凝固的等级制，印度显然是受后者的影响。种姓制作为制度已经消亡，但作为文化传统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彻底消失，对印度社会还有影响。看过印度影片《流浪者之歌》的都知道里面的"拉兹"有这么一句话：法官的孩子永远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即使今天的印度社会，也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偏见。

中国也是个等级社会，但和印度不同，中国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宗法等级制度，数千年中国文明史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其社会形态历经多次嬗变却稳固的保持其宗法等级制度的特性不变。每次新朝代的建立，统治者都不忘要维护礼仪制度和宗法等级制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巩固统治，社会才能安定。宗法等级制度主要体现便是所谓礼教，最重要的特征有二：一是亲亲，即强调家族血缘纽带，二是尊尊，也就是等级明确，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生活在等级结构中的人们各有各的等级定位，不得僭越。

人们常说生活在中国很累，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要处理各种关系，因为礼的本质表现在"别"、"辨"、"分"上。《荀子•富国》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儒家的礼学在确定皇权至上的同时，还强调等级特权。主张人的身份、地位进行区别对待。在现实生活中，要时刻注意别亲疏、辨远近、分尊卑，若不这样做的话，就会被人骂为"是四六不懂的玩意儿"，因为个人只有在社会人伦关系网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墨子主张兼爱，不别父兄；杨朱提出不损害他人的为我。可是在孟子看来，这违反了亲亲、尊尊、斥之为禽兽。儒家的人与人的和谐其实在中国只能是宗法关系的延伸，爱就是爱自己的亲人和与自己有关系的人，绝没有爱所有人的意思。儒家的爱，是个选择性很强烈的爱，是在伦理的界内才有的爱。

(16)

先回答布朗运动和陈皮两位网友在跟帖中提出的的问题。

老布：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老金，你觉得现在这种 2-3 亿农民工离乡别井，离开土地，到处打工的情形继续下去，会不会慢慢带动俺们这个民族向重视契约合同方向发展？

当然会，但这个过程会非常漫长，理由有以下两点。
1、经过数十年的痞子化洗礼，原有的道德体系中合理部分已经被破坏，现在中国已经再也找不到杨白劳那样宁可自己喝卤水也不卖假豆腐的老实人了。在毛主席看来，那属于"宋襄公式的蠢人"，是土改工作队重点启发对象；在今天，是谁也看不起的穷人，这些前边我已经说过不少了，不再赘述。

2、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是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中国要挣扎出农耕社会的泥潭确实是困难重重，光是身份的转变即"农转非"就不得了。我看了一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比例，都在 5%以下：日本 3.2％，美国 2％，加拿大 2.3%，德国 2.9%，法国 2.2%，意大利 4.6%，荷兰 3.1%，英国 1.7%，澳大利亚 4.4%。差点的像韩国 7.2％，新西兰 8.7%，俄罗斯 9.7%，罗马尼亚 12%。而发展中国家都高，像朝鲜 29.7%，墨西哥 21.7%，巴西 14.8%。而农业人口比例在 60%以上的国家只有缅甸 69.3%，越南 66.1%，中国排在第三位，64.9％。这越

南咱还不能比，咱们只是够糊口的，“用占全球 7%左右的耕地养活全球 20%人口”，仅此而已；而人家是世界上第二大米出口大国。

上面的发达国家，有地广人稀的，也有地狭人稠的，唯独没有中国和印度这种地广人稠的国家。中国农业人口的比例，改革开放前是 85%，那时一说中国国情就是十亿多人口，八九亿农民。到了 1999 年是 71.9%。以后城市化的步伐慢了下来：2000 年是 66.6，2001 年：66.0，2002 年：65.4，2003 年 64.9，现在是多少我没有查到，专家估计是 60%左右。现在每年农业人口减少不过 0.5%左右，可绝对数量不得了，每年就是大几百万，而且还得年年如此。这些人的就业、住房、教育、医疗怎么解决？城市居民讲，这些人都进城来，光是拉屎撒尿都没法解决。当清流容易，做循吏难。

（以上农业人口的数据均来自《国际统计年鉴 2005》，http://tjsj.baidu.com/pages/jxyd/29/82/51b02437d68f0e25e9606a83c44d1b27_0.html ）

现在中国出现的很多问题，实际上都是两种文明碰撞的结果，都是城市化进程的结果。就拿咱们坛子里前一段说的热闹的高房价来说吧。我看实际上政府就是拿高房价当户口本使。基本上过去买户口的价码和现在城市住房的价码是一致的。我记得前十几年有“买户口”这么一说，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在当时价码最高，这里面北京又是排第一位的。现在房价也是一样，北京照样排在第一位。现在国内亲戚朋友聚在一起聊天，很难不谈到房价问题。哪个地方房价高，那地方的人身板儿都高了一截。若哪个地区房价还在两三千一平米徘徊，就要会成为怜悯、扶助的对象。

现在问题的出现有毛主席的原因，也有现政府的责任。老芦说的非常对，论治理现代国家，毛确实称得上是个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的超级白痴。光是把千百万城市小青年户口迁往农村这一件事就可以坐实老人家“超级白痴”的身份，永远不得翻案。看看现在农村的现实情况就知道，不是什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而是“广阔天地无所事事”。种一亩三分地根本用不了那么多人，十分之一足矣，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是国家最头疼的事儿。屠童事件、富士康 12 连跳，主力军都是这些人。农村不愿意回去，城市又留不下，怎么办，善一点的跳楼，恶一点的屠童。

所谓现代化，就是想方设法把绝大多数人口搬到城市来，或建立新的城市，舍此无他。想当年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宣布在本世纪内（20 世纪内）实现现代化，就知道什么叫环境使智力退化，当时中国可是“十亿人口，九亿农民”的国情啊。由户籍制度和资源配置制度产生出来的城乡二元结构，是毛主席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之一，要又要不得，扔又扔不得。户籍制度既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也是二杆子严控型社会的产物。很像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前的南非。南非曾经规定：年满 16 岁的非洲人必须携带身份证、迁移证、寻职证、居住证、纳税证明等，以备警察随时检查；如果忘了携带或者证件不全，会因“无业游民”的身份而被捕，仅 1958 年，南非就有近 60 万人因此被抓。

如果不废除户籍制度，中国的“三农”问题就永远不可能解决。立刻把户籍制度取消，势必造成混乱，孟买贫民窟的马上就会成为中国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成为让中国人脸上挂不住的名片。而中国搞得一系列“特色”解决办法，实践证明都是失败的。80 年代具有血缘和地缘特征的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除了造成污染以外，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农民工进城问题也不少，进过城的都不愿意回去，最后出现很多

社会问题。现在看来只能渐进的前提下，使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彻底的转移，离土离乡进城。

“户籍”在中国约定俗成指的就是二元户籍，废除户籍其实是废除二元歧视。农民在教育、医疗、社保、税费、金融甚至选举权等方面，都受到种种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195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了“居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但随后的《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户口登记条例》都违反了宪法。197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后来的宪法取消了迁徙自由的规定。1978 年之前，人民只有持有介绍信，才能在国内“出差”；三年饥荒时期，许许多多的饥民出外要饭而被千里抓回，活活饿死在户籍所在地；2003 年之前，许多外地人被收容遣送，被关押、虐待。2003 年孙志刚事件，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中国人民实现了迁徙自由。但光有自由迁徙不行，享受不了城市的待遇，自由迁徙有个 P 用。

现在户籍制度虽然还没有取消，但按照俺们东北银的话来说，就是“已经不好使了”，很多单位接收大学生研究生根本不看户口本，也就是子女入学还有点用。但现在资源配置制度并没有取消，一般规律是哪个地方官僚多、级别高，哪个地方的资源配置也越丰富，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条件越好、机会越多。稳定官僚和知识精英阶层，是维持大一统集权专制统治的基本要求。在中国，北京作为中央集权的象征，集政治、经济、金融、教育、科学、文化、体育 N 个中心于一身，所以成了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

在北上广这些城市，有大量的外企，几乎世界 500 强无一漏网。随便找个大公司当个白领，挣个万八千大概没什么问题。在二线城市，恐怕也就是三五千，到了小城市，根本没有“外企白领”这么一说。所以提起北京的高房价，外地人听着忒解气。凭什么就北京人挣得多、花得少。北京公交车现在刷卡才 4 毛钱，而且不管坐多远。前几天我陪人从北京西站坐车去鸟巢奥运村，十几公里一个多小时两人一共花了 8 毛；地铁线比过去扩大了好几倍，价格却降到了 2 元钱，比一般城市低得多。花上 2 元钱，可以坐上百公里。教育也是一样，同样的分数，在地方上个省级学校，在北京就是全国重点。医疗条件更不用说，在“全国人民上协和”环境中，北京人又占了先机。而且北京成名发财的机会更不是外地能望其项背的。我认识一个教授，调入北京前没人搭理，在北京七混八混当上了院士。

这几十年城市化进程缓慢和政府的做法也有关系，不能把一盆子屎都扣在毛主席头上。我前边说过，中国无论干什么事儿，前提就是官僚阶层要受益，至少不能吃亏，在此前提下，百姓跟着沾光。中国大官僚最集中的地方是大城市，所以城市化过程就是在大城市摊煎饼，对解决农民进城没什么大贡献。

应网友之邀，就富士康 12 连跳再单独说几句。

富士康 12 连跳的相关评论文章国内论坛有不少贴子，我还从来没去看过，也懒得去看，估计个顶个的都是“尖锐、犀利、深刻”。若让我说，根本原因（按温总理说法是“深层次矛盾”）是现代化和农民进城的矛盾：现代化的进程需要让至少 80%的人口到城市里来居住，反过来说，十亿人口都挤在农村里，也谈不到什么建设新农村，所有发达国家建设新农村的手段，无一例外地都是减少农村人口。这本来是连普通白痴都应该明白的道理，可咱中国人福气大造化大，偏偏遇到了毛主席这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的超级白痴，所以命里注定活该有这一劫。

由于下列原因，中国近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没有取得理想效果：

1、中国人口基数大，具体操作起来难度极大。虽然最近几十年我们的城市人口在增加了 N 倍，但对于十三四亿人口来说，不过是“一点毛毛雨啦”；
2、毛主席留下的城乡二元化的宝贵遗产。有人提出恢复毛时代的做法，也就是把农民继续在“广阔天地”当家作主，对于减少矛盾来说不啻为一步高棋，可惜毫无可行性。农民想进城，百姓想过富裕日子，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3、腐败加剧、贫富悬殊毫无节制地拉大，包括城乡差距、官民差距、军民差距、行业差距、地域差距，而政府不能、不愿或不敢采取措施缩小这些差距；
4、现政府忽视小城市的建设，只是热衷在大中城市上天入地（摩天大楼和地铁），而没有像日本那样建造大量的小城市。结果是投钱不少，容纳人口有限，而且产生了系列矛盾。

第 4 条再解释几句。这还是秦晖说的“尺蠖效应”，在中国不管搞什么，先决条件都是官僚集团受益（至少是不吃亏），普通民众是跟着一起沾光还是吃亏就靠撞大运。我以前说过那位搞经济学的学者，就是说“消灭了贫富差别，谁来挖沟修路盖房架桥”的那位，最近和我聊了聊高房价的问题。此公在公开场合的发言给人印象是“主流偏左”，经常做出“我为人民鼓与呼”的姿态，说些谴责政府的言论。这次我和他聊天的话题是房地产泡沫，在我看来这是政府失控，可按他的说法这完全在政府的掌控之中，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了半个多小时，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若当政也得这么办”。

他的意思是中国这几年 GDP 增长迅速，比如 2009 年是 8%左右。按说中国对外出口依赖程度非常高，西方世界闹世界金融危机，洋鬼子都捂紧腰包，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还能保持这么高的增长率，靠的是什么？卖地！天价卖地！在哪卖地？当然是哪里的地价高卖哪里的地。因为这样官员捞得多。另外，大城市良好的教育、医疗、社会福利，也需要这笔钱来支撑，GDP 增长也需要这么干。

按经济学家的说法，在 2009 年 8%的 GDP 中，其中 2%是房地产的贡献。实际上远不止这个数，这恐怕说的只包括可卖地和盖房子消耗的水泥钢材。其扩大内需、拉动 GDP 的间接作用也不得了，比如说你住房面积增加了，原来一个空调不够用，得再安装两个；同理，现在孩子与父母之间有代沟，不但没有共同语言，说不到一起，而且还缺乏共同的兴趣，所以很多人家都是两个电视，两个电脑；现在家里的洗手间都不愿意让外人用，两口子卧室一个，外边客厅旁边再来一个，里面的马桶、洗手池都得两套。现在的小区都有地下停车场，每家至少 1-2 个停车位，有了停车位，就为拉动汽车消费创造了条件：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09 年中国国产汽车产销分别为 1379 万辆和 1364 万辆，在全球车市“一骑绝尘”，成为世界汽车产销第一大国。

结果就是城市越建越好，即人们通常说的“城市赛欧洲”。城市里的土地有限的，所以一定会房价越来越高，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对进城的农民工，以及农村出身在城市里就业没有门路而又不能啃老的大学生（特别是本三和大专生）来说，等于断了他们留在城里的路。他们毫无前途，充满了悲观绝望情绪。咱们来算一笔账，假如一个农民工在工厂一个月挣 1500—2000 元（含加班费、三险），那么意味着他虽然可以生活下去，但干一辈子也远不够在城里买房安家。而且除极少数人（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外，农村来的打工仔再干也是打工仔，绝无升迁的希望。如果把他们的薪水提高到可以在城市里买房安居的水平，中国的出口将会彻底崩溃。再说，城市里能容纳得下吗？若是在城里干上几年再回乡去，那不等于又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不留在城里，农家子弟上大学还有什么意义？

这些穷二代农民工和他们的父辈不一样，他们的父辈挣来的钱只有很少一部分用来个人消费，能省就省，巴不得只要睁眼就有活干，最怕的就是不让加班，没有剥削和压迫。憋急了找个站街女，花上三五十元打一炮，馋坏了买只烧鸡，喝上半斤二锅头呼呼睡一觉，一天到晚乐呵呵的。就这样十几年、几十年下来攒一笔钱，给孩子上学娶媳妇，给自己盖栋新房子。再苦再累人家也没有怨言，生活充实甚至有成就感。当干不动或者没活干、不愿干的时候，继续回农村，现在有责任田，虽发不了财，但有个保险作用，我知道农村很多老人都是把责任田租出去，保证自己有口饭吃。

实际上，毛时代走过来的穷一代（也就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对待困难挫折的态度还是电影《芙蓉镇》里那句台词：活下去，活下去！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

而穷二代是看着城市青春剧长大的，他们知道城里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不愿在回到农村过父辈那种日子。而且受到资产阶级"人权平等自由"，不认为自己就活该是受苦的命，但又无法在城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干多少年还是过客，"都为他人作嫁衣裳"，最后还要回到那生我养我的农村去。而且他们也没有反抗的意识，原因我已经说过了，一是现在只是生活好坏的问题，不存在"饿死也是死，造反也是死"的动力；二是与陈胜吴广时代不同，锄头铁锹取胜热兵器毫无希望；三是现政府还没有软弱或开明到不能、不愿或不敢维护稳定的程度。

所以看看他们的眼神就知道，充满了茫然、忧郁甚至绝望和仇恨。平时他们不攒钱，业余时间大都打游戏机度日。这一代年轻人是在家长老师的呵护下长大，集三千宠爱于一身，人称"草莓族"、"水蜜桃族"，看上去光鲜亮丽可爱，但怕挤怕压怕碰，一遇到挫折，如失恋，就会走极端：善一点的跳楼，恶一点的屠童。

不过，我仍然坚持 15 年内中国政局不会出现大的改变的观点，包括大治和大乱，也就是说不会出现军队国家化、多党执政、三权分立、民主选举等情况，而恢复毛主席的阶级斗争为纲、计划经济、纯公有制（现在是混合所有制）也不大可能。说 15 年是因为中国居民人均期望寿命为 73 岁，我的健康情况也就是对付个"人均寿命"，所以考虑问题常常以 15 年为限。

说不会出现大治，理由就是继续改革既无压力又无动力，只有阻力，来自党内开明人士、党外自由人士那点声音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不会出现大乱的理由我也说过了，简单说就是精英不想变，底层想变又变不了，而且上上下下谁也提不出来什么切实可行的方案来，不像当年毛主席闹革命，"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至于兵变，可能性也不大，不信你看看如今军队的待遇就知道了。像我这般年纪的部队干部，如果不找小蜜钱就花不出去。

另外，当前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为了某种理想信念献身的志士（不含白痴）。在任何时代都会有一批这样的人，唯独当今时代没有，有的话也只存在于网上。

(17)

下面就老陈在跟帖中说的观点谈几句看法：

"礼仪制度和宗法等级制度新中国开国以来，这两样东西已经面目全非了。""日本和南韩，实际上已经是儒家文化和现代文明结合的成功例子。"

首先，对老陈“礼仪制度和宗法等级制度新中国开国以来，这两样东西已经面目全非了。”的说法，我是这样看的，作为制度来说，确实是不存在了，但作为影响来说，依然还有强大的生命力，日本和南韩，也依然可以看出农耕社会的痕迹和儒家文化负面影响的存在。当然，人家正面的影响保留的更多。日本人在现代化的历程中，通过精英集团的精密设计和周全考虑（再加上日本没有经过国际共运的洗礼，没有出过伟人），人家把儒家文化中合理的成分以及本民族原有的传统如忠诚、对长辈和权威的尊重、集体主义、等级制度和天皇神话巧妙地整合进了社会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

如果没有马列主义的污染，中国当然不是现在这副样子。好像是老芦说的吧，传统文明尽管是一种落后的文明，它好歹还是文明。里面的很多内容，还有它合理的一面。哪怕像最为人诟病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则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所以，连强势皇帝汉武帝犯了错误照样还得下《轮台罪己诏》。皇帝的胡闹一般局现在皇宫内，和一帮宫女太监们胡闹，不至于拿国是开玩笑。

如果完全照搬苏联的模式，由毛刘周朱陈林邓里面的任何一个不姓毛的人来领导中国，中国转型起来也很容易。因为他们多少还是受传统文明的影响，谁也做不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周恩来自不必说，很多知识分子喜欢“周公”，就是因为在文革的杀气腾腾中，周还保持了“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的儒雅做派，是众痞丛中的一点儒；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公开赞扬儒家的修德之学、忠恕之道，认为儒家的反省、律己、慎独等修身方法仍然可以用于共产党人的锻炼与修养，这本黑修养也让他在文革中吃够了苦头；林彪经常在墙上贴个孔子语录，时刻惦记着“克己”。流行一时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也是来自旧文人的“读好书听好话行好事做好人”。

日本能够成为今天的日本，跟没有受到马列主义的蹂躏有关，毕竟军国主义狂热清除起来比阶级斗争学说容易得多。麦克阿瑟打仗有多高水平很难说，但治理日本确实有一套。日本人对美国人的态度也很微妙，感情上仇恨，理智上感谢。我亲耳听一个日本人说过，二战后期，日本败局已定，麦克阿瑟不来占领，苏联红军就要来占领，如果让苏联红军占领了日本，日本的前途不堪设想。天皇会“死啦死啦的有”不说，日本人以“八嘎”的劲头干起社会主义来，谁也挡不住，咱毛主席都未必是对手。毛主席说过最牛的一句话不过是“死掉一半剩下的人还可以搞建设”，人家可是“一亿总玉碎”、“樱花飘落在太平洋上”的魄力。

在对待日本美军基地的态度也是一样，感情上日本人都希望美国佬滚回去，理智上都希望美国大兵继续留下来。执政党、循吏都是“留派”，在野党、清流都是“滚派”。像日本共产党这样铁打的在野党，永远是最坚定的“滚派”。这次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失信于民，就是因为没想到革命胜利来得如此之快，自己能够这么快上台，还是拉开在野党的架势向选民乱许诺。

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想改一下：“日本民族是一个奇特的民族”，或者说：“日本民族是一个邪门的民族”。就拿学习外来文化来说吧，人家确确实实做到了伟大领袖说的那样“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但不管学什么，最后都变味，创出自己的一套东西来。像日语里的外来语中有个单词“撒必死”，来源于英语的service，可日本人用出了新意。比如你到超市买个冰箱，赠精美炒勺一个，这精美炒勺就是“撒必死”，远比 service 本身“服务”的语义使用范围要大得多。本区留日留美大侠不少，不知我理解的对不对？

有一次某日本教授说起日本人对儒家文化的学习，说日本人当年学中国只学了个半吊子，汉字没学全，只好假名来凑；儒家的忠孝也没学全，只学了“忠”，没有学“孝”。话里话外，意思是中国只有“孝”而没有“忠”。

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日本、韩国的崛起和咱输出到日本的儒学到底有什么关系？毫无疑问，它们的富强主要还是因为西化，而儒学到底是起着阻碍作用还是促进作用？我看在日本历史上，儒家学说的正面效应就是促进了日本的稳定，负面效应就是抑制了日本的发展和进步。那么今天呢？是促进还是抑制还是影响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先看看儒家学说对古代日本的影响吧。

儒家学说对于像日本、东南亚这样的集权农耕社会有着无穷魅力，他们特别容易接受儒家主张。日本引进儒家文化是十五六世纪前后的事情，跟前边六渡日本的唐代鉴真和尚没什么关系，他带去的是佛教文化。日本引进儒家学说的背景跟中国类似。日本历史上也有个“战国时期”，日本战国历史可与中国战国相比拟，各地大名林立，为争夺霸权攻伐不休。而且也是“无义战”。以后出了个嬴政式的人物德川家康（被称为“东照大神”），打败了日本的战国 N 雄（战国期间人名地名繁多，大战小战难以数计，搞不清楚有几雄），日本进入德川幕府（即江户幕府）时代。

为了加强专制统治，德川幕府的统治者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于是，儒学（朱子说）被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在此期间德川家族建立中央集权制度、采取锁国禁教政策，不能不说是受儒家学说的影响。

我感觉儒家学说日本人学得更好，用得更活。德川家康开创出的德川幕府，执政时期长达二百六十五年，这段在世界史上堪称绝无仅有的和平时代。直至明治维新前夕的 1867 年，德川家族的将军宝座总计持续了十五代。为继镰仓，室町幕府之后，最强盛也是最后的武家政治组织。这不能不说与引进了“社会稳定术”、“人际关系学”——儒家学说有关。当然，德川江户也是日本最保守最黑暗的历史时期。

最后德川幕府垮台的直接原因跟俺大清差不多，也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精神污染和军事侵略。精神污染先是来自荷兰的“兰学”，以后是来自英法的“洋学”的传播；军事侵略是指遭受英法美俄的“开国”胁迫，其中最有名的就是 1853 年美国海军将领佩里率领舰队两次闯进江户湾，迫使日本开港通商。最后德川幕府屈服于列强的军事压力，连续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和协定，出卖大量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

我这点可怜的日本历史知识，还是前些年一群不懂事的小毛孩子刺激出来的。据说中国大陆只要是喜欢玩游戏、看动漫的，就没有不知道日本战国时代、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这些东东的，受刺激之余，恶补了点日本历史知识，为的是不让小毛孩子们嘲笑。本文想利用这点知识说一下日本和中国虽然同为农耕社会，儒学都是正统思想体系，但两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日本过去并没有因为引进儒学而完全丢掉日本固有的文化传统，近现代也并没有因为推行“全盘西化”而丢掉原来引进的儒学文化传统，笼统地说，就是想说一下“日本特色”。我胸中点墨无多，对日本更是知之甚少，在诸位留日大侠、知日大侠面前献丑了。

儒家文化辐射圈的国家有些特点是共同的，如都吃苦耐劳，崇尚权威，都表现出集体精神肯定和对个性自由的否定，都缺乏独立的人格意识，都重伦理道德而忽视法律制度和契约的作用，都讲“情”、讲“礼”重于讲“理”。所以现在日本企业破产或者出了质量问题，仅仅赔偿还是远不够的，还要鞠躬谢罪，而且姿势还有讲究，平时问候老人上司，腰弯的角度可以任意大，但不能低头，但谢罪的时候必须连弯腰带低头，而且其幅度角度还要与罪孽深浅成正比。

古代日本和中国到底有哪些不同，我想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1、“万世一系”日本的天皇不同于“大家轮流坐，今年到我家”的中国皇帝；
2、日本的经济制度是采邑分封制，更接近中世纪的欧洲；
3、明治维新前日本的政治制度是幕藩体制，日本天皇长期处于虚君地位，并不掌握实权，而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幕府的手里；
4、日本长期以来是军人执政，而中国从来是文官治国。日本是贵族+武士政治，中国是官僚政治；
5、日本实行中央集权的时间相对较短，而且力度远不如中国。即使在被认为是集权化程度最高的德川幕府统治时期，中央（幕府）政府对地方封建主的控制也非常有限，分布于全国的各个藩国对幕府仍具有很大的独立性。

了解这些不同，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从古代到近代日本屡屡上演“下克上”；为什么日本人忠诚勇敢；为什么近代日本没有选择“走俄国人的路，而那么快就接受了现代资本主义；为什么日本仍然还保持着东方文明的一些传统。

先说说日本天皇和中国皇帝之间的区别吧。

虽然中国和日本同为君权神授，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首先是中国的皇帝和日本的天皇不一样在两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不一样。在中国皇帝是人，夺取天下的开国皇帝不是流氓，便是世家豪族，虽然都宣扬自己生下来就有许多瑞徵，如彩霞飞舞、祥云缭绕、百鸟和鸣、满室生辉等，而且很多人还有特殊体征，如刘邦大腿上 72 颗黑痣、赵匡胤生为香孩儿、李渊有九乳等等，但即便如此也是人，只不过不是凡人，是“异人”，是上天信得过的人间代理人。

其实连孔圣人也是人，更何况是践行孔圣人指示的皇帝。真龙下凡、神佛转世、圣人投胎这套说法老百姓从来没有真信过。天子即天之元子，天是人格化的自然界，被认为是宇宙最高的主宰，世间万物都是天地孕育的后代，因此，任何人都是天之子。按照宗法制度来说，只有嫡长子才有权力继承父的遗产，因此天子就是天的嫡传子孙。所以，天子的含义，乃是天的长子或嗣子。原则上可以这么说，许多人都是天神之子，都有做天子的资格，只要有德行和能力。

而日本天皇是神还是人一直非常模糊，日本最早的神话书籍古事记称，天神有三个孩子，其中最小的就是创世之神天照大神。天照大神有所谓的天孙，而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就是天孙的孙子。天照大神就是天皇的“皇太极”，这也成为日本君权神授的依据。其他国家君主制中的君主是作为一个人参与政治，而日本天皇制中的天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则作为神统治日本。

天皇和其家族没有姓（历史学上称其为天皇氏），因为是人是神不明，日本宪法也未赋予其公民权。虽然裕仁以后的日本天皇已宣布完全放弃历史上其被赋予的“神性”，但多数日本人仍认为天皇代表着“国家”，而中国皇帝只代表朝代。所以，在日本人眼里，有天皇在就不算亡国，对保留天皇的麦帅也是感恩戴德，麦帅在美国被贬，首先愤愤不平的是日本人。

我眼中的儒学形成和发展史（上）

避暑归来后大病一场，今日上网看到老芦大作《文明真空与未来中国潜在的危机》续完，才想起我在本区还有个《中华文明“行”在哪里？》的烂尾楼工程，这几天有点时间，甩开膀子大干一番，看看能否将其补齐，哪怕是个豆腐渣工程也罢。“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便是了。”

本来这个系列是随感而发，有时间就写，没时间就歇，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中间还不断答记者问，又侃了十几篇足球，自己也记不太清楚在这个系列里净胡说了些什么。这几天看了老芦的《文明真空与未来中国潜在的危机》，受益匪浅。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抛出这么多砖头，能引出老芦这块玉来真是很值。说来惭愧，本“理科蠢男”基本上是个文言文盲，经典没正经看过多少，尤其是对那种以孔圣人为代表的“原儒”们“天一句地一句的派对聊天录音稿”（芦语），更是理不出个头绪来，看来中学语文教学中“总结中心思想、段落大意”那一套还是很有必要。

在讨论儒家学说对中国社会发展和形成的影响，没提到荀子确实是个重大的疏漏，实在是不应该，上纲上线说就是罪该万死。这点确实如老芦所说，荀子是“儒教工艺学”大师，为儒学成为传统社会的“社会稳定术”、“人际关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谭嗣同也说过：“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谭嗣同这句话和易中天所说“中国古代的政治，既不是法治，也不是德治，是‘礼治’，即等级制度。”意思差不多，因为荀子强调通过“礼治”维持社会秩序，使社会各阶层人士安守本分，社会便能安定。

我眼中的儒学形成和发展史是这样的：先秦三位儒家大师对儒学都有重大贡献，孔子首创，孟子继承，荀子发展完善，最后成型有赖于汉代的董仲舒。打个可能是很不恰当的比喻就是：孔子看到大家都风餐露宿，觉得这样不是个事儿，就画了个房子的草图（而不是建筑图纸），然后四处吆喝“盖房了，盖房了…”（就像电影《芙蓉镇》里王秋赫敲着破锣，嘶哑地叫嚷着喊“运动了，运动了…”一样）。以后孟子觉得“盖房是个好主意”，就按照老师的草图把一面墙给砌上了，荀子过来一看，觉得光有一面墙不行，还是不能住人，又把另一面墙砌上，屋顶铺好，算是有了房子的模样，最后董仲舒又把前门后窗安上，终于能住人了。

以后这房子在历代瓦匠、木匠、电工、管工如朱熹、王阳明等师傅的不懈努力下，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风风雨雨两千年，一直用到了洋鬼子进庄。咱建房的时候洋鬼子们还多是无房户，四处流浪，露宿街头，所以咱这茅草房鬼子们看着眼热，咱自己住着自豪，小日子过得也是有滋有味的。以后洋鬼子自己盖上了小洋楼，里面水电气俱全，咱也不知道，以为洋鬼子还是“青天一顶星星亮，草原一片篝火红”，怪值得同情可怜的。

鸦片战争洋鬼子打进来后，咱才知道人家已经住上了钢筋混凝土的小洋楼，房子更结实，里面电灯电话、空调暖气、抽水马桶一应俱全，住着更舒坦。这样一来，先贤们流血流汗盖的房子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也没人愿意住了。可这房子是咱民族的传家宝，好歹也是个玩意儿，不能眼看着就让人给否定糟蹋，就这么给扔了。先是康有为、谭嗣同跑出来说，孔老师这草图画的不错，就是后来的荀子、董子、朱子这几个二把刀没有按图施工，结果把房子盖成了这样，“中央的好经让地方的歪嘴和尚念歪了”。老康和老谭们光顾着臭骂几个坏小子了，但房子问题该怎么解决，也没说出个道道来。“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只是一句空话”

后来又出来一拨以牟三宗设计师为首的民国港台新儒家建筑流派，说这洋房虽好，可咱中国人住

不惯，瞅着就别扭，住进去心里发虚，不适应，再说老房子就这么推到了重建也叫人心疼。这老房子虽破旧，但原来的设计也有不少可取之处，很多地方与洋楼的设计暗合。外面用钢筋水泥加固一下，里面再进行一下改造，安装上电灯电话、空调暖气、抽水马桶，在现有基础上改建成一个东西合璧的建筑，没准比洋房还好（即“三统”说：道统之肯定、学统之开出、政统之继续，但最终还是要实行现代民主政治）。哪怕推倒重建，也得考虑多年来中国老百姓的居住习惯：外观尽量采用中国样式的大屋顶，用料尽量秦砖汉瓦，少用钢筋水泥，那立柱、大梁、檩条都是好木头，用料讲究实称，能利用上的千万别浪费。客厅里别忘了放几把太师椅、麻将桌，厨房里别少了砂锅、擀面杖，没事儿时打桌麻将、包顿饺子、熬锅中药也方便，住这样的房子咱心里踏实，感觉舒坦。

最后又出了大陆新儒家怪诞建筑流派，领军人物就是蒋庆。除了数落前面提到的几个二把刀，又把那些试图盖洋房的那些汉奸走狗卖国贼骂了个狗血喷头，告诉众人洋房里面阴气太重，不适合国人，万万住不得，强住进去不出三日就要毙命，侥幸活下来也要落个风湿老寒腿。以后人家亲力亲为，自行设计自行施工，愣是按照想象中的孔子草图建起一个茅草房样板间来（议会实行三院制，建立“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不遮风不挡雨，夏暖冬凉，摇摇欲坠，远看如鸡舍，近看像狗窝，无人敢住。在众人耻笑之中，蒋庆忿忿不平，大骂众人文化素质低，不懂建筑。

以上是玩笑话。这儒学发展过程具体说就是“至圣先师”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创立了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正是中国社会转型之时，天下大乱，战争频繁，礼崩乐坏。孔子看到了建立秩序的重要性，提出了用“仁”和“礼”来规范社会生活，处理人际关系，反对以战争与刑罚来统治天下。孔老认为只要一切从“爱人”、“守礼”出发，就能建立起和谐的社会秩序，从而结束混乱的局面。在《论语》中，“仁”字的出现达 109 次之多，以致后来有人把孔子的思想概括为“仁学”。孔子认为“道德的力量是无穷的”，以“仁”、“礼”来教化、引导民众，使人们从内心里懂得明事理辨是非，就可以促使他们自觉地选择走正道而耻于做坏事。

孔子的“仁”跟孟子的“仁政”还不一样，是一种含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包括“爱人”，也包括修身，即对道德准则的遵从。梁启超认为孔子的仁者爱人，是以自己为中心，从最亲近的人发动自己的同情心，人人将其同类意识扩充到极量，可以完成所谓“仁”的世界。仁者“爱人”的具体方法就是“忠恕之道”：“忠”要求的是积极为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自己要站得住，也要使别人事事行得通。“恕”要求的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自己不喜欢的事，也不要强加给别人。在统治阶级内部，人人都贯彻了“忠恕之道”，就能做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主以礼来使用臣子，臣子用忠心来服事君主，这样就可以消除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建立稳定和谐社会。

仅靠孔子的这些“天一句地一句的派对聊天录音稿”（芦语），儒学还成为不了一种经世致用的学问。黑格尔对孔子的《论语》评价说：“只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伟大领袖说“孔学名高实秕糠”，可能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而“亚圣”孟子把孔子的“天一句地一句的派对聊天录音稿”发展成为一种主题明确的学说。孟子对儒学的贡献我想应该包括这么几个方面：首先是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把道德层面的“仁”扩充发展成一种施政纲领，就是“仁政”。而“仁政”的基本精神也是对民众要有同情和爱心，统治者应该实行“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只有用“仁爱”之心去对待人民，才能“得民心”，

从而才能得天下。孟子提出“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就是劝说统治阶级要善待民众，不要过分地剥夺他们。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就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失去政权。政权政权，就是仁爱之权——这是我自己瞎编的，不是亚圣的原话，篡改自林副主席语录“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湖北佬“政”、“镇”不分啊），人家亚圣的原话是“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二是孟子还对“施仁政”做出了许多具体的制度设计安排。孟子所说的“仁政”核心就是“保民”、“贵民”，反对苛政，反对暴虐，要求给人民实惠以稳定人心。具体策略包括“仁政必自经界始”，也就是从土地制度入手，让人民拥有固定的土地。孟子还说“民有恒产者方有恒心”。用今天的话说，民众有了固定财产就能安定民心，推行仁政就有了经济基础。相反，无产者无畏，人人都是烂命一条，社会非乱不可。

三是孟子从理论上证明了“仁政”不仅是应该的，而且由于“人性本善”，因此也是可行的。与孔子不同，孟子在论述“人性本善”时多少还有了点思辨的味道。他根据人人都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善端”（也就是“四心”），推出人人都有向“善”的可能。并认为这种“善性”是人类所独有的一种本性，也是区别人和动物的一个根本标志。而通过“教化”，包括教育和环境的影响，就能够把人的“善性”充分挖掘出来，使之成为仁、义、礼、智的德行，最后行“仁政”而无敌于天下。

尽管人人都有善性，然而在现实中，除传说中的尧舜等少数圣人外，真正达到“仁”的境界的人太少。孟子认为这是因为人们大多数没有存住“四心”，把善心丢掉了，因此孟子强调人们要矢志不渝的去求“放心”（即失去的四心）。一旦人人都能找回丢失的“善心”，就会形成“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的良好社会风尚。这失去的四心也不用到外边去找，而只要不断地向内心世界追求、探索就行了，从而提出具有神秘色彩的“养浩然之气”的道德品质修炼方法。

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刚参加革命的时候，还有不少旧道德、旧文化、旧思想的束缚。这旧东西虽然陈腐，但好歹也是个东西，还有它存在的价值。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很多内容实际上就是借用了孔孟的“修身养性”，把“四心”换成“党性”，与“修养”相结合，作为共产党人自我改造的形式，运用大量的古代传统道德文化思想论证了一名共产党员怎样才能成为合格的驯服工具，成为党这部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为党的目标而奋斗。这套有民族特色的党性修养理论，五六十年代可能还有人信，文革算是彻底给批臭了，只要不呆不傻，没有人再信这一套。没想到的是，国外还有人信，还成了曼德拉的精神支柱。

1990 年 4 月吴学谦访问非洲时问曼德拉：“为什么你在漫长的监狱生活中会坚持斗争？”曼德拉不加思索地答道：“信念，道义。我始终认为我所作的一切并没有错，更没有罪！”接着，他又说：“确切地说，我 20 多年在罗宾岛狱中生活的精神支柱来自中国。”曼德拉进一步解释说，他在牢房里坚持看书，夫人温妮应他的要求捎来《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他如饥似渴地从头到尾认真研读，不时比较和思索南非、非洲大陆的民族解放和中国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曼德拉滔滔不绝说下去：“如果从个人修养来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在书中讲的句句在理，我从中受到极大的激励。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认定追求的目标，就要不懈地奋斗，就会经受各种曲折考验，在艰难甚至恶劣的境遇中求生存与发展。正是这种精神力量，使我坚定信心和斗志。”

我眼中的儒学形成和发展史（上）

孟子其实也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没有想到如果遇到“教而不化”该怎么办。光靠“施仁政”，还是不能有效地治理国家。冯友兰认为孟子是儒家的理想主义代表，荀子是儒家的现实主义代表，这话一点没说错。我认为这可能与孟子与荀子的个人经历不同有关，孟子一生都是无业游民，带领门徒游说各国，且不被当时各国所接受，最后只好退隐与弟子一起著书，所以没有任何实际治理国家的经验。只能说孟子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而不是政治家。而荀子不仅做学问，而且大量的时间都是在从政，而且是在齐、楚、赵等不同的国家搞政治，既干过大学校长，还当过县太爷，看到了人间处处是刁民的事实。荀子对人性的认识比孟子更深刻，更符合人性的实际。因此荀子的思想实际上来自自己的行政经验，最后从社会实际出发，提出了建立社会秩序的整套切实可行的主张。

孟子的乌托邦只有可能在小范围、少数人、特定环境才有可能实现并短期内运行，如近现代美国、欧洲，以色列的乌托邦村（靠十几亿贷款维持的中国南街村的伪乌托邦不在此列）。而荀子的“理想国”是天下定于一尊，万民匍匐于地。要求人们无论贵与贱、尊与卑，都应各安其序（礼），提倡通过艺术以道制欲（乐），若教而不化，则主张严加惩罚（法）。他强调礼法兼治，王霸并用，就是特别注重统治者的威权，还提出了“正名”学说，强调等级制度，这些主张未必有孔、孟那样敦和、温润，但非常全面实用。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教育和惩罚两手都要硬，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教化不是万能的，没有大刑伺候是万万不能的，要以法辅礼，以暴力辅仁德。

荀子认为人与禽兽无异，“饥而欲饱，寒而欲暖”，人性本来是要争、要抢、要贪的，因为人与生俱来就有邪恶的欲望，只不过“恶”被一层层地深深包裹起来而已，是需要后天的文明教化来使其向善。若顺从人的本性而行，必会引起纷争。他主张通过教育改变人的本性，为善去恶。荀子又在此基础上建立政治哲学，在“孔仁”“孟义”之后又明确提出“礼”和“法”。

荀子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家和政治家中的异类，和先秦其他大腕比较，我认为荀子有下面几个特点：

首先荀子是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舍善美而求真，敢说实话的思想家、社会学家、政治家。按朱自清的说法，荀子是用功利的眼光看问题的。荀子身上已经没有孔、孟表现出来的“贤人作风”，对人性持一种不信任的否定式态度，尽可能从更坏的角度去理解人性，冷静理性勇敢地将人的本性之恶揭露出来，敢于说出尧舜与桀跖、君子与小人的本性都是相同的。实际上人人都是“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所以一要教育，二要用“礼”和“法”把男盗女娼憋在肚子里，别跑出来扰乱社会。

由于荀子说了不招人喜欢的大实话，以致大多数人都不太喜欢荀子，“荀学”经常作为“隐学”而存在，成了有道理、必须按照做但又不能拿到台面上说的东西。唐宋以后的正统儒家很多都排斥、攻击荀子，屡次“扬孟抑荀”，荀学也被理学家排除在儒家的正统之外。在执行孔孟之道时稍有不顺，就要把荀子拉出批判，“恢复儒学的真实面目”。到了戊戌维新，康有为等干人进行文化批判与重构，中心一环则是“孔教复原”。

“孔教复原”顾名思义是要恢复“孔教”（即儒学）的原貌、真相。康有为等人所设定的前提是，孔子学说原本极好，但在孔子之后，经一些后儒之手，它已逐步变质、走样，最后让中国落到今天这个落后挨打的地步。因此，今日当务之急是揭示后儒对孔子学说的误解、歪曲和篡改，恢复

其本来面目。为此，康有为等人先后描述、提供了各自的孔学、“孔教”变质史，揭露了历代后儒对孔子学说的背离、背叛，对后儒之学作了一番清算。

康有为认为，孔子学说被误解、歪曲、篡改，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始误于荀学之拘陋，中乱于刘歆之伪谬，末割于朱子之偏安。”因此，孔教复原工作应从“排斥荀学”、“排斥歆学”、“排斥宋学”入手。清除荀子的学说，刘歆的伪经，以及朱子的理学，最后将“中国数千年大经大法，一扫刮绝”。受老师的影响，梁启超早年也力主“绌荀申孟”，指责荀子是“儒家中最狭隘者”。（梁晚年又发生转变，对荀子持肯定态度，称之为“社会学之巨擘也”。这个梁大才子一生多变，最善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实际上这是从激进幼稚走向成熟的表现，“不怕犯错误，改了就是好同志”。）

到了谭嗣同这儿就更激烈，康有为那儿不管怎么说败坏孔教的是个无组织的团伙，而谭嗣同则认准了荀子乃是败坏孔子之道的首恶。认为战国末荀子“乘间冒孔之名，以败孔之道”。接下来败坏孔子之道的尚有叔孙通、刘歆、桓荣、韩愈、孙复等。此后，诸儒皆“出于宋儒胯下”。谭嗣同认为，在这一连串败坏者中，荀子不仅是始作俑者，而且他全面篡改了孔子学说，从此孔学“尽亡其精意”。在谭嗣同眼里，荀学的基本宗旨与孔学全然对立，孔教中原有的民主、平等全让荀子糟蹋的串了味儿。从叔孙通以下的后儒，正是继承发展了荀子尊君权、严等差、重纲常的思想，使君权愈尊，平等尽失。基于这一分析，谭嗣同得出了二千年来之政皆“秦政”，二千年来之学皆“荀学”，“二者交相资”的著名结论。以后老谭和梁启超、夏曾佑联手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排荀运动”（里面还饱含“排满”的意义），梁启超后来回忆说：“清儒所做的汉学，自命为‘荀学’。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便用‘禽贼禽王’的手段去打他们的老祖宗——荀子。”

文革期间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谁说真话谁倒霉。我看这是林彪说的唯一一句真话，结果倒了血霉。荀子也不例外，就是因为说了几句“人性本恶”的大实话，到今天还让人不依不饶。伟大领袖就深暗此道，从不明说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工业积累就是要无情地掠夺压榨农民，还要剥夺他们享受几千年的迁徙自由，而是经常赞美农民，从手上的泥巴到脚上的牛屎，反复提示他们已经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所以直到今天老农民一捧起毛选心里还是热乎乎的。后边江泽民也干得不赖，老江当政期间工人失业下岗、买断工龄闹得最邪乎，而江总书记却反复强调：“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优势，也是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所以拿着江选，以及将要出版的胡选横看竖看，你绝对什么毛病挑不出来，因为里面全是废话空话套话，绝对正确的好听话。

说到这儿顺便提醒一下老芦，您老这个“人民公敌”算是当定了，老中青左中右都让你给得罪的差不多了。主要是您老说了一些客观存在，但他人看不到或者不敢说、不能说、说不透的东西，不管说的对不对，有些话只要说破就要招人骂、惹人恨。不过这也不错，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尽可以像伟大领袖学习，一旦得罪人就要得罪到底的（林彪语）。既然没有阵营，也就不用担心本阵营战友的感受和反应，更不用提防来自自己同志的冷枪和暗箭，索性一切不管，爱咋咋的。以后的日子可以无所顾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倒也痛快。从这点上看，真是羡煞人也！

荀子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无门户之见，取舍百家，博采众长，是先秦思想史上的集大成者，所以荀子思想具有多元融合性的特点。我记得前边有网友问道为什么一提传统文化就只提儒家文化，按说至少也应该是儒道释三家。而且古人治国自汉代开始从来都是王霸杂用，你怎么只提儒家？其实儒学自孔孟之后，原初儒学之道统几乎断绝，逐渐变成了儒法糅合，王霸杂用，神道互陈的治

国理论，跟《论语》中那些着三不着两的言论根本是两回事。这其中的变化经历了从单一化的鲁学，逐渐发展成为吸收若干齐学的鲁学，再发展到齐学化的鲁学。也就是说，孔孟荀思想的发展是由单一逐渐地渡到融合的。儒家学说创始人荀子的学生韩非子、李斯等，最后成为主张法治主义的法家学派的创始人（至少是创始人之一），促成了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所以后人形容荀子是 “儒表法里”。

先秦儒学自孔孟以来，大都提倡仁、义、礼、信，君臣百姓都要在道德的世界里修身养性，认为只要这样就可以长治久安、稳定和谐。而法家认为礼乐文化修养是纯粹的浪费时间，毫无作用，应该法治取而代之。而到了荀子这里，一方面继承了鲁学即儒学的礼义王道思想，另一方面又接受了齐学法治霸道的思想，提出了礼法并用、王霸兼采，而以礼义、王道为主，法治、霸道为辅的理论。既克服了孔子、孟子只强调礼而忽视法的弊端，又克服了韩非等法家只强调用法，而忽视礼的倾向；“王道”政治主张“以德服人”，“霸道”政治主张“以力服人”。荀子认为要统一中国，必须实行“王道”，要使国家强盛，则要实行“霸道”。这样这样就可以夺取天下，巩固政权。

不盲从恐怕也是荀子的特点。比如在人性问题上，孟子主张本善，而荀子主张本恶，因为人生有“好利”、“争夺”、“嫉恶”等劣根。荀子也很注重心学，也曾大讲“治气养心之术”，但与“心学鼻祖”孟子所走的道路有所不同。在人性向善的方法上，孟子主张通过教化，扶植和培养善的萌芽，使善性得以发扬光大；荀子主张通过教化，限制恶的趋势，使人性之恶向善转化。梁启超认为，“化性起伪”，所讲心学也完全是变化气质、校正各人弱点的那一套功夫，与孟子存养、扩充的功夫并不相同。

荀子最后一个特点是他论证时的逻辑性，是古代思想家、政治家里为数不多的懂得逻辑思维的人。人家知道界定概念、推理论证，这点甚至比很多当代大儒都强。古今大儒们最好的一口就是一通胡搅蛮缠、信口开河、云山雾罩、胡乱比喻，然后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把人打晕，最后以天道代言人的身份果断拍板给出结论。这方面荀子好像是个异数，比如这“礼”，孔子口中的“礼”到底是什么，礼貌、礼节、礼仪、礼让，谁也说不清楚。不过模糊有模糊的好处，就是咋说咋有理。而荀子的“礼”概念上就很明确，是指区分人的等级的标准：“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所谓礼治，就是要使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要明白自己的所处的地位，明白自己的职责，这样就会减少冲突，每个社会成员都各得其宜，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安宁。“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

再比如讨论“人性”，荀子“性本恶”明显比孔子的“性相近”、孟子的“性本善”、告子的“性无善不善论”更有说服力，更有逻辑自洽性。比如告子为说明“性无善不善论”，比喻用了不少，一会是“性，犹杞柳也”，一会又“性，犹湍水也”，但最终也没说明为什么“人性”就非得像林子里的杞柳和急流的河水。而荀子则不是这样，人家首先对“人性”下了定义：“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就是说：性，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属性，其本身没有先天道德上的价值判断，是不待后天学习而成的自然本能；“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为，不可是。”凡是人可学可为的，就不是“人性”，这样他就把礼义道德排除出人性范畴。这种人性（本能）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的欲望，实质上就是“好利而恶害”（趋利避害），表现为好吃懒做、好逸恶劳、贪生怕死、淫乱好色：“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好色， 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里好愉佚”。如果顺着“好利”的本性发展，放纵人的本性，就“必出于争夺”而危害社会，致使天下大乱，产生恶劣的后果。（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所以说“人性本恶”。对付的方法就是用“师法之化”、“礼义之导”使人改造为善，进行赏罚分明的治理。

上述例子说明，荀子先是界定了“人性”的概念，然后从“人性”的表现，得出了“性恶”的结论。再从“性恶”论出发，不但证明了礼乐教化的必要和可行性，而且为“法治”提供了人性上的根据。整个过程清晰可信。所以后来信奉进化论的，从中看到了“人猿同祖”和“弱肉强食”；信奉马列的，从中看到了辩证法和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而伟大领袖，从中看出了坚持“政治教育”和“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必要性。那场紧张严肃活泼的“批林批孔”、“尊法批儒”运动中，唯一幸免于难的大儒就是荀子。我记得当时还以荀子批孔孟，批林批孔学习资料中还有《荀子•天论》，还专门做了注释，认为这体现了法家的思想，拿荀子《天论》来批判孔子《论语》，来批判其它儒家学说。

伟大领袖喜欢荀子而厌恶孔孟，林彪就因为墙上挂了几个孔子语录惹得龙颜大怒，认定了林彪是孔老二的真忠实信徒。毛喜欢荀子估计和荀子的“人定胜天”和有关，五十年代流传一首民歌：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路，我来了。实际上是“毛主席来了”或者是“毛主席带领俺们来了”。另外毛主席好这一口可能还与荀子“法家”思想和培养出李斯和韩非子两个法家弟子的革命业绩有关。伟大领袖在接见胡志明时说：“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

董仲舒前边说过了，这里就不再赘述。实际上董仲舒就是通过利用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法家的集权思想和阴阳五行学说来重新解释儒家经典，把儒家学说系统化、实用化和神圣化，推论圣人所定的政治制度，也就是“大一统集权皇权专制”，不但合情合理，而完全合乎天象天意，广大臣民必须自觉且甘心情愿地遵从和认可这种等级秩序。董仲舒对儒学改造的成果就是使儒学取得了独尊地位，并长期成为传统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所提倡的仁义道德，可以用来缓和阶级矛盾；儒家的礼乐教化，可以用来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可以用来服务于中央集权。最后结果正如易中天先生所说，这是一场交易：国家把儒家思想当成思想工具，儒家知识分子从此一步登天，成了“养皮”上的“毛”，成为了官方的思想家。

(20)

也说显性文明与隐性文明

首先就“文明”的概念说几句。既然老芦不肯出山，那我就钱文军先生对“文明”的质疑说点我的看法。

钱先生在文中说：“几千年的历史绝大多数不是‘文明竞争’，而是兽性撕咬，不能把贴了‘文明’标签的意识形态理由都归于文明。若按老芦的说法，狗屎拌点油盐也成一道‘文明菜’，只怕没人能消化。”钱先生理解错了，我和老芦所说的“文明”的概念不是这个意思。“文明”一词的含义非常复杂，像钱先生所说的“野蛮的反义词”、“社会进步状态”在某种语境下是对的，比如“两个文明一起抓”、“讲文明懂礼貌”里的“文明”就是您说的这个意思。显然，本人的《中华文明“行”在哪里？》和老芦的《文明真空与未来中国潜在的危机》系列里面，并没有讨论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公共场合大声喧哗、随意践踏草坪这些“狗屎拌点油盐”的“文明”行为，这里所说的中华文明，就是指在传统社会中国人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道德观、价值观、宗教、艺术、科学的总合。

在讨论“文明”时，我没有先界定文明的概念，而老芦给出了他自己的理解。您批评老芦说：“我赞同应该首先清晰概念，但最好不要自己归纳，而取大家认同的，这才不易发生没必要的混乱。老芦的归纳主观性太强，把人们历来习惯于用‘文化’来判读的许多内容都装进‘文明’的筐子里去了。”

恕我直言，您对“文明”、“文化”了解还是略显肤浅了些，否则不会说出“取大家认同的”这种话来，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大家认同”这么一说。无论是在中文还是在西语中，“文明”（civilization）和“文化”(culture)都属于使用频率极高而又极为模糊的概念。在语言文字中，词汇“所指”的对象越抽象、越丰富、越复杂，就越难以解释清楚，也就越容易产生歧义。而“文明”、“文化”这类词汇，不是“苹果”、“鸭梨”那种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而这种歧义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的。

关于“文明”、“文化”的概念，中外学者们争了近一百年，光是“大家”（即大学问家，不是众人）关于“文明”的定义就有几十条，至今也没有找到“大家认同的概念”。据说最开始萌发要探讨一下文明的确切含义的是英国的克莱夫.贝尔，原因是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时提出了一句口号“为文明而战”，既然是“为文明而战”，就得把“文明”的定义搞清楚吧。结果搞了几十年，也没有哪一个概念能一统江湖，最后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情况，从事文明研究的大腕们几乎人人有自己的概念体系。

所以有的学者，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就是因为文明界定过于复杂，干脆主张不对文明下任何定义，也就是让读者可以根据文章的上下文、从作者的行文、立论、论点和论据来理解。文明研究中所使用的概念不是科学概念，所以必然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光是汤因比就总结了 6 条文明定义：1、文明就是文化；2、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总成果；3、文明是符合特定价值观念的某种行为的外部特征；4、文明是人类脱离了蒙昧和野蛮时代的社会状态；5、文明是与特定区域相联系的文化形态；6、文明是人类文化传统和历史智慧的结晶。国内学者许启贤归纳了 9 种文明定义，虞崇胜归纳了 13 种文明定义。

文化的定义就更多了，据我所知，还没有出现“大家认同”的定义。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专门有一章是讲“文化的定义”，里面提到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和克罗孔在《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一书中所罗列的从 1871 年到 1951 年 80 年间西方学者关于文化的定义，就有 164 种，光是殷海光认为“特别精彩的定义”就有四十七种，我还这不知道哪一种是“大家认同”的。从 1951 年到现在这六十年又有多少“特别精彩的定义”问世还没有人统计过。而且实事求是讲，我也看不出那些大腕的定义有何精彩之处。那才是真正的“信口开河”、“过于随意”。不信我列在下面，有兴趣的网友可以看一下，我在这就不啰嗦了。记得听过一首彝族民歌曲《快乐的啰嗦》，我只觉得啰嗦没体会出什么快乐，看来什么样的啰嗦都让人烦，尤其是本人处于“树老根多，话多人老”的阶段，尤其要注意。

至于文明和文化的关系，更是众说纷纭。因为关于“文明”和“文化”本身定义就是五花八门。像民国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唐君毅给出的“文化”的定义是“广义之文化，包含宗教、哲学、文学、艺术、道德、伦理、科学、政治、经济，及技术上之发明之各方面”，我看跟“文明”的定义就差不多。所以不少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都认为文化和文明没有多大差别，甚至可以说，两者是同义的，文明就是文化。这这两个概念有时可以互相替代，比如说“玛雅文化”与“玛雅文明”，有时又不能互相替换，比如“文明公约”就绝不能写成“文化公约”。关于文明和文化的关系，

我本人认同这个观点，文化是思想的产物，文明是社会的产物。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成果，是文化的历史积淀。

关于“文明”和“文化”的定义就说这么多，下面对老芦“显性文明”和“隐性文明”观点的说几句不同看法。

老芦把文明进一步细分为“显性文明”和“隐性文明”，而在“这两类文明中，前者最容易看见，因而也时时是学者讨论的热点。老金那系列似乎就只谈了看得见的儒家文化，但在我看来，其实后者虽然看不见，或是不容易那么看见，但作用更大，生命力更旺盛。在过往一个半世纪中，儒家文化已被彻底淘汰，荡然无存，彻底失传。”“如今尚存的所谓“华夏文明”，其实是隐性文明，也就是千百年为儒道释模塑出来的人民的心态（mentality）、反应定式、思维特征、潜在的价值信念、行为规范等等，就是它构成了文明冲突的主体。”

老芦把文明进一步细分为“显性文明”和“隐性文明”，而且认定“隐性文明”构成了和西方现代文明冲突的主体，这些说法我都同意。在这里只是还想和老芦再探讨一下，这“隐性文明”是不是必然要以某种“显性”的方式表现出来？换句话说，就是传统文明消失与否就是看它是否还有标志性的东西存在。凡是去过欧洲穆斯林移民比较多的国家（如荷兰）的网友都知道，伊斯兰文明和西方现代文明的对抗的主体可不仅仅是“隐性文明”，人家靠的是手中的可兰经和地面上的清真寺。欧洲的穆斯林们有很强的与欧洲人对抗、保留民族文化意识，只要手里有钱就想办法买地盖清真寺，办可兰经学习班。每盖一处清真寺就意味着又攻陷了一个阵地，又有一块西方的土地被伊斯兰化。依我看如果没有烧毁可兰经和砸烂清真寺的野蛮行为，也就是钱先生所说的“兽性撕咬”，伊斯兰文明在与西方的和平竞争中不战自溃的情况起码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即使在欧洲本土也不会出现，更不用说其他穆斯林国家了，放眼世界，西方没有成功和平演变的案例。

在中国，我认为大一统帝国内的中央集权专制政体就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显性”表现形式，而且至今还看不到向现代民主政治政体转换的迹象。放眼望去，除了政教合一的国家，仍在坚持这种政体的国家世界上还真没剩几个，这也是 7171 网友说中华文明“行”的表现之一。北大左派教授潘维所说的“中华政治体制，或者中华政体，根子没有变，主干也没有变。不仅仅是 30 年没变，60 年没变，而且是两千年都没有根本的改变。所以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我同意潘维的说法（说实话，弱智的左派阵营中能说出点有分量的观点来还真不多见），换句话说，中华传统文明的消失的标志就是大一统帝国内的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改变。

中国要成为民主法治的现代国家，一定要在政体的存在形式上表现出来。有了现代民主政体，中国不一定就能实现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法治，但没有一个民主政体，中国就肯定永远不会成为民主法治的社会。政体不是万能的，没有政体是万万不能的。具体说，所谓政治改革就是要部分剥夺共产党的权力，全部或部分实行：多党执政（或多党共存一党独大）、代议制、两院制、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及政治中立、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市场经济、私有制（或混合经济私有为主）。否则中国的民主法治就永远停留在孩童水平：一提民主就是“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认真调查研究”，加强法治就是“加大打击力度”。套用一句毛主席语录就是：政体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看中国有无实质性的进步，不是看又有谁写了什么“加快政治改革步伐”的报告，而是看看上面我说的那几个指标哪些发生了改变，变了多少。

所谓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就是把本该属于民众而被我党无情无理剥夺的权利部分还给民众。具

体说就是和毛时代相比，在“市场经济、私有制”这两个方面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改变，新闻自由也有所松动。说改革开放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步退到解放前”一点没说错，若把“解放前”改为“民国前”就更准确了（因为“解放前”政府还要面对四个野战军集团，是战争状态）。我感觉目前国民所享受的民主和自由和传统社会差不多。在传统社会，虽然也没有政治民主，但有谏争制度。现在的人大和政协，跟过去的谏官制度差不多，只要不侵犯官僚集团的利益，共产党可以做到从谏如流。

现在国民享受的自由程度，我认为也跟古代传统社会类似。传统社会虽然没有在法律制度、伦理道德层面上明确承认个人的自由权利，但由于“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儒家思想的影响，再加上农耕生产方式的特点，民众对自由的需要程度比较低，没听说什么时代发生过类似西方“不自由，毋宁死”那样的抗争，也没有因为不自由而与君主政治体制形成尖锐的冲突。另外，从执政理念来说政府只管干部，顶多管到知识分子，而农村就是世外桃源，官府不会关心民众到底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也没有那能力。除了纳粮征兵、组织兴修水利和征发其它的徭役，政府和农民基本不发生关系。广大民众有一定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迁徙自由等。不管是文字狱还是特务政治，收拾的对象主要还是官员和知识分子，而不是一般的民众。

而传统社会即使是文人学士，也有一定言论自由。宣泄自己对时政的不满情绪，直接骂不行，但指桑骂槐、含沙射影可以；当朝的皇帝和官员骂不得，但前朝的皇帝和官员可以随便骂。像《长恨歌》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谁都知道写的就是唐玄宗，但诗人很安全，白居易没有受到丝毫的打击报复。毛后时代也是一样，言论自由可以通过曲折、隐晦、合法或者半合法的方式实现。比如毛左们假借怀念毛主席装神弄鬼，谁都知道是攻击现政权，但完全可以公开干，政府睁只眼闭只眼。还有些反动言论，公开场合不能说，但私下可以说，报上不能说但可以在网上说，像老芦的三篇评毛文章（知识、智力、性格），就在凯迪网上挂着，至今也没见政府出面干预。传统社会也是这样，除非像朱元璋那种强势皇帝当政，大部分情况下只要没有行动，或者结了仇家被告上官府，仅仅语言出轨还不至于受到惩罚。

所以，所谓改革不过是回归传统社会（可惜只是形式上回归，思想道德上早已告别传统），经济发展还是靠开放，靠引进当今世界先进的科技成果、管理理念和资金，更重要的是消费主义。

附：特别精彩的四十七种文化定义，摘自：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第二章：文化的定义（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118029_75559.html）

美国有代表性的人类学家克鲁伯（ A.L.Kroeber）和克罗孔（ Clyde Kluckhohn）藉翁特瑞纳（ Wayne Untereiner）的协助，合著了一本书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在这本书里，罗列着从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五一年八十年间关于文化的定义至少有一百六十四种。我们现在把这些定义中特别精彩的挑选出来。

……

1.泰勒（ Tylor），一八七一年：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丛结之全体。这种复杂丛结的全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这里所说的人，是指社会的一个分子而言的。

2.博亚斯（ Boas），一九三〇年：文化包含着一个社群里社会习惯的一切表现形式，个人对于他所在的群体习惯之影响产生的种种反应，以及受这些习惯所决定的人类活动之产品。

3.林顿（ Linton），一九三六年：〔文化〕是……这些东西的总和：观念，受制约的情绪反应，和习惯行为的型模。这些东西是一个社会里的分子藉着训练或模仿而得到的，而且社会里的分子多少是分享着这些东西的。

4.洛维（ Lowie），一九三七年：我们所了解的文化是一个人从他的社会所获得的事物之总和。这些事物包含信仰、风俗、艺术形式、食物习惯和手工艺。这些事物并非由他自己的创造活动而来，而系由过去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所传递下来的。

5.墨林洛弗斯奇（ Malinowski），一九四四年：〔文化〕显然是一个整体。这一个整体包括器用，各种社团的法规，人的观念、技艺、信仰和风俗。

6.克罗孔（ Kluckhohn）和凯利（Kelly），一九四五年 a：文化是一整个的丛结。这一整个的丛结包含器物、信仰、习惯，以及被这些习惯所决定的人的活动之一切产品。

7.克罗孔与凯利，一九四五年 b：……当着我们把一般的文化看做一个叙述的概念时，意即人类创造所累积起来的宝藏：书籍、绘画、建筑等等。除此以外，还有我们适应人事和自然环境的知识：语言、风俗、成套的礼仪、伦理、宗教和道德，都在文化范围以内。

8.克鲁伯（ Kroeber），一九四八年：……一堆学得的和传承的自动反应、习惯、技术、观念和价值，以及由之而导出的行为，乃构成文化的东西。文化是人类所持有者，别的动物没有文化；文化是人类在宇宙间特有的性质……文化同时是社会人的全部产品，而且也是影响社会与个人的巨大力量。

9.赫尔柯维兹（ Herskovits），一九四八年：文化根本就是一种造型。我们藉着这种造型来记述全部的信仰、行为、知识、制裁、价值，以及那标志任何民族的特殊生活方式之目的。这也就是说，虽然文化可作客观的研究，但毕竟是一般人所有的资产，是他们所做的事情，以及他们所想的念头。这一类的定义所着重的是文化之整体性；并且列举了文化内容的重要方面。

……

47.提第也夫（ M.Titiev），一九六三年：文化是事物、价值、符号的意义，以及一再复现的行为方式之全部范围。这一再复现的行为方式的功能是指引社会里个人的动作。文化的任何层面都不能藉生物遗传的途径传递给下一代，而且每个人必须在出生以后学习属于他的文化。即令某个人死亡，文化的型模或罗聚形态还是继续存在的。